波兰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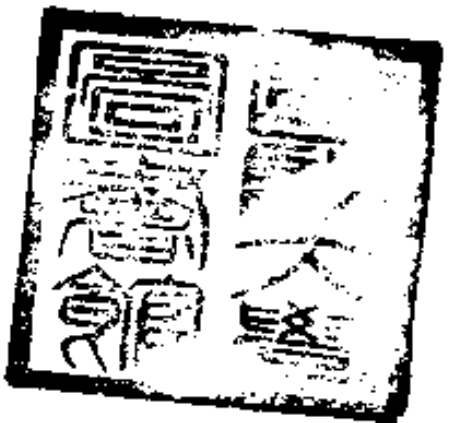
VISIT…

2 020 8257 5

波 兰 危 机

王通叶 [illegible] 著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水　为
特约审稿：黄　鸣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　　图：王贻华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波兰危机

王逸舟　苏绍智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13.375插页5 字数202千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345—5/C·86
印数：1—32,000册

定价：2.50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引　言

1980年8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波兰曾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人们用“危机”这个词汇来形容事态的变化。由于抗议政府提高物价所掀起的罢工浪潮，迅速由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蔓延到西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并扩展到全国各个城市、部门和行业。不仅工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农民、大学生、职员、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停止了工作。交通瘫痪、营业停顿、政治机构失灵、社会秩序紊乱……。在大规模罢工中成立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率先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构成对现有体制的全面而强大的挑战。从政府

与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到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易人；从“团结工会”经历曲折之后的正式登记，到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实行军管和宣布战时状态，这些从“灼热的波兰夏天”到“严峻的战时状态”之间发生的目不暇接的政治变化，反映出危机的深刻程度。

在人们的记忆中，类似的危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了：1956年6月，在波兰人称为“黑色的星期四”的那一天，波兹南市罢工工人与警察、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此后不久，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易人；1970年12月，在波兰人称为“悲剧的一周”的那个星期里，沿海地区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再次导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易人。1980年的这一次危机，在各方面都与以前历次危机相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更长，规模和范围更大，参加示威抗议的人数更多，造成的影响更深远罢了。

罢工、示威、动乱、改组……，这些都只是一些现象，是危机呈现给人们的外表。人们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波兰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与以往的危机有什么样的联系？造成这种循环式的危机的根源何在？今天的波兰为克服危机作了哪些努力？

本书仅仅试图为了解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大致的轮廓，勾勒有关因素的基本线索。作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尽可能客观地介绍波兰事件的前前后后，探讨作者以为是具有本质性、连续性的那些关系；作者也相信，读者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加入与作者共同求索的行列。

全书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叙述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篇幅。它基本上是沿着时间的顺序，讨论波兰人民共和国几次大的危机的起源、经过和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写成一部流水帐式的编年史；它围绕危机叙述和讨论，但不仅仅写困难、矛盾与冲突，也介绍波兰人民和波兰共产党为克服困难、缓解矛盾、减少冲突所作的值得嘉许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它主要研讨社会主义的波兰，但也力图同时为这种研讨提供一个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说明；它把焦点对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但也不忽略传统、文化和心理因素；它重点分析社会主义体制问题，但却是从更为广阔的环境下——而不是从纯技术性的角度——说明体制的构造及其功能，用比较的眼光、批判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观测“波兰问题”。

波兰的危机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危机不等于崩溃；危机中孕育着转折和希

望；摆脱危机的过程，是走向新生的开始。今天，在80年代后期的波兰，我们看到了一种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看到了一个新的前景。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谘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贾新民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衔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刘　溢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林和生　易小冶
秦晓鹰　夏小万　翁永曦　陶德荣
黄江南　黄　鸣　萧功秦　梁晓燕
董秀玉　谢选骏　樊洪业　蔡大成
戴士和

目　录

引　言……1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中的素描……1—18
第二章　错误和歪曲的时期……19—54
第三章　波兹南事件……55—78
第四章　反思与期待……79—123
第五章　哥穆尔卡的悲剧……125—164
第六章　十二月危机……165—206
第七章　“盖莱克主义”……207—238
第八章　旧戏重演……239—276
第九章　“团结工会”的兴亡……277—332
第十章　艰难的步履——取消军管之后…333—378
结束语　没有结束的讨论……379—392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中的素描

“我们根本不是社会。我们是一面巨大的民族旗帜。或许会有友善的人因为我说出这个真理而把我送上绞架……，但即使我现在已经感受到绳索正套在我的脖颈上，我也会用被勒住的喉咙嘶哑着喊，波兰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社会，但却是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民族。”

——奇·卡·维尔维茨

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曾经有过不幸的历史。正是在历遭劫难之后，才造就了这些民族的奇特的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时代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民族总带有历史留下的烙印。

波兰民族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波兰民族有一个多灾多难的历史，它始终影响着波兰今天的发展。

作为一个国家，波兰的历史——相对那些古老的欧洲国家——并不算长。它正式建国于公元965年。11世纪至13世纪末，由于内乱和外患，波兰国家时分时合，到14世纪基本实现统一。在这以后的

漫长的历史中，波兰很少有过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而是不断地被瓜分、被奴役。

1772年，1793年和187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曾先后分割波兰。为了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外国占领者采取了各种残暴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压迫。

在波兰人民的记忆中，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统治是尤其暴虐的。

沙皇政府曾专门设立了“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目标是彻底消除与“波兰”这个名称有关的一切东西。波兰王国原有的下级政权和机构均被取消。在俄属波兰，在城乡一切官方宫厅里和正式场合都必须使用俄语。在学校里，用充塞了谎言和辱骂的课本向学生们讲授侮辱波兰人的“历史”。波兰籍世界著名科学家居礼夫人（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始终清晰地记得，当她小时候在华沙城市私立寄宿学校念书时，每天都必须用那种使她憎恨的、不是她的祖国的语言背诵天主教祈祷文；她曾经被迫屈辱地站在学校的俄国视察员面前，背诵出波兰的历任俄国统治者的名字，甚至还包括俄国皇族的名字和尊号。在艾芙·居礼写的《居礼夫人传》中，详细描绘了小玛丽和她的同学们从小便在心中萌发的对于沙俄统治者的无比仇恨和厌恶。

1830年11月，华沙一些大中学生们举行起义，占领了华沙，夺到军火仓库，把市民武装起来，组织了新政府，并在12月召开了新议会，宣布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兼波兰王的统治。沙皇派遣军队去镇压，当时波兰军队仅10万人，有几个月打退了沙皇军队的进攻；到第二年8月沙皇军队才攻破华沙。沙皇残暴地惩罚了起义者，爱国志士大批地被杀害或被监禁，有5000家庭被放逐到高加索，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被没收。

1863年1月，波兰又有15个地方同时起义，起义的人用锄头、镰刀、木棍，去抵抗沙皇军队的马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鲁士王合力镇压起义，到1865年4月底，沙皇军队消灭了起义军最后一支队伍。有1500名参加起义的志士被处死刑，9000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30000起义的人战死。华沙的城墙上竖了5个绞架，起义首领们的尸体，挂在上面摇摆。

艾芙·居礼指出，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梦想是一般青年共有的：民族梦。在他们的前途计划中，为波兰服务的愿望，总在个人抱负之上，在结婚和恋爱之上；有人梦想作剧烈挣扎，要不顾性命去组织密谋；有人梦想用争论去鼓动；还有人怀着一种神秘的梦想，因为天主教也是一个避身之处，

是一种反抗正教的压迫者的力量。”①

俄国长期的残暴统治，不能不在波兰民族的心理上根植下仇恨的种籽，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后来人的看法；不论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曾经有过的悲惨遭遇是波兰人难以忘掉的。这一点恰如当代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所说的那样：“波兰人对俄国和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过敏症’。……正如多少世纪以来共同生活中非常不平静的邻居的关系一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这种历史的支配。波兰有一个半世纪是被瓜分的，这是波兰受俄国的民族压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不断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平均每一代人都举行过一次起义。波兰的大部分古典文学和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歌都凝聚着对俄国压迫者的仇恨。现在，在学校里就讲授这种文学，因为不可能把古典作家从教学大纲中抽出来。……有一件事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红军把波兰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这是可以用来改变波兰人态度的一张王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②

---

① 艾芙·居礼著：《居礼夫人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② 见亚当·沙夫著：《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附录“波兰的教训”，1981年德文版。

除了东边的沙皇俄国之外，波兰民族历史上的另一个主要宿敌，是波兰的西邻普鲁士王国。1870年以后，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德国就已开始梦想征服欧洲和世界。德国的御用历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提供了泛日耳曼主义、“历史使命”和“种族优越”等思想。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早在1861年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就说：“毒打波兰人吧，让他们失去生活的愿望，我本人倒也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们要想生存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灭绝”。俾斯麦在德属波兰采取了类似沙皇的统治方式。除了残酷地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斗争之外，普鲁士人还大力推广奴化教育。比如，1866年，成立了所谓“北德联盟”并把波兹南省并入这一联盟，推行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部分小学教育的日耳曼化；1876年，在德属波兰的行政和司法部门里开始只许使用德文，并大量任命了德国官员。同时，着手有计划地取消波兰语的地名、街名等等。在公文里，开始把波兰人的姓名德语化。这种日耳曼化政策也扩展到教堂，不准唱波兰语的宗教歌曲、念波兰语的祈祷书和用波兰语布道。1872年，俾斯麦下令把普占区内还不是德国臣民的波兰人迁走。1866年建立了普鲁士“移民委员会”，它得到的第一笔拨款就有一亿马克。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曾专门谴责过德国对波兰的这种关系，表示坚决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1847年，恩格斯指出："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别关心的。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人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①

众所周知，波兰民族对于德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为了消灭波兰，使用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手段。希特勒在波兰的总督弗兰克曾经说过："波兰人民的政治作用从此结束了。我们要使'波兰人'这个概念永远消灭。波兰共和国或者其他的波兰国家永远也不会再出现。波兰将得到殖民地的待遇，而波兰人则将成为德意志世界帝国的奴隶。"在德国占领期间，大片的波兰领土被并入第三帝国版图，在剩下的波兰土地上建立了所谓总督辖区。在并入帝国的波兰土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8页。

上，消灭了一切象征波兰的表现，大批驱逐了世代居住在那里的波兰居民，并且迫使留下的波兰人加入德国籍。至于在总督辖区，希特勒宣称，那里应当成为“一块特居地，成为一个巨大的波兰劳动营。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波兰人晋升到比这再高的水平上。”数以10万计的波兰人被运到德国作苦役，留在总督辖区的波兰人受到非人的待遇，凡能抓到的犹太人、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游击队员一律处以极刑，成百万的人被毒死、枪杀。在波兰土地上，有着人类难以忘却的最大的刑场，如奥斯威辛、麦丹尼克、布热津卡、华沙犹太区等等。3500万人口的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650万人，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比例最大的一个国家；在死的人中间，牺牲战场的约占8%，死于集中营、监狱和刑场的却占90%以上。

然而，波兰民族从未屈服过任何一个外来统治者。在长期的受压迫、受奴役的过程中，波兰人不仅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意识，相反，他们在斗争中真正造就出一种不屈不挠、独立自由的民族个性，以及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强烈执着的热爱和怀念之情。南斯拉夫著名记者和政论家、曾多年在波兰生活过的德·米利伏耶维奇，在他的关于波兰危机的专著中谈到这

方面的感受时说，他“对波兰人的第一个、基本的、经久不变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传统、对自己国家的杰出人物、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传统的崇拜会达到象波兰那种程度。这也和对自由的崇仰一样，不只是崇仰自身的自由，而且也崇仰别人的自由。众所周知，波兰人有一句传统的格言：‘争取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①的确，在波兰，无论是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职员，人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了解他们的先人为恢复独立、争取自由、摆脱奴役的艰难历史。从历史上看，波兰的教师和历史学家们已形成这样一种传统，即不顾当局的镇压，在讲台上和书本中向人们宣扬这样的信念：被外国统治者占领的波兰土地，最终必定要收复；波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应当恢复原样。例如在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支通过在巴黎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响亮地提出了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历史权利的号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诗人瓦迪斯瓦夫·勃朗夫斯基在闻名全国的诗篇《上好刺刀》

① 德·米利伏耶维奇著：《波兰在十字路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中，这样表达了波兰民族的整体情感：“在祖国存在受凌辱的帐目/外人的手也不能把它抹除/可是谁也不拒绝流血牺牲/我们从胸膛里，从歌声中，把它冲洗干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在波兰未能找到一个象吉斯林、贝当那样的败类（波兰人为此而自豪不已）；波兰人在抵抗运动中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并不都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在反对纳粹德国占领军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

在长期反奴役、反压迫斗争中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对于整个波兰民族的性格乃至每个波兰人的个性有着巨大的影响。

沙夫认为，“在争取民族生存和独立、反对压迫者和占领者的一个半世纪（只有两次大战的间歇时间有过独立）的斗争中，这种爱国主义在波兰人身上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特色。每一代人都曾为这个崇高的价值观念流过鲜血，每个波兰人都是准备为祖国而战斗、为祖国而献身的潜在的造反者。”他说：“谁都不会奇怪，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有时会演变成为民族主义，因为人们认为祖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总是好的。”

哥穆卡尔，这位波兰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也这样提到了波兰民族的性格，他说：“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象波兰民族这样敏感

地对待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这种敏感性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波兰国家10个世纪的悲剧和被邻国侵略者瓜分的波兰民族世世代代遭受的奴役，在我们民族心理中加深了对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问题的特殊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是其他长期以来就是独立的民族所不能了解的。”①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情感，构成了波兰民族的一个主要特点。它使得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后面将要提到的历次危机中，波兰公众总是用一种戒备的、有时往往是敌意的态度对待苏联和德国；为什么在每次大的抗议、罢工和社会动乱时期总会出现这方面的标语、口号和要求；为什么不论在什么时候，波兰党的领导人总是或多或少要强调、重申和肯定自己国家的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要求，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和尊重；为什么即便在东欧地区“斯大林化”最严重的时候，波兰比起它的一些东欧邻国来在许多方面都不那么过火，不那么唯苏联马首是瞻。

象波兰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已经指出的那样，波

①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1—72页。

兰历史给今天留下的另一个深刻的痕迹是，波兰人相对其他许多民族而言，多少是一个具有反权威、拒绝服从命令和与当局合作，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民族。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由于长期在外国占领者和依附于外来统治者的傀儡政权下生活，波兰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反独裁的态度，一贯对当局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情绪。他们拒绝服从来自最上面的组织的和行政的约束，拒绝用自己的行为增加现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象沙夫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的，在波兰民族的错综复杂的性格中，那种导致无政府状态的个人主义经常在起作用。它是波兰已经没落的“贵族民主”的某种继续。这种贵族民主是波兰失去独立之前曾经有过的，比如它主张“自由否决”。虽然波兰人的个性从中得到了张扬，但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则不够；他们往往在否定政府权威的同时，也否定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纪律。哥穆尔卡在1957年曾经指出：“也有一些传统习俗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上的负担，这就是：小贵族阶级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极其有害的传统，以及在异族统治下生活时期所激起的对于当局的固执的不尊重、不愿执行它的指令。在日常生活中，我国人民中间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也很突出，但是，一旦涉及外来敌人的问题时，又令人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团结一

致。”①有人说，波兰民族是愿意为了事业、为了自由和生存、为了独立而去死的了不起的民族，但又是最难驾驭的民族。

波兰历史留下的第三个印记是，知识分子一般在社会上享有某种特殊地位，对于公众和政治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安德热·科尔邦斯基认为，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在波兰社会中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向来被认为是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领袖；波兰人民对他们的政治统治者极不信任，却往往听从作家、诗人、学者和科学家的意见和启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波兰的政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旧贵族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尖子主义、非平均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其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长期的亡国和沦陷期间，拒绝与占领者和当局合作，坚持爱国主义、职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为了民族和个人的自由、独立而写作、呼吁，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从而赢得了广大波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最后，波兰的知识分子已习惯于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波兰知识文化界的精英，他（她）们对于世界科学和文化的贡献，不仅使波兰民众为之自豪，而且得到

① 1957年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的报告。

了世界的公认，象哥白尼、密兹凯维支、肖邦、显克微支、玛丽·居礼，他（她）们不仅属于波兰，而且也属于整个人类。在波兰的历史和现实中，每当遇到重大的政治事件（不用说危机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表现总是使人看到历史传统的影响。

宗教在波兰的重要性是举世皆知的。有人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宗教在三个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是：伊朗、西班牙和波兰。如今，波兰天主教教会拥有14000多座教堂和祈祷所，平均2500人就有一座教堂；它发行90多种刊物，一次发行量达200万份；它拥有22000个教理问答点和布道点，40多所高级与初级教义讲习所，十几所教会高中和职业学校，两所天主教高等学院；波兰人卡罗尔·沃依蒂瓦，为现今梵帝冈首脑即世界天主教领袖约翰一保罗二世教皇。普通的波兰人都知道，波兰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皮亚斯特王朝——的第一个大公梅什科一世就是波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公元966年波兰国家立国时，直接受罗马教廷管辖的波兰第一个大主教区在格尼兹诺也同时建立。波兰人之所以对教会有好感，不仅仅出于宗教感情，而且也由于在国家被占领、被肢解、被奴役时，教会为争取民族生存和人民权利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起了一种“地下政府”的作用，这与一些国家中教士

充当奴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平时教会也以传播上帝意旨、施善布道、反对专制的面貌出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许多人把教会称为波兰人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亡国日子里，波兰人正是利用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和路德派新教的区别，同外族占领者进行斗争，捍卫了波兰的民族特点。今天，波兰有90%以上的人信教，共产党员也可以是教徒并且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洗礼，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历史上看，波兰一直属于西方国家的范畴，它具有文化、思想和政治的欧洲古典传统。波兰第一个大公梅什科一世在公元10世纪时娶捷克公主道布拉瓦为妻，皈依了基督教和接受拉丁文字，从此对波兰教育制度和建筑风格（起初是教堂，以后是各种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波兰在10世纪时已有了典型的欧洲式城市，商人们在这里获得了各种便利权，形成城市审判庭和代表会议。在各独立公国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过程中，过去属于大公的各个区域，变成了省或地区，并保持着自己的行政机构、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等级制代议机构。这种历史遗产——议会的独立的、不受干涉的权力，以及各种利益代表之间形成各自的党派、集团——以某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至少在形式上，波兰始终

保持着多元化的政治和多党制的传统。1364年创建的克拉科夫学院，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被誉为欧洲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波兰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在波兰出版了约7000种书籍，有波兰语、拉丁语的，也有德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16世纪时市民文化出现了全面的繁荣，建筑师、艺术家、手工艺者的大量涌现，宫殿、城堡的修造，市政厅和公共设施的出现，给艺术活动和思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世纪以后，启蒙运动在波兰获得巨大反响。一切有教养的人都学习并懂得法语；沙龙和社交生活的其他方式广泛流行；在华沙的书店里，可以买到法国最新出版的政治、技术书籍及诗集等；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学说、重农学派的主张及一切有批判力的思想都得到了传播；欧洲古典主义的风格和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波兰得到充分张扬。波兰人甚至直至今天仍对法国及法国文化抱有特殊的好感。西方文化的精神深深溶铸入波兰民族的个性和心理之中。

有必要提一下波兰在外国的侨民问题。波兰现有人口3700万，而它在外国侨民就有1000万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国外的亲友。从19世纪下半叶起，直到20世纪初，波兰人由于各种原因，大批向

西欧、北美迁移。几代人移居的结果，使北美、南美、德国、法国形成了大批波兰人后裔居住区，他们逐步在商业、贸易和政治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尽管波兰在1945年以后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但这并没有割断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波兰在当代东西方关系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和显示器。

历史与现实是割不断的，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它们之间的联系。

第二章

错误和歪曲的时期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做动态的考察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古老的概念越来越不适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取决于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政治权力体制的变化——这特别在危机时期中会强烈地感受到。"

——布鲁斯

在波兰人的记忆里，1948年至1953年是一个"错误和歪曲的时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错误的政策，造成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时期。的确，1956年以后的循环式危机的根子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和滋长起来的，它也是社会主义的波兰移植苏联模式的时期。

为了有一个对比和合理的解释，在分析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化"时期之前，需要先对波兰从解放初到1948年这段时间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44年7月下旬，苏联红军解放了维斯瓦河右

岸的波兰东部领土，与此同时，由共产党人、左派社会党人、激进的农民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这是波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府。

战争中处于地下状态的波兰工人党（即共产党）这时处于最活跃状态。左派社会党人重建的社会党与战前的社会党相比要激进得多。农民党激进派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激进的农民党。进步的知识分子则组织了一个民主党。各个党派在解放国家、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和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等方面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成立的同时发布了政纲宣言。宣言废除了1935年4月颁布的反民主的、独裁的宪法，承认1921年宪法为唯一有效的宪法。宣言保证要使国内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实现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宣言提出，必须无偿地没收德国人的大地产，将之分给劳动人民。它宣布，主要的和最大的工业、商业、运输业企业和银行以及森林将由国家暂时管理。在外交政策方面，宣言认为，必须与苏联和捷克结成持久的同盟；它也希望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友好相处并实行合作。

根据1944年7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把战时在苏联建立的波兰军队和在国内进行抵抗活动的军队加以合并，成立了波兰人民军。苏联为此提供了装备和教官。同时，还成立了公安局，规定警察归它领导。

同年8月2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一、二级总行政机构（一级是以县长为首的县级机关，二级是以省长为首的省级机关）。9月，又授予乡、市、县、省人民代表会议以规划公共活动、监督政府和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

1944年9月6日，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了土改法令，规定无偿地剥夺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东部地区耕地面积在50公顷以上者、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等省总土地面积（不光是耕地，包括庄园、森林、牧场在内）在100公顷以上者，其土地一律没收。据1939年统计，波兰2000个大地主人均拥有土地3000公顷，其中一些大户拥有土地更多，如萨莫伊斯伯爵有近20万公顷土地，腊济维尔亲王有7万多公顷土地。经过土改，封建大地主所有制被消灭了。在以前的波兰土地上，根据土改法令，农民共分得耕地240万公顷；稍晚一些时候，在收复的西部土地上*，农民共分得370万公顷土地。还有800万公顷

* 根据1945年雅尔塔决议，波兰获得了德国东北部的一部分土地，波德边界确定为“从波罗的海沿着奥得河和西尼斯河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以东”。

的庄园分给了农民。1944年12月12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又颁布法令，将25公顷以上面积的森林和林业用地无偿收归国有。

194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法令，规定：1.凡原属于德国的企业（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无偿地国有化；2.每班雇佣5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或虽然每班工人不足50名，但对国家经济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通过赎买方式国有化。根据这一法令收归国有的各类企业共有3300多家。

波兰在1945年4月21日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波兰与其东邻关系的决定性转变。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国家。苏联红军在波兰从纳粹德国侵占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波苏第一个贸易协定是在1944年10月20日签署的。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按低息贷款的原则向波兰提供了面粉和石油制品。1945年1月华沙解放后，苏联立即向华沙居民提供了30000吨粮食和其他物品，此外，波兰还得到了5000万卢布和1000万美元的苏联贷款。刚刚经历了纳粹德国蹂躏的波兰，是十分需要苏联的援助的。波兰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在后来（1956年11月15日）曾经解释了与苏联结盟的原因，它是这样说的：

“波苏同盟——对我们来说这个同盟是一个极关重要的和基本性的问题——的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个考虑是：在以目前的疆界为国境，并增加了古代皮亚斯特王朝的土地的波兰，它的一边的疆界稳固地同波罗的海相接，而另一边的疆界划在奥得-尼斯河分界线上；这样的一个波兰是某些势力的一个眼中钉，因为这些势力既没有忘记波美拉尼亚的容克贵族地产，也没有忘记西里西亚的当纳斯马克斯铸造厂和格但斯克造船厂以及条顿人的城堡。……

第二个事实是：波兰位于‘向东进’的传统路线上。……轰炸华沙就是轰炸莫斯科的前奏，只有苏联由于法西斯侵略所遭到的损失比得上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人的战争损失。

第三个事实是：苏联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不是由关心征服和关心使其他国家从属于自己的那种阶级统治的。相反地，两国的领导力量都是这样的党，它们的纲领和活动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源泉，它们都是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革新的部队。

……正象苏联士兵在解放波兰的时候以自己的鲜血清除了在几百年的沙皇压迫时期对波兰人所犯的罪恶一样，在波兰废除了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

义这一事实就使波兰进攻俄国和我国成为反苏基地的事永远不可能发生，相反，它创造了在波兰和俄国之间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可能性。"①

应当看到，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在一开始时是正常的。波兰人按照自己的传统，在推翻旧制度的同时，独立自主地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直到1948年以前，基本保持了这种自主性。虽然总的看政治力量、政治形势的天平越来越趋向"左"的一边。

1946年6月30日，波兰全国曾进行过一次全民咨询性投票。在这次咨询性投票中，要求每个投票人用简单赞成与否的方式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你是否赞成取消上议院？"第二，"你是否同意在将来的宪法中保持由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同时保留私营企业的某些合法权利？"第三，"你是否希望把波兰国家的西部边界固定在波罗的海、奥得河和乌日茨卡尼斯河上？"根据发表的公报，投票结果如下：有投票权的共13604451人，参加投票的共11857986人，其中无效票327435张，有效票11530551张。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同意"的为7844522人，回答"不同意"的有3686029人，分别占有效票的68%和32%。这表明，大多数人对取消带有封建贵族时代

①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178—179页。

的上议院机构是支持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制度抱有依恋态度。对第二个问题回答“同意”的为8896105人，回答“不同意”的为2634446人，分别占有效票的78%和22%。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温和的公有化是肯定的，他们不希望再看到大所有者的剥削和专制，同时也希望保留个人进取和创业的机会。对第三个问题回答“同意”的为10534697人，回答“不同意”的为995854人，分别占有效票的99%和1%。这表明，绝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在领土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历史经验使他们在涉及民族和国家生存的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态度。

咨询性投票后不久举行的全国大选，更加清楚地表现出这一时期波兰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基本立场和倾向性。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波茨坦决议的要求（这项决议中有关波兰的条款希望波兰尽快地举行大选，使新政权建立在充分反映民意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的基础上），1947年1月，波兰全国举行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大选结果是：波兰工人党（共产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这四个党的民主阵线的候选人获得80.1%的选票，主要反对党——右翼的和保守的波兰农民党(PSL)获得10.3%的选票，其余的选票为一些小的党派获

得。议会的政治成份如下：在444个议席的议会中，波兰社会党有116名议员，波兰工人党有114名议员，农民党有109名，民主党有41名，波兰农民党有26名，劳动党有17名，“波兰农民党——新的解放”有7名，天主教社会议员俱乐部有3名，其他党派2名，无党派人士9名。投票结果清楚地显示，民主阵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选后不久，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共产党人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当选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接着，组成了以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西伦凯维茨为首的新政府。共产党的哥穆尔卡担任了副总理。

大选以后，波兰的政治气氛明显地有利于左翼阵线一边。波兰农民党由于选举的失败加快了自己的解体，它的右翼领导人斯·米科拉伊奇克等在1947年秋天流亡国外，其左翼领导人随即与民主阵线建立了合作关系。

当时的国际局势对波兰政治格局的这种变化亦起到推动作用。波兰历史学家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和马里安·瑞霍夫斯基认为，从1946年起，美国为了动员扶植反苏力量，给西德以大量援助。美国国务卿詹·贝尔纳斯公开对德波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上的边界表示怀疑。流亡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

首脑声称："我们不要弗罗茨瓦夫，也不要什切青"，迎合西方的修改边界的人和复仇主义者的要求。而波兰农民党的右翼领导人也在边界问题上持暧昧态度。"这种情况使全国人民更容易地看到波兰农民党的政策和波兰国家利益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苏联坚定地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和奥得河及尼斯河边界，对苏联的感激心情增长了。反动势力和波兰农民党赖以为生的反苏情绪降低了。"①

在政治形势发生如此变化的同时，波兰经济处于逐渐恢复过程中。1946年6月，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和苏联的粮食援助，波兰政府取消了农民的实物义务交纳，使农民大大减轻了负担。在工业生产方面，1946年达到了战前最高水平的75%，国民收入达到1938年的67%。居民的限额供应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善。在战前，失业是一个真正的灾难，现在几乎完全消灭了。学校得到重建，某些类型的学校甚至有所发展，比如，各种职业学校在1937/1938学年时只有1489所，而在1946/1947学年中有1992所；高等学校的相应数字分别是33所和44所。尽管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在这时仍是困难的，但国家在重建方面的进展和向好的

① 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和马里安·瑞霍夫斯基合著：《波兰简史》，第321—322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方向变化的趋势却是每一个波兰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在1948年东欧各国开展全盘“苏化”的运动之前，波兰曾经有过独立发展、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这是基于对国情、传统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提出来的，它也反映出波兰在解放初期的相当自主的地位。在整个国际共运中，40年代中期，只有西方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以及“东方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了类似波兰的主张。这四个国家的共产党，被认为是战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最早和最重要的代表。

从1946年新政权站稳脚跟以后，波兰工人党（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的共产党就开始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试图按照波兰特点制定出一条可行而有利的社会主义纲领。在广泛、热烈、无拘束的社会变革讨论和思想交锋中，人们广泛地谈到了后来被称为“波兰式道路”的设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哥穆尔卡1946年11月30日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下面，是他的这个讲话的摘录：

“有些人经常重复地说，波兰工人党力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道路在波兰走

向社会主义。无需证明，这些人这样说，不仅表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他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歪曲政治现实和更好地同我们党进行斗争。

……

我想首先提请你们注意苏联和波兰所特有的发展道路的三个根本的、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我国是和平实现的。

第二个区别是，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表明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第三个区别是，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我国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

……

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

也无目的。我们认为，我国的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

我们的这一立场产生于波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我们的民主和我们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史无前例的。迄今的经验表明，它以良好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的民主不同于苏维埃民主，正象我们的制度不同于苏维埃制度一样。

在解决了阶级对抗问题的苏联，只有一个党——共产党，而在我国则有几个民主政党在公开活动。

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目前的形式是全国人民会议，而以后将通过选举产生议会。

我们的民主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我们的社会制度称之为人民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在现存的条件下，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民主行使国家政权的方式来进行，在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必通过工人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行使政权的形式不

一定仅仅体现在代表会议制度上。波兰可以，而且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也希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提出波兰的发展道路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两党行动一致，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整个民主阵营的统一和行动协调，是这一概念的基础。”①

“波兰式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波兰已出现的工人自治的雏形的理论肯定和说明。在波兰解放后不久，许多工厂企业建立了“集体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企业，防止盗窃和转移财产，保证尽早进行正常生产，维护工人职工的切身利益。这些“集体委员会”大都是自发产生的，它们的领导一般是属于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工人，或者是战前在工会工作过的人。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新时期的到来，“集体委员会”工作性质发生变化，由保护工厂变成真正的利益代表机构，它们的名称也改成了“工厂委员会”。在许多工厂企业中，工厂委员会在领导生产、确定收入、交付商品等方面，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一段时期内，它曾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法律的许可。1945年2月6日，政府通过了《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规定了工厂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它在企业中的地位；1947年，政府又对

① 见波兰《新路》杂志1947年第1期。

这一法令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南斯拉夫学者扬科·克里科瓦茨在《波兰的工人委员会》一书中高度评价工人自治的这种早期的形式说："工人们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实现工人阶级更广泛、更崇高的目标。这些目标超出了政治流派和党内派别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以这种方式实现在基层的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并在实际上指出了摆脱整个国家困难处境的可能性和途径。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波兰在1948年以前的发展和变化都是令人鼓舞的和充满希望的。

然而，从1947年底、1948年初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改变。

1947年9月间，苏联在波兰的斯卡日斯科·波连伯召开了东欧7个人民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共产党参加的代表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苏联、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会议。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基调的报告。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共反苏势力在世界各地越来越猖狂，而在过去这几年中社会主义阵营对之缺乏强有力的反击，甚至出现了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言行。他强硬地阐述了斯

大林的加强纪律的大一统方针，谴责了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并且提议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及时“通报”情况，协调行动。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表示要纠正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本党政策；除南共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也都按照新的要求作了自我批评，并对一个时期以来贯彻苏联模式不力的现象加以指责。

对南斯拉夫攻击、责难并且将之开除出“阵营”，是情报局成立后主要致力的事情，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内“斯大林主义化”的全面展开。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铁托的领导下，已鲜明地表现出实行独立发展、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态度。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战后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顽强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对此极为反感和不满，利用情报局这个工具对南斯拉夫展开批判运动；到后来，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1949年情报局通过标题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进一步在“理论上”论证了南共的“法西斯独裁性质”，彻底断绝了南斯拉夫同“阵营”的关系。

情报局的成立和南斯拉夫的遭遇，对社会主义各国中曾经萌芽的独立发展的要求，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情报局成立之后，在斯大林主义和波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波兰的社会政治局面急剧“左”转。

首当其冲受到这股浪潮冲击的，是哥穆尔卡这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鼓吹偏离苏联的伟大道路的波兰方向”的党的领导人。

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兰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它对党的领导层内关于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作了结论，按照苏联和情报局的要求重新规定了方向。会议决议指责哥穆尔卡犯有“右倾民族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其总书记职务，由贝鲁特接替。

同年12月15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两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担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这两个原先是平等合作的政党，现在已无“平等”“合作”可言，党与党的差异以及党内原有的不同倾向被作为“异端”而消除。这是波兰“斯大林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精神，这次代表大会制订了《思想宣言》，其中规定要从经济生活中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同时要把小农

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从这时起，波兰开始全面搬用苏联模式，采纳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计划和管理体制。

也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波兰首先在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中进行了大清洗。1949年11月11日至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议程是："目前形势下党为革命警惕性而斗争的任务"。阶级斗争必然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趋尖锐化的理论在会议上占了主导地位。会议决议谴责哥穆尔卡等人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并指责哥穆尔卡"拒绝帮助党来彻底揭露钻进各级领导岗位的外国间谍机关代理人"，决定将哥穆尔卡开除出党。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刊物《新路》杂志，在1949年第12期上曾刊登了这次会议上人们的批评发言。从发言情况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波兰共产党内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亚·萨瓦斯基说："提到哥穆尔卡同志，就应该肯定，在波兰发展道路问题上，他代表着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代表着与苏联相反的所谓波兰道路的理论。他已看到，为了实现这些企图，就要依靠自己的、哥穆尔卡式的政党。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哥穆尔卡同志在所谓

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也必然会这样。”

副总理、国家经委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明兹说：“由于《新路》第5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维斯瓦夫（即哥穆尔卡——引者注）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抨击奥哈布同志，他认为这是无的放矢。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质的明确而又定型的观点，直到1949年底才阐述出来。1945年的国家并不和1948年的国家一样。事实上，我们党的领导，象其他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一样，还没有关于人民民主国家实质的定型观点。问题不在于这一点，问题在于维斯瓦夫同志从人民民主道路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以所谓波兰道路来反对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

哥穆尔卡在这次会议之后又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1951年在大清洗最猖獗之时，他被捕入狱，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

波兰战后一度有过的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局面此时已不复存在。斯大林的“大一统”要求尤其在政治体制中表现出来。在两个最大的政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的同时，1948年，波兰的几个主要的青年政治组织和团体——青年斗争联盟，工人大学协会青年组织、农村青

年联盟和民主青年联盟也合并为一个“波兰青年联盟”，直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和合并的趋势使得两个农民政党——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也在1949年合并为“统一农民党”。劳动党则于1949年解散，其成员大都加入了民主党。波兰的政治格局，由1946年时的6党联合执政变成了1948年的3党结构，其中，统一工人党起着决定性的、实质性的作用，其他两个党则成为摆设。希·明兹在《新路》月刊1949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表达了要在波兰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的愿望。他在文章中还说：“弥补历史上损失的时间，要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事情很清楚，随着各个人民民主国家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它们与苏联在制度上的差别就将缩小。”①

按照以往的传统作为最高代议制机构的立法议会，其作用简化到几乎成为一种摆设，全部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更确切地说，是掌握在由政府总理和副总理组成的主席团手里。副总理作为一个极其狭小的政治领导集团的成员，分别领导着某几个部门，这些部门的部长都直接听命于他们，缺少工作独立

① 转引自瓦·罗兰茨和阿·沃帕特卡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波兰的经验”，《新路》月刊1984年第10期。

性。而副总理乃至总理又是按照党的（即中央政治局的）统一决议、指令行事，任何独立的言行都可能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在波兰这个具有西方民主传统的国家，到这时为止，虽然形式上还有法律的权威，但已不是由议会、而是由国务委员会进行立法活动，这类立法活动大多简化为通过一纸法令的方式。

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的波兰工会，此时其作用已降低到仅仅是为政府工作，解释政府法令，执行政府决议，向政府汇报工作和接受政府控制，它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工人利益代表机构的职能，专门向工人灌输劳动纪律，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工人，限制和取消工人的福利待遇，等等。曾经是独立的、多种多样的行业、部门工会，到1948年以后变成了单一的、直接受控于官方的工会官僚机构。在工人眼里，它已不再是“我们的”机构，而是“他们的”代表；波兰工会曾经有过的崇高威信丧失殆尽。①

波兰军队从建国以后一直受控于苏联和苏联军人。在波兰军队中，不仅有苏联的武器装备、苏联的军事教程和苏联的战术教官，连国防部长都由苏联

① 在历史上，波兰普通人习惯于将自己与官方用“我们”与“他们”的称呼区别开来。这种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元帅担任。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朱可夫元帅手下工作，由于他在担任集团军司令期间的出色表现，荣获元帅称号。因为他母亲是波兰人，所以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往波兰，担任波军最高指挥官职务。直到1956年“波兹南事件”之后，他才奉调回莫斯科。

东欧各国在“斯大林化”期间的一个共同情况，就是建立了庞大的警察保安系统。波兰也不例外。在“大清洗”期间，波兰的警察保安部门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些“执法者”无法无天，肆意妄为，许多无辜者被逮捕，受刑讯，造成到处是恐惧、猜疑、惊吓和敌对的气氛。到“大清洗”高峰时，在军队、政府和政治核心中对领导人实行了清洗，最先受到打击的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然后轮到战争期间在波兰本土上进行抵抗的地下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作为主要受害者之一的哥穆尔卡，在1957年回忆说：

“我不想更多地去回顾过去那种个人崇拜体系的统治的悲惨历史。它违反了民主原则与法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人心与良心被折断了，人们被践踏着、污辱了他们的尊严、诽谤、欺骗与虚伪，甚至挑衅被视为实行政权的工具。

在波兰，也发生了这种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

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另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了许多年，虽然他们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①

不过，需要指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传统方面的原因），波兰在“大清洗”时期的受害程度相对于东欧其他国家来说还是要轻一些。例如，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波兰，始终没有形成苏联30年代末大审判那样的，或匈牙利40年代末布达佩斯审判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政治诉讼事件。虽然有几次内部进行的对高级军官的审讯，但最终到底没有造成残害最高党政军领导人的政治案件；受清洗、受迫害的人绝大多数都活过来了。象科尔邦斯基所说的那样，“波兰的苏维埃化过程结果比东欧其他地方流血少，没有那么残酷”。

在“斯大林化”时期，波兰党和政府同教会的关系达到了最尖锐的紧张程度，40年代中期一度曾有过的平静共处局面急剧转变成对教会的迫害。波兰教会首脑、红衣大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被勒令暂时停职，并且被赶入了一所修道院；由一个对政府唯命是从的教职人员奉命担任了教会首脑。议会在1950年3月还颁布法令，决定由国家接管教会的地

① 见《关于波兰目前形势》，第27页。

产，只给神甫们留下作为其生活来源的一点土地。意识形态和宣传机构，按照苏联的要求，对宗教信仰和教会本身进行了猛烈严厉的批判。

斯大林时代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具有伟大的文化传统和众多杰出人物的国家——从文化上讲——也无疑是一场劫难。从40年代末以后，在文化和艺术生活中，硬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当作唯一的方针，使真正的创作变得毫无生气。“为政治服务”、“与工农结合”的口号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强行贯彻到文艺创作中去；作家、艺术家必须时刻想着田野、采掘工作面和前沿阵地，在创作中贯彻劳动者至上的原则，任何自我表现的意图或利用现代西方艺术创作技巧的手法都会受到严厉的指责，甚至造成无穷尽的麻烦。对于波兰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和难以忍受的摧残，因为波兰在几乎艺术的所有领域中都有着悠久的古典传统和卓越的成就。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会被束缚在“无冲突社会”的模式里，用一种行政官员指定的创作手法，专门去反映和歌颂“正面英雄”，结果是严重的。在整个“斯大林化”时期，波兰没有出现任何具有有世界影响的艺术作品和流派，无论电影、戏剧、诗歌、小说等等都是如此。

德·米利伏耶维奇认为，这个时期的象征性的一种反映，就是华沙的部分建筑物，如文化宫、宪法广场等等。它们的形式，同传统中的华沙城市结构、居民生活方式、人们的习惯和要求毫不协调。它们那时是、现在是、将来也都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物”——在那个时代，虚浮的宏伟和枯燥乏味，与生活的需要格格不入。所以，斯大林时代已使波兰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它的整个特有的社会本质、它的全部特征、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都要安放在这种制度的“普罗克鲁斯特床”上。① 这既不适合波兰的躯体，也不适合它的气质。②

为了适应“大一统”管理和指挥的需要，波兰在这一时期也建立起了庞大臃肿的国家官僚机构，其式样完全是“苏化”的：

1948年2月4日，波兰成立了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它成为中央计划机关和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中枢系统。计划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副总理级，并兼任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工业贸易口就建立了6个部：采矿和动力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国内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在建立

① 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追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比床长的就砍去其足，比床短就就把他拉长。

② 见《波兰在十字路口》，第39页。

经济管理机构的同时，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开始发向经济的各个层次、各个单位，渗入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同年3月，波兰工人党中央经济部举行会议，强调：国家正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使私营工业和手工业成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会议专门讨论了使私营工业服从于计划的方法和手段问题，要求强制地使私营工业从属于国家工商部门。

1949年2月，波兰议会颁布撤销中央计划局和建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要求在各省和县上也相应建立起经济计划委员会。

同年3月，议会又颁布国家监察法，决定设立最高监察院，以取代过渡时期的监察局。最高监察院仍隶属于部长会议，但它的权力大大扩展，获得了对国家政策方针和经济计划进行监督的权力。

1950年3月，又颁布人民会议法，决定改变地方的行政体制，取消地方的临时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由所谓的“人民会议”（实质上是上面任命的行政机构）取代其职能，将立法和执法职能合二为一，彻底否定了制衡原则。

这一年9月，议会发布法令，决定撤销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由政府主席团行使其职权。

1952年9月，政府又新建了许多部，如机械工业部、冶金部、木材和造纸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等等。

……

在“斯大林化”之前，波兰经济中值得一提的事实是恢复时期的三年计划(1947—1949)。这一计划比较符合波兰的特点，在执行过程中对波兰经济也起了较好的作用。三年计划的最初草案是1945年12月波兰工人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是为使人民生活水平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创造条件。这一时期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低，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不快，但它是根据当时条件确定的。这在后来受到了批判，被指责为“右倾保守”。

1949年11月15日，波兰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公布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执行情况公报，宣布三年计划的完成只用了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同时强调，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必须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速度。公报对已经宣布了的六年计划（1950——1955）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调整。

六年计划规定的目标是，靠大量增加投资数额，优先发展为工业化进程服务的部门。计划提出，要通过扩大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达到改变国民收

人结构的目的。此外，这一计划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无论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波兰的经济都要达到“完全自给”。

1950年7月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六年计划再做修改，把原计划的国营工业产值增长85—95%的指标，提高到增长158%。随后，波兰议会通过“关于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六年经济计划法”。计划法规定，1955年的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114.3%，年平均增长13.4%，居民的收入将提高50—60%，工业生产应增长136%。规定，要彻底消灭城市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并把大部分小农户改变成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在六年中应增加50%。10月26日，议会又颁布法令，确定了企业活动的法律基础。规定了企业活动应建立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有权得到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依靠国家预算拨款，企业实行由部长任命的厂长负责制。

从六年计划开始，中央计划成为领导国民经济的指针，主要手段是指令性指标和行政命令。每个企业的生产计划由中央管理局确定，评价企业活动效果的标准是总产值。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几乎失去任何自主权，完全成了国家的附属品。国

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从此确定。

为了保证重工业的发展，投入了从比例上看大得惊人的巨额资金，对工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46%；为了满足投资的需要，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积累，积累在供分配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年计划时期的年均17.2%，上升到30%左右，1953年高达38.2%；消费所占的比重，从82.8%下降到61.8%。

六年计划期间，由于价格变动和商品种类的变化极其复杂，难以精确估价消费情况。但总的事实是，消费的增长极其缓慢而且不平衡，在某些阶段（如1952——1955年间）有下降现象。居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更慢。据估计，这一时期名义工资增加了128%，但生活费用支出增长了119%，因此实际工资只增长了9%。①

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极其缓慢：整个六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到30%，平均每年5%。有的部门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甚至下降了。例如波兰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的煤矿采掘业就是如此。1949年，即三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煤产量在7400万吨以上。在六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5年)，煤产量为9450万吨。这些数字表明，煤产量增加了

① M·米夏克：“波兰经济发展的光明面与阴暗面”，波兰《问题与资料》杂志1984年第26期。

2000多万吨。假如这种增加是煤矿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那的确可以认为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但是统计材料表明，矿工们在1955年超时工作了9263万个小时，这等于当时总的工作时数的15.5%，相当于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以外采掘了1460万吨煤。从煤矿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看，1949年每个工人每个工作日的采煤量是1328公斤。到1955年，跌到了1163公斤，就是说，降低了12.4%；地下采煤工的日产量下降了7.7%。1955年同1938年相比，每个煤矿工人每个工作日的产量下降了36%。而且，“当时采用了星期日工作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损害工人的健康和体力，同时很难使煤矿设备保持能够进行正常工作的状态。当时还在部分的煤矿中采取了用军人和犯人工作的做法。采煤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固定，每年更换的人数占很大的百分比。这个政策只能损害采煤计划，只能造成煤矿现在的状况。”①

农业的情况比工业更糟糕。

在农村中也模仿苏联的集体农庄推行了合作化运动。《波兰简史》的作者指出，在那时，“企图迫使现实适应计划，不管计划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许多农民对使用行政手段推行小农经济集体化的纲

① 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领不满意。为了扭转他们不情愿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采用了各种不合法的高压手段。到1955年共建立起9963个生产合作社，占耕地面积的6.9%。这些方法扩大了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分歧。结果，农业生产停滞，加重了收购和供应的困难，而这又必然要引起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越来越多的批评。”①

为了促使农民入社，国家在各方面对农业合作社采取了不必要的优惠政策，滋生出一系列弊端。

国家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少缴土地税和农产品义务定额。国家提供的另一项津贴是国营拖拉机站为农业社服务的津贴。在1952年到1955年期间，政府给国营拖拉机站的补贴总额为17亿兹罗提——国营拖拉机站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内部实行了平均主义原则，规定：不论一个农业合作社的经济收入如何，社员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工资收入。全国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日工资大约为25个兹罗提。由于不是所有的农业社都能支出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日工资，政府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延期缴纳农业合作社欠国家的贷款，已准备用于交纳国家贷款的款项，拨充工作日工资经费。从全国来看，这笔钱高达5亿兹罗提。用这样的办法，人为地增加农业合作社的

① 《波兰简史》，第329页。

个人收入，使得政府有可能实现“提高工作日工资27%”的目标。农业合作社在购买化肥方面也获得了优待。在1954——1955年度中，农业社每公顷所施用的化肥为58.6公斤，而个体农户在同一时期内仅28.1公斤。农业社从国家那里得到了大笔的贷款。1955年底，农业社的长期和中期债务达16亿兹罗提以上，短期的有9亿兹罗提。

正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严重依赖国家，它的经营状况十分糟糕。生产成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下降。1955年，个体农户占有78.8%的农田，合作社占有8.6%的农田，国营农场占有12.6%的农田。如果把它们的总产量算作100，则总产量的分配情况如下：个体农户占83.9%，农业生产合作社占7.7%，国营农场占8.4%。优惠最多的国营农场单位面积产量最少，农业合作社比国营农场好不了多少，而几乎没得到什么照顾的个体农民却拥有最高的劳动效率。无论如何，这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

从可耕地单位面积产品价值上比较，可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以不变价格计算，个体农户每公顷创造价值621.1兹罗提，农业社为517.3兹罗提，而国营农场为393.7兹罗提；个体农户比农业合作社高出16.7%，个体农户比国营农场更高出37.2%。

由于错误的集体化政策，1951年和1952年的农

业总产值比1950年还下降了。在“斯大林化”期间，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原先许下的六年计划期间增加收入50——60%的诺言根本无法实现，而党和政府却告诉人们实际工资增长了27%。特别是在城市里，人们对短缺、匮乏现象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

在越来越恶劣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下，意识形态机构那种粉饰太平的宣传，使人们特别反感。然而，正象德·米利伏耶维奇和其他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最使波兰人民感到透不过气来的，是压在波兰社会上的、迅速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官僚机构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的沉重的负担。官僚政治已渗透到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之中。斯大林在30年代苏联创建的那一套“大一统”体制，这时已在波兰整个地竖立起来。在官僚等级阶梯上的每一级上，都站立着这种体制的有权势的体现者，他什么都知道，决定着一切。不论这些权势者是否有才能或知识，只要他保留着他的地位，他就被认为是最正确的人。这个体制束缚住了人们的头脑，构成了党和国家大批工作人员思想方法的模式。一种职业官僚形成了，波兰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顽固的弊端形成了。证明这一点的一个证据是，在以后波兰社会历经的各次危机中，官僚主

义、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者总是成为人们最激烈抨击的对象，但它又从来没有被彻底根除过。鲁罗夫·巴罗说："官僚主义早已不再是信手拈来的一种外来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由享受特殊利益的人所组成的庞大集团的天然的政治存在形式，这些人分别麇集在权力机关这棵大树的主干、支干和小树上。……这一社会集团主要占据整个政治的、国家的和'社会的'领导等级组织的主要职务，包括军事、警察和意识形态部门，即最广义的庞大的党和国家官吏及高级经济官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的发展趋势是同直接生产者（包括专家，尽管他们的一部分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中去发挥咨询作用）相对抗。"①这种"由享受特殊利益的人所组成的庞大集团的天然的政治存在形式"，具有一种不断增大的惰性和自我服务自我保护倾向。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斯大林化"这段时间都给波兰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祸根。波兰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经历了30年代苏联同样的演变。这里讲的"同样"是指本质性的特征而言的。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的东西，是导

① 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1977年德文版，第9章"党和官僚机构"。

致在波兰这样一个非常不同于苏联的国家中出现与苏联一致的现象的根源。正如我们已经叙述过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党政“大一统”、专制和集权，使得波兰的政治由多元化局面逐渐变成一元化结构，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一党专政，曾经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变成了政府（归根结底是党）的附庸，任何与“中心”要求不符合的思想（比如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受到讨伐、批判，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取代了多种声音同时存在的格局；在经济生活中，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系为中心的、纵向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限制甚至牺牲人民群众发展消费的要求，依靠强迫集体化、加速重工业化、扩大积累比重等手段，追求某种不断增长的物的目标。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一个自我膨胀、靠损害人民利益而扩大的官僚机构的指导下完成的。对于这种官僚机构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口号，一个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标签，而不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不是以人为中心、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

所以，1948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被波兰人称为“错误和歪曲的时期”。

第三章

波兹南事件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来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受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哥穆尔卡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去世，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了缓慢的“解冻”过程。

1953年7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同意采取坚决行动来粉碎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罪恶活动”。7月全会强调了“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为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开了序幕。这之后又进行了重新审查一些重大的政治冤假错案（如“列宁格勒案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谋害案”）的工作：恢复了许多受害者的名誉，使社会感受到恐惧的减轻。这一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了农

业的落后状况，提出了“急剧发展农业的各个部门”的要求，并对以往忽视和牺牲农业及人民消费的政策作了检查；在这次全会上，尼·谢·赫鲁晓夫当选为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加速了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进程。1956年初举行的苏共二十大和较早些时候苏联主动采取姿态与南斯拉夫和解，便是这一进程的两个决定性步骤。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期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整个国际共运、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

由于觉察到人民群众的怨恨和不满，在苏联发生的一切的推动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从1953年底开始，小心翼翼地、极其缓慢地作了一些纠正和调整工作。

1953年10月29日至3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贝鲁特主持下召开了一届九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提纲。提纲认为，六年计划的头几年，“社会主义工业获得很大发展”，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首先是农业的发展缓慢，工业消费品的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因此，六年计划头几年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计划没有完成。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农业生产和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此基础上迅速提高城

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4年3月10日至1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部类的生产和投资赶不上第一部类。因此，要求加快与农业有关的部门的发展。会议决定，六年计划的最后两年应使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发展保持相同的速度，对农业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到这时为止，波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仍然只是在经济方针和具体政策方面作出某些变化，闭口不谈在“斯大林化”时期所犯下的政治错误、冤假错案和某些根本性的问题。直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情况才多少有了一点变化。在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确立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正常关系，重大的决定不能在一个狭小的领导圈子中作出。全会特别讨论了内务部门的工作，作出了改组内务部门的决定，撤销了负责内务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的职务，成立了社会安全特别委员会。三中全会使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中的气氛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不久又传来了释放一批被囚禁、被审讯的无辜者的消息。到1956年时，已释放了3281人。

最大的冲击是苏共二十大造成的。1956年2月，

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以确凿无疑的证据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在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同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中，向世界公开说明了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的根源、性质、表现及其后果。尽管大会及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从体制中寻找造成斯大林现象的根源，但是，将斯大林的神话揭穿，披露掩藏在官僚机构深处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这本身便足以使人震惊、反省和醒悟。正如许多人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那样，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各种各样的共产党人都是一颗重磅炸弹，真正的共产党人先是震惊，继而是痛苦，他们不愿相信这一事实，但他们最终还是正视了现实，从这时起，他们开始了独立思考、认真反思的过程；斯大林体制下拼命往上爬或使劲整人的人则对报告感到惊恐和不知所措，这种人此时唯一希望的是能够逃脱受历史审判的命运，更多的人还在等待和观望，尽管他们从心底是希望二十大的路线能够得到贯彻的。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报告无动于衷。①

① 这方面的一个良好分析，是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的杰出著作《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科隆欧洲出版公司1978年捷克文版。作者形象而深刻地分析了他本人和其他许多人当时的感受。

出于对波兰这时的形势的考虑，在1956年以前曾一度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爱德华·奥哈布（他从1956年3月临时被推举担任已去世的贝鲁特留下的职务，7个月以后他辞去这一职务）说出了作为领导人的矛盾心理。

“关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残酷真相的透露使全党和整个社会感到震惊，这种震惊由于肯定了关于对波兰共产党进行的挑拨的和关于波兰共产党的领袖们及其主要的活动家的悲惨命运的令人痛苦的真相而特别加剧了。

关于过去时代的黑暗面的令人痛苦的真相，在许多同志和非党群众间，引起了激愤，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并且失去了在评价那个时代的成就和错误的时候所应有的全面观点。”①

当时仍未恢复政治地位的哥穆尔卡，对二十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了与奥哈布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刺激了我国政治生活，使它发生了转变。一种生气勃勃的、健全的潮流在党的广大基层、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中产生了。人民开始伸直他们的腰背、沉默的、被擦布的头脑开始摆脱虚妄、虚伪和伪善的毒素。以前在党

① 1956年7月20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纲上、在公众集会上以及在报刊上占统治地位的生硬的八股，开始让位给有创造性的、生动的词句。有的时候，也许还听到虚伪的论调，但是那已经不是指导总的方向的论调了。有力的批评浪潮出现了，批评过去、批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遭受影响的粗暴行为、歪曲和错误。所有各处，特别是在工厂企业的党的会议和群众大会上，都提出了要求，要求解释造成弊病的原因，要求对那些在造成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偏差应负主要责任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尤其是，劳动人民要求毫无掩盖和知无不言地向他们揭示出全部真相，他们等待着这一真相。等待着对集会上公众提出的几十个问题的答复。”①

人们要求知道问题的全部真相，要求对过去岁月遭受的苦难的原因有足够的解释。哥穆尔卡这里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如同哥穆尔卡后来指出的，要是党——更明确地说就是党的领导机构——把全部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坦率地告诉群众的话，“波兹南的工人原不会罢工，他们原不会在街上示威，他们之中原不会有人使用武器，我们的兄弟的工人的血原不会在那里流的。”②

在波兰，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一下子使政

①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10页。

② 同上，第11页。

治沸点升高了许多，解冻的速度明显加快，这时在公共场所、在集会上和报刊中出现了大胆而广泛的批评和抨击。1955年春，在华沙古城堡成立了名为“曲环”的辩论俱乐部（以其所在街道命名）。俱乐部里聚集了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对有关社会形势、创作自由、政治民主和生活状况等敏感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到1956年初这种俱乐部已有了几十个。著名的大学生报纸《直言》摆脱了陈词滥调和书报检查所加予的限制，成了非常重要的、脍炙人口的论坛。它的发行量最高时达20万份。它直率地反映实际情况和公众意愿，激烈地抨击时事政治，大胆地构想未来的政治前景，对社会气候的变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分歧。有人感到了变革的气候，认为应采取主动行动，恢复哥穆尔卡等人的名誉，主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并为恢复经济采取坚决措施。也有人坚持顽固态度，担心变革会动摇制度，追查责任，构成对现状的威胁。波兰党内的斯大林主义集团经常聚集在纳托林宫开会，对国内进程施加影响。根据这座宫的名称，他们得到了一个绰号——“纳托林”派。在当时的波兰，这一绰号成为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代名词。然而，无论

是谁，都没有决心和勇气彻底改正问题。动摇、犹豫、徘徊，是这时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特征。因此，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势：一方面，气候已在“转暖”，禁令实际上已经解除，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机构又未能及时采取重大措施，而是一味地拖延，这实际上只会增加不满和怨气。

波兹南事件的爆发终于揭开了长期被人捂着的盖子，加速了政治变化的进程。

由于在1953年改变了劳动定额，1954年修正了定额，以及部分地由于在1955年改变了劳动组织，波兹南市许多工厂的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大大提高，有的厂的劳动强度增加了25%。从1955年下半年起，政府取消了计件工资级数，使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工人更加吃亏。对于突击队工人的所得税定得很高，引起许多人的抱怨。这个错误在1955年底已答应纠正，但应退回工人们的钱迟迟没有退还。引起工人们不满的另一个事实是，应发给他们的劳保衣鞋以及发给有害健康工作的特别津贴一直拖延，没有兑现。以致到后来，工人们的怨气终于爆发了。

1956年6月28日，工人们派代表到政府机关申诉工人们的疾苦和愿望，希望能够尽快地解决被拖延了好久的工资、津贴和劳保福利问题。然而，工人

代表被政府官员拒之门外，饱食终日的官僚们根本无意理会工人们的要求。消息传回派出工人代表的工厂——“采尔盖斯基”工厂，立即激怒了全体工人。愤怒的工人放下工作，走上波兹南市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一些妇女、儿童和市民也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人们高呼：“面包、民主、自由！”还有人喊道：“打倒官僚！”“打倒沙龙口号！”“我们要行动，不要许诺！”“还我宗教！”“释放政治犯！”“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数千名群众还一致要求：让1949年被撤职并很快被逮捕的领导人哥穆尔卡重新领导党。“维斯瓦夫！”“维斯瓦夫！”的喊声响彻市内街道上空。①受政府命令在街上监视的警察和军队，在大街上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借口这时正在波兹南市举行国际博览会，要求工人们回厂复工，要求其他人立即散开。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在短暂的面对面的斗争中，军警动用了武力。于是愤怒的工人们用可能找到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在保安大楼对面的公园里修筑了避弹壕，而保安部队及警察则在大楼里射击。交火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与此同时，波兹南市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骚乱，许多人在冲突中被打

① 维斯瓦夫即哥穆尔卡。

死和打伤。据事后发布的官方公报，社会公众获悉：在波兹南的街头骚乱中被当场打死或受伤后死亡的共48人，有近300人受伤，几百人被逮捕。公报这样歪曲波兹南街头冲突的真相：

“本月28日在波兹南市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人民波兰好的名声上抹黑，为我们发展国际的和平合作制造困难。本月28日这天，敌特挑起了街头骚乱。有人袭击了一些公共建筑物，造成人员死亡。在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的支持下，当局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市区的平静。……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行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拒绝同工人谈判以解决问题，派军队和警察弹压示威游行的工人，在流血惨案之后仍然企图用谎言欺骗全国人民，这些事实都表明，执政者已完全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脱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它酝酿成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波兹南工人们的行动不是偶然的，历史证明了

这一点。

波兹南事件的发起者——“采尔盖斯基”工厂的工人，代表着古典的波兰无产阶级，他们的工人运动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真正工人阶级的直觉、敏锐、责任感和其他气质，他们比波兰东部地区某些地方的工人具有更多的政治性和斗争性。虽然看上去他们走上街头的直接原因是对于工资、福利问题上的拖延不满，但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他们对于现状，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他们生活的环境、斯大林主义时期采取的管理方式不满。波兰著名社会学家扬·什切潘斯基教授曾经考察了1956至1957年的工人罢工，他说：“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考察过罗兹的罢工。我可以强调指出：一年来波兰发生的50%的罢工事件，首先是由于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对于工业冲突心理学缺乏理解，才突然爆发的。他们不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把一切都仅仅归结为经济因素。对于工人为什么在工厂劳动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为了挣工资。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真相。除了挣工资以外，他们还要寻求其他东西。事实的全部真相要复杂得多……”。什切潘斯基接着谈到了工人参加管理的愿望，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心理隔阂，等

等。①

另一位当代波兰的著名政论家、波兰《政治》周刊主编、曾任过副总理和副议长的米·弗·拉科夫斯基也指出，虽然波兹南的工人阶级完全有理由对经济状况感到不满，但应当提醒一下，有些地方的工人的经济状况比波兹南还差，但他们并没有以这样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诺瓦胡塔钢厂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毫无疑问要比"采盖尔斯基"工厂的工人要差，即使工资水平相近，前者的居住条件、福利和文化设施方面的状况也要差得多，然而在诺瓦胡塔地区却没有出现抗议现象。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同呢？看一看波兰地图，翻一翻历史教科书，人们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波兹南属于波兰发达的西部地区，具有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传统和现代民主意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19世纪40年代，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了反对剥削和压迫，举行了英勇的起义，给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以巨大的鼓舞。马克思对此高度评价道："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象西里西亚职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

① 转引自《波兰在十字路口》，第79—80页。

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① 从战后地图看，波兹南与西里西亚（还有后面将提到的格但斯克、什切青和格旦尼亚）同属波兰西部地区，这里的工人阶级具有任何反抗斗争所需要的组织性、集中性、策略才能和政治意识。波兹南出现抗议事件不是偶然的。诺瓦胡塔地区的工人则不同，象拉科夫斯基观察到的那样：“建设诺瓦胡塔的工人则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久前还在波兰山区或在人口密集的凯尔采农村经营贫瘠的小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从过去的生活条件过渡到参加诺瓦胡塔的建设工作是一次从贫穷和绝望的王国到舒适而有远大前途的王国的飞跃。”② 诺瓦胡塔位于波兰东南部，传统上属于落后地区，解放后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小农意识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相当强大。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至今为止，这里都很少出现工人运动。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在波兰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就象往干枯的柴堆上扔了一桶着火的汽油！很快，抗议和抵制的浪潮遍及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工厂罢工、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到处都是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② 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第一章第二节“悲剧的一周”，1981年波文版。

怒和抗议的人群。

在强大的压力下，领导层被迫后退。6月底，全国为波兹南事件的受难者举行了安葬仪式，政府总理及一些党政高级领导参加了仪式；与此同时，汽车工业部部长被撤职，还解除了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并决定向工人发还无理强征的650多万兹罗提的税款。

1956年7月，在华沙举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七中全会，会议由爱德华·奥哈布主持，专门讨论了波兹南事件。会议以正式决议的形式，第一次表达了执政党对事件的评价。决议是矛盾的、犹豫不决的和不彻底的，反映出党的领导层内的状况。

首先决议改变了最早的所谓敌特挑动和帝国主义分子破坏的说法，承认：

“在估计这次事件的原因的时候，如果首先注意力在挑拨者和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上面，那就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必须找出这次事件的社会根源，这次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全党的警钟，表明党和工人阶级各阶层的关系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不正常状态。”

它寻找了引起工人们不满的原因，认为：

“在迄今为止的实践中，党机关不止一次地介入了直接管理的范围，代替了国家政权和经济管理

机关，限制了它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党机关不但没有成为各种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政治鼓动和监督的中心，没有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根据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却在很大程度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从事国家政权机关琐碎的事务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文牍主义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以及党机关过于庞大臃肿的现象。……

在六年计划期间所做到的改善生活工作是很不够的。这首先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客观条件，由于同国际紧张局势有关的困难，由于在一个经济落后并且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进行迅速工业化的必要性。还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为了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努力是不够的，不够坚决有力，也不是经常一贯的。因此这些努力没有产生使劳动群众感到大大的松一口气，认为有基本上改善的结果。结果是，广大阶层人民中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党和政府没有尽力帮助工人和职员解决他们困难的物质情况。……

党和政府在消除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前一个时期发生的错误和偏差方面也有因循耽误。

由于官僚主义的偏差，迟迟未能解决劳动群众的不满，对人民和对他们常常是正当的要求采取冷

漠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党和工会组织对于工人和职员的困难有一定程度的麻痹，甚至漠不关心。这种情况的进一步的后果是，许多党和工会组织同工人群众失去联系，有时候党组织淹没在工人群众里面而失去了先锋队的性质。”

然而，另一方面，决议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没有忘记“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用，并谴责了一小撮坏人的“阴谋”。

“……必须记住，在阶级社会中，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民主化的过程，不仅将加强社会主义的趋势，同时也会使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会力图利用这个过程，来组织自己的力量和竭力对劳动群众施加影响。所以，粉碎资产阶级趋势复活的种种企图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就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过程正确发展的条件”。

在这次全会上，奥哈布也说：

“必须根据下述背景来研究发生这种事件的情况，那就是恰好正在我们为了争取社会生活民主化、为了恢复列宁主义准则而进行斗争的现阶段，捣乱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波兹南挑起了一次罢工和示威。……

错误意见和蛊惑人心的叫嚣并没有遇到足够的

抵抗，而这些煽动人心的意见为数多得足以对我国流行的情绪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波兹南，受托保卫人民国家的这些机关并不清楚地了解情况，不能预见事件的发生，在举行国际博览会这样一个需要这些机关特别注意的期间，它们却听任自己在敌人的行动面前措手不及。这对于我们说来是一个严重的警钟”①。

七中全会是对现实的一种勉强的妥协。它的决议说明，现有的党的领导并不具有彻底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可能；从根本上讲，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是与工人阶级、与工人斗争的方向格格不入的，他们没有勇气彻底抛弃斯大林主义，党的现领导态度的缓和，只不过是在强大的群众和舆论压力下被迫作出的。

七中全会在不涉及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小的改进措施，以平息或减轻群众的怨气和怒气。例如，会议决定扩大地方政权的职权范围，让议会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会议支持关于使工人对生产管理建立更大影响的要求，授予工人委员会讨论涉及企业的物质地位、劳动条件和制订计划的全部问题的权利，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保持经理作为国家代表的不可侵犯的地位。在这次中央全会上，

① 见《新路》月刊1966年第8期。

有些人提出应召回这期间已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哥穆尔卡，让他回到中央委员会，但是，会上并没有审理和赞同这个提议，而仅仅是撤销了原先作出的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

党的领导机构的拖延态度，促使已经高度紧张的社会局势更具有爆炸性。华沙犹如一座锅炉在沸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了讨论和批评的热潮；农民和市民阶层也处于不安、怀疑和紧张之中，逐渐失去耐心；工人们则激动和愤怒。在某些工厂，工人自治的思想，又重新活跃起来，许多地方自发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华沙“热兰”汽车厂党委会主动要求更好地发挥工人的作用；华沙市党委决定改组，从下向上地推动党自身的改革。许多报纸刊物更加激烈地批评政府，甚至连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也发表社论，提出不仅应该重新审查官方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而且还要求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它写道：“波兰政府必须尽量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将来避免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生这类敌人随时准备利用的事件。然而，这不仅仅是工资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应该在目前的工业企业关系中实行深刻的民主化的问题，是必须让工人参与管理自己的企业的问题……”。有的文章说，“我们放弃了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

也会日益尖锐起来这一错误而有害的理论，诚实而勇敢地重新审查过去的错误，使生活民主化，加强法制，实行大赦，加强议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这一切都会使那些由不信任的壁垒同我们隔开的人们心悦诚服起来……”①

在那紧张、动荡、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以波兰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为首的“纳托林”派决定动用驻扎在波兰各军区的苏联军队，以对全会的工作施加压力。由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对立的集团采取了某种反措施，因此他们决定邀请苏联出兵干涉。

然而一夜之间消息传遍了整个华沙，并且很快传遍全国。这次被公开称为“罗科索夫斯基政变”的行动受到有组织的工人委员会的反抗。工人委员会宣布，他们将不惜流血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尤其是当群众听说按照政变者的计划，目标之一是将再次逮捕哥穆尔卡并将把他立即处死时，他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关于军队调动的消息从内地传来时，工人纠察队已经占领了所有战略地点。成千上万的人们准备在华沙各个入口筑起街垒，以阻止坦克进入首都。在党中央委

① 转引自米奥德拉格·马罗维奇著：《斯大林主义的破灭》，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自由》出版社1978年版，第3章。

员会于预定的时间举行会议的时候，工人纠察队守卫着会议地点和部长会议大厦。到处都举行了支持哥穆尔卡的群众集会。工人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

——立即实行工人自治制度；

——彻底贯彻七中全会关于进一步使生活民主化的决定；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波兰党保持完全独立。

工人们占领了工厂，佩带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到处在警惕地维持秩序，全社会都在注视着最高领导层的动静。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波兹南事件的影响到处都在强有力地显露出来。

1945年在波兰出现的体制第一次遇到了危机。

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从1945年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接管政权以来，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危机。对于那些在整个“斯大林化”时期处于波兰政治权力顶峰的人来说，发生如此深刻的、动摇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危机，是想也不曾想过的。对这些党和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们来说，迄今为止，如果说危险或者威

胁，倒是有过那么一些的。比如当某些党派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所有合法政党选举联盟的方案和随后又拒绝联合提出竞选名单的建议时，当1946年举行全民投票、对三个方向性的问题付诸表决时，当在美国扶植下的西德的一些复仇主义者发出修改德波边界的要求时……在这些时候，他们是有些紧张的。但这些人所感觉到的只是在“对敌斗争”中存在哪些威胁和危险，不想也不会从自身的角度。从政权和党的方针上寻找危机的原因。一旦权力到手，地位巩固，他们所唯一关心的就是统治者的利益和要求，而丝毫不再理会群众的想法与愿望了。

实际上，从这时起，政府、党、整个国家机器开始疏远人民，背离人民，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滋生出官僚主义，冷漠无情、文牍作风、教条态度，给人民造成巨大的压抑感和负担。因此，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旧的体制和政策下，管理政权、行使权力、巩固地位和扩大影响的过程便是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和制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出了一种异化，一种马克思曾经描绘过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机器的异化或变质。南斯拉夫当代著名哲学家弗兰尼茨基指出：“……不但要认识到国有化的历史局限性，而且要认识到，如果停留在国有化上，就会有巨大的

危险性。国有化只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劳动的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因而，尽管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却处于雇佣关系中，处于经济上和政治上被剥夺的地位。也就是说，仍然有人以工人阶级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

……

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那么官僚化国家极权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甚至导致官僚化国家极权主义的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丧失了，关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变成官僚化国家极权主义的，而且必然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① 波兹南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弗兰尼茨基的判断。

① 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67页。

第四章

反思与期待

“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抄袭东方或西方的模式。……振兴国家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地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

——兰 普

在波兹南事件四个月以后，1956年10月19日，终于召开了波兰公众期待已久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爱德华·奥哈布辞去了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全会增选哥穆尔卡为中央委员，并一致推举他再次担任党的最高领导。

哥穆尔卡这位波兰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出生在加里西亚地区的克罗斯诺一个工人家庭。在本世纪初，这地方属于波兰经济和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也许是环境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形成了内向、固执的个性。他十分

了解旧的时代家乡的贫困状况，那里的一切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于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这年他因五一节游行散发左派印刷品而第一次被捕。入狱不久，在工人代表团的要求下获释。1927年到1931年，他已成为知名的工会活动家。1932年他组织罗兹纺织工人罢工，在一次左翼工会会议上被警察打成重伤，被捕后又被判处四年徒刑。后因健康状况恶化，获准出狱治病。此后，他被派往苏联，就学于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1936年回国，作为党的区委书记在西里西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再次被捕，并被卡托维兹省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谢拉兹监狱服刑。逃出监狱后他到了华沙，参加了华沙保卫战。失败后，他象许多左翼活动家一样，逃亡到苏联。1942年他同国内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参与组织了下喀尔巴阡地区党的第一批支部和反对占领者的第一批战斗小组。1942年9月当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工人党在敌占期间发表的重要文件，即工人党纲领性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斗争》是他最后定稿的。波兰领土一经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哥穆尔卡就担任了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并积极参与了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1945年1月他成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副总

理，从这年11月起同时兼任收复地区部部长。

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哥穆尔卡应当受到公正的评价，即同时说明他在1956年时的思想成就，为人民拥戴的情形和这之后他的平庸、无为和保守僵化的工作。科尔邦斯基指出："领导波兰共产党约20年（1943—1948年和1956—1970年）之久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不是一个平凡的领导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1956—1957年），他大概是战后波兰历史上唯一真正合法的全国领袖。战后初期他的信念曾使他几乎送掉性命，他当时的行为表明，他还是一个有一些原则性的人物。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也是一个能力相当有限的、眼界狭窄的人，他的原则性和信念往往变成顽固不化的态度，毫无道理地抱住早已无用的被推翻了的思想观点不放。他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如表现在他作出的解散集体农庄的革命决定）和顽固拒绝革新（如表现在不愿意改革波兰经济使之现代化）的一种奇特的混合。很可能人们将记住他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1956年10月波兰人民给他莫大的信任和信赖，他滥用了几乎15年，最后成为一个痛苦的受屈辱的人。"研究波兰现代史的人大多会赞同科尔邦斯基的看法。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1956年上台执政到1970年下台这段时间，哥穆尔卡以及由他体现出来

的波兰党领导的政策呈现出来的复杂画面。

1956年从八中全会开始，有过一段生气勃勃和大胆批评、深刻反省的阶段。

1956年10月召开的八中全会与这之前不久召开的七中全会，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中全会按照波兹南事件的本来性质和意义，对之作了正面的和积极的评价，并且对前一时期在“斯大林化”期间党的领导的错误作了激烈的、有分析力和有相当深度的批评。八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许多重要讲话，不仅为当时波兰人民所传诵，而且在东欧和其他一些地方广泛流传；人们把这视为改革力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重大胜利，视为广大群众强烈斗争的积极结果，视为人民波兰和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新生的征兆。

在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严肃而深刻地评价了6月的波兹南事件，高度赞许了工人阶级的态度，他说：

“工人阶级最近给予党的领导机构和政府一个痛苦的教训。当波兹南工人在今年6月的那个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罢工的武器并且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他们有力地喊到：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错误的路上回过头来吧！

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轻率地采取罢工这一作为争

取工人阶级权利的斗争武器的手段。特别是现在，在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所管理的人民的波兰，工人阶级不是轻率地采取这一步骤的。……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他批评了前领导把波兹南事件的起因归咎于敌特分子煽动和破坏的结果的说法，指出：

“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而且到处会有，到处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决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如果特务和挑衅分子能够煽动工人阶级采取行动，那么，人民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阴谋就会容易得多，而且能够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标。……如果反动势力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找到支持，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成为人民中间的领导的和最进步的部分。特务、挑衅分子或是反动分子从来不是工人阶级的鼓舞力

量，他们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

为什么党的领导害怕说出事实真相呢？哥穆尔卡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些人害怕对他们的政策的后果应负的责任，另外一些人觉得他们同他们的舒适的职位比同他们赖以获得这些职位的工人阶级更有密切关系，而还有一些人——这种人数目最多——担心工人阶级将不能了解它要求它的代表提供的真相的最根本的本质，它不会象它应该的那样正确地看待所发生的错误、偏差和挑衅行动的原因和根源。对工人阶级的信心的削弱现象在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是普遍地明显存在的。”

哥穆尔卡深刻地阐述了党及其领导者与人民的关系，他指出，管理国家的人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信任，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力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们尽了义务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许可以继续维持对国家的管理，“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之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便失去了它的意义”。

他认为，波兹南悲剧正是因为党和政府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造成的，因此，“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深刻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间去寻找。火种已经积累了多年”。与许多人相比，当时的哥穆尔卡在寻找根源问题上显示出他的更高一筹。他剖析了波兰党在过去一些年代犯下的错误，并且把问题指向波兰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他批评苏联的问题说：

“鉴于把在各个方面都落后的沙皇俄国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工作所带有的巨大困难，在（苏联）党由斯大林所领导的期间，便开始了一个以越来越残暴的方式消灭对于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正常意见冲突的过程，这种冲突意见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在党内发生了，随着党内讨论逐渐被消灭，党内讨论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便为个人崇拜所代替。规划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工作便逐渐从中央委员会的手中转到人数越来越少的一批人的手中，最后为斯大林所独占了。这种独占也包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他把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是一种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制度，是一个明确的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道路，而同时却实行了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违反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概念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概念的方法。”①

现在看来，哥穆尔卡的报告起了一种震聋发聩的作用，但同时它里面掩盖着矛盾的成分。他揭露了“斯大林化”时期波兰的非民主、非人道特点，触及到波兹南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激烈地批评了党和国家前领导的违反劳动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方针，这就为后来波兰公众和舆论及党本身展开的大讨论提供了一个依据，为在他以后执政的年代里消除那些残暴的现象打下了基础。但是，哥穆尔卡未能发现“斯大林现象”的制度上的根源，未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深入地揭示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如果他仅仅批评“个人崇拜”而不是同时更深入地批判造就“个人崇拜”现象的环境和条件及体制，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先的愤怒和激情就有可能逐渐泯灭，旧的体制仍旧会同化新的领导人和他所代表的政策，甚至造就出新形式的“个人崇拜”。也许，这正说明了为什么1956年对斯大林现象作了那么多批评的哥穆尔卡，没有多久也重蹈旧辙的原因吧。

在八中全会上，许多人反省了过去一段时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错误，对党的领导的工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一书，第8—9页，第23—24页。

作提出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有的中央委员提到了“波兰式道路”的命运，指出：“1948年，我们党改变了政治路线，当时它已经变成个人迷信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压力下，党抛弃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据说它是不符合和违背苏联的道路的），走上了一条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全都生搬硬套苏联做法的道路”。发言者认为，“波兰式道路”本来是与世界革命的总趋向不矛盾的，“如果我们在波兰寻求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许多方面都和苏联、南斯拉夫或中国的道路不同，并不等于我们就置身于世界革命运动之外，因为所有这些道路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一些发言者指责了旧的工农业政策，他们说，虽然党的国家工业化政策取得了成就，但照搬斯大林主义计划体制的做法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它的最大失败并不单纯是某些失调现象以及由过分集中的计划和监督制度造成的若干严重错误，而首先在于对工人阶级采取了非社会主义的态度，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相反，国家的代表——一个往往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阶层——以它的名义控制着一切。经济安排并不以群众的需要和他们的生活水平为转移，与此相反，决定它们的是

一些往往牺牲了群众利益的、建筑在错误估计之上的计划。因此，尽管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工人阶级仍然是不满和失望。虽然在改造农村过程中确立的社会主义一般远景是正确的，抄袭苏联做法的党的政策却充满了严重错误。这不止是一个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使用强力的问题，它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数量过大的强迫征购以及强迫征购这一政策本身（这种政策大大减少了商品的交换量，使农民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耗竭了农村信贷的那种方针，以及多样化的农民自治被摧毁的事实。农业政策中的错误不仅引起了生产率的降低，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恶果；目前的形势是，主要的战线不是存在于贫农和富农之间，而且以统一的农民为一方、以官僚阶层为另一方的斗争。所有这一切的必然后果，就是1956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事实：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瓦解和国家遭到巨大的物质损失。

有的中央委员对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党在波兰的人民民主政治结构中也犯了严重错误。通过机械地模仿苏联，建立起了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形式上虽然是民主的，实际上却是一个没有真正民主内容的空壳。“反映在我国宪法中的这种制度，完全以苏联的所谓斯大林宪

法为蓝本　它不符合我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反映工人阶级在真正的工农民主政权中的领导作用……”

许多人一致的批评是：“大规模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保安机关、军事情报局和司法机关的可怕偏差与罪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造成了极坏的损害。这些偏差和罪行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能归咎于个别坏人，它们主要是由一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而这种政策所依靠的则是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把任何形式的反对都当做帝国主义破坏活动、把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目为破坏分子等等极端夸大的、不符合事实的和有害的观点。……按照当时流行于苏联的观点，把保安机关置于党和国家之上。对无辜人民的迫害、反人道的审讯方法、捏造的审判，最后是在这些犯罪措施下丧失了生命的许多牺牲者——整个这一悲剧……损害了党的道德威信和人们对于党的领导的信任”。

在这次以批判旧的时代为主要特点的中央全会上，人们也对以往的波苏关系提出了疑问和批评。有的中央委员指出，1948年以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通过了反南斯拉夫的决议，并且接受了随着这类决议而来的一切东西。“我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屈服的呢？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还相信，不同

意斯大林的看法甚或保持我们自己的观点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投向反革命阵营”。许多人认为，波苏关系的不正常，对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党的独立地位的原则的严重破坏，是造成过去的许多错误、偏差和损失的根源。波兰所以没有能找到自己的符合波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办法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十分坦率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消除个人迷信的残余，不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恢复列宁主义原则，不让每一个党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充分自由，特别是如果不让我们党通过自己的波兰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加强和苏联的友谊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不可缺少的团结”。①

就在八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早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机场。代表团成员包括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最高层决策人物和一些苏军元帅。与此同时，一支苏联部队正向华沙方向调动，其中包括坦克部队，驻扎在波兰西部和弗罗茨瓦夫区的苏军此时也奉命处于高度机动状态。人们还获悉，赫鲁晓夫得知波党八中全会的议题和将要作出的决定后，非常恼火和不安。

① 以上均见《波兰的道路》（The Polish Road），利兹1957年版，第34—41页。

当他与其他苏共领导人一到华沙，便立即要正在开会的波兰党领导人与他们举行“会晤”。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颗炸弹。许多波党中央委员喊到：“是谁叫他们来的”？“同不速之客没什么好谈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应该把这消息告诉人民！”

当时还是第一书记的奥哈布提议休会，并确定了同苏共领导人谈判的代表团。苏共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本身说明，到波兰来的决定是在最保守的苏共中央委员的压力下作出的，这也就导致赫鲁晓夫推翻了他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在华沙公开许下的诺言。赫鲁晓夫曾在波莱斯瓦夫·贝鲁特的葬礼上说过，今后苏联和波兰之间将保持平等的关系，将尊重各自国家和党的主权。

波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除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外，哥穆尔卡也参加会谈，这就保证了无法背着中央委员们作出不利于他们的决定。还决定，参加谈判的人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将会谈情况向中央汇报。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赫鲁晓夫要求汇报波兰发生的一切。他断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波兰占了上风，工人遭受了蒙骗。他说，在群众集会上流氓占了支配地位，正如在波兹南所发生的事件一样，流氓们将危害党和社会。赫鲁晓夫甚至威胁

说："我们的坦克将结束这场暴乱"。

哥穆尔卡对此坚定地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坦克碾压的将不是流氓和外国间谍，而是这个党的中央委员和波兰共产党员。"他接着说，"请不要忘记，你们将会遇到工人们的街垒，将会付出生命，我们的军队将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参加战斗，尽管罗科索夫斯基是军队的最高领导。"

事态的发展的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众所周知，就是在这一时期，匈牙利出现了相当类似的变化。苏联军队奉命向布达佩斯方向运动。但纳吉政府拒绝与苏联谈判，并且最后宣布"中立"和退出华约组织。在波党八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十五天，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炮轰了匈牙利事件中的起事者聚集区，占领了各中枢机关，纳吉政府和他本人成为苏军的阶下囚。

这时的波兰，反苏情绪也上升到战后以来的最高点。华沙的许多工厂中工人们已经武装起来。知识分子、华沙市民和全国许多地区的工人都支持政府的立场，群情激昂。

下午六点钟，参加谈判的人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开会的大厅。在此期间，会议大厅和市内各联络点之间建立了通讯桥梁，人们正等待着关于谈判情况的消息。几乎华沙的所有知识分子，即所有大学生

和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自发地聚集在工学院，整个城市和整个波兰都在等待着，期待着。

奥哈布向中央委员们汇报了谈判情况。他说，气氛有好转，但是还需要继续谈判。

15分钟之后，波兰领导人又穿过市内主要大街，去继续谈判。

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钟。波兰代表团作出极大努力，以使苏联人相信，波兰不会作出任何有损于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情，波兰人能够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清除积累下来的、在社会上引起严重后果的不正常状态。他们注意到国家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以致领导层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局势，使之不再进一步恶化。波兰人建议，八中全会以后，最高级代表团将立即去莫斯科，将全部情况告诉苏联领导人，届时还将达成有关继续合作的一切必要的协议。

当时情况已经很清楚，赫鲁晓夫不得不从华沙空手而归。在凌晨时分发表的简短公报以含混不清的语言表明，压力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客人们不得不对主人的解释感到满意：波兰所走的道路并不妨碍同苏联结盟，波兰不会退出华约组织。但同时苏联人也不得不接受两个困难的决定：签订一项特别协定以解决驻波苏军的地位问题；把不受欢迎的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调回莫斯科。前一项决定在1956年11月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签署，后一项决定当即落实。

这一切都由当时虽然还不是正式的，但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党的领袖的哥穆尔卡，在凌晨举行的会议上向中央委员会全部作了汇报。之后，有了哥穆尔卡的纲领性报告。哥穆尔卡的报告受到整个波兰的欢迎，被认为是理智、现实和进步方针的胜利。

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向出席八中全会的全体中央委员们汇报了同苏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况。

他说："苏联同志突然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其中有的你们已经知道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深切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他们说，他们想要同我们一起讨论这一局势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想了解我们的观点，其中特别引起他们不安的是各种形式的反苏宣传的发展，而我们没有对这种宣传加以反对，或者反对得不够。苏联同志把所有这一切都同我们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是同波苏关系、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党的合作联系起来，以及同整个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谈到我们这里的反苏宣传时，他们向我们列举了引自我们报刊的词句和例子，……苏联同志对于将要由八中全会通过的

我们领导成员新的组成方案也很感兴趣。他们指出，所建议的领导成员的组成方案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同我们有着密切联系的苏联同志，却没有被告知这回事。总之，他们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双方没有足够的接触，有关波兰的形势及其发展情况没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谈到关于领导成员的组成方案时，我想指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内部事务来加以研究的。讨论是按党性、原则性进行的，有时双方都很热烈，但无疑已很好地把情况解释清楚了……，我们尽量使苏联同志平静下来……。我们尽力向苏联同志说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民主化过程，它的实质、它的意义，说明不存在倒退的可能性。我们还告诉他们，全会将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问题予以研究。这就是党和它的领导人如何比迄今更为有效地走在民主化运动的前列，领导运动，使运动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①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后这一段时间，苏联《真理报》对波兰出现的变化展开了攻击，并指责波兰报纸刊登“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言论。《真理报》在10月20日发表的题为《波兰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新路》，1957年10月。

报刊上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文章说：

“最近，在波兰报刊上日益出现宣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但是这是事实：作为在争取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斗争中锐利的有效武器的报纸竟日复一日地登载这样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动摇这个制度的基础，散布对建设新生活事业的不信任，用同劳动人民思想意识格格不入的外来的毒素毒害读者的心灵。……我们不必再说，在这种诽谤者的声嘶力竭的大合唱中夹杂着反苏调调。”

文章中重复使用着“肆无忌惮的骗子”、“诽谤者”、“不学无术的造谣者”、“修正主义者”“猖狂的投降分子”等污辱性词汇。

波兰报纸立即对这种攻击进行了驳斥和回击。《人民论坛报》发表的题为《为了真正的友谊》的文章指出，以《真理报》记者名义写的这篇文章是不诚恳、不友好和不符合党与党关系准则的；可悲的是，《真理报》记者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其他国家的同志，整篇文章“不管在内容和标题中都充满了侮辱的和不真实的解释”。

《人民论坛报》的文章说，问题不仅是《真理报》文章的形式和方法是否符合于波兰的实际情况，《真理报》记者最后竟然还认为波兰报刊上的反

苏反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波兰忠诚的爱国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合理的不满和愤怒，说波兰人民要求制裁波兰报刊肆无忌惮地散布肮脏的语言的修正主义者和投降分子。《人民论坛报》严正地申明说："假如讨论使人如此满意，那么上述的论断却引起了严重的保留。它越出了这个范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讨论'的意义，假如（《真理报》）记者对我们国家的什么不满意，这是他的权利。他也要就他的文章内容和形式对读者负责。但假如代表波兰爱国者和劳动人民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客气点说，这是不知分寸的。"

这篇文章最后说：

"在波兰有着反苏情绪吗？毫无疑问是有的。但每个共产党人都有责任反对这种情绪。反对这种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法宝，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执行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假如把现在批评已经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被抛弃了的做法认为是反苏的言论，那么客气点说，是无稽之谈。此外，不协助改变这些做法和在兄弟人民之间清除斯大林式的做法的痕迹，那么就不能帮助加强友谊。改变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可能是困难的，而新的做法正反抗着旧习惯，并且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可能是不好听的话，但诚恳的友好的批评，正是为了真正的牢

不可破的友谊。”

《真理报》的恼火是有原因的，在八中全会这一段时间，是波兰自1948年以后思想文化领域最活跃、最大胆、最少约束的时期，在党的最高领导更换、新领导采取开明方针这一事实的鼓舞下，波兰公众和舆论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一种反思和批判的风气迅速由思想文化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反思和批判的内容，从当时波兰一些有名的报刊上可以得到反映。例如，被《真理报》那篇《波兰报刊上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文章点名的两篇文章，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和引起较大争议的文章。

让我们摘录一下其中的主要内容。

1956年10月21日，波兰《新文化报》刊登非党作家兹·弗洛尔恰克的文章《同西方谈话》。文章认为：

“……我们假定说在我们的土地上革命开始的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的话，那末应该清除它的那套艺术，先决的习惯和先决的字句。应该重新加以考虑，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法典。应该把第一批口号：全世界无产者或人民的敌人等等分解成为因素。因为今天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突然发现，

这些行话的内容已经变得同过去的不一样了。今天‘全世界无产者’这个总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这样原始和反理智的应用是可能什么也表现不出来的。请你们试用这办法去呼唤奥地利的无产者吧，十分值得怀疑，他们是不是愿意和波兰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奥地利最低限度的薪金是如此的高，甚至于使工人阶级不再有兴趣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且政府必须人为地引起失业，才能够约束这个阶级。与此同时，在波兰却正在进行着争取基本生活条件的象波兹南那种性质的改变。今天机械地搬用马克思时代的真实的口号，正是会在口号的对象的眼里败坏这些口号的声誉。我曾翻开一本波兰版的《新时代》，看到一篇关于西德繁荣的内幕的文章。即使不读也可以设想到，作者用尽夸张来证明这个国家工人阶级的贫穷。在这篇文章里正是证实了这一点，这样，一方面我们真的见到了至今未有的繁荣的德国，另一方面——文章的能说善辩的字里行间，极其不顾与事实的不符，硬要把事情说成相反。该文作者是怎样完成这个戏法，从而达到同客观真理相距如此遥远的不顾事实呢？他干脆用这个作为理由，就是资本家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比例比工人所占有的比例大得多。这是经典的恶意宣传。他们竭力要说得使人民民主国家里的饥饿的

人们相信，赚得黄油面包和电视机的西德工人必须在愤慨中颤抖，因为那些出卖面包和电视机的人赚了鱼子面包和甚至十个或者更多的电视机。不，在这样抽象的原则下，‘全世界无产者’是联合不起来的，应该在别的更人道的原则上援引有思想原则的理由。应该动员知识界，写些更实际的东西。……

我看到世界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公报。今年八月联合国有关部门（经济——社会组织）在日内瓦已经讨论过这个公报。从这个公报可以得出结论，超过世界半数的人口在挨饿，经常吃不够，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不能够给自己保证最低限度的能量（2200）卡。近东、远东和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主要是吃面粉制的食物和块根植物，然而缺乏动物蛋白质，如牛奶、肉、蛋、鱼以及蔬菜和水果。营养不足的病，在这一带地区就成为很普遍的病。看了这种公报，我觉得没有必要捏造生活得很好的西德工人的不幸。我们对于在资本主义中工人是可能有福利的这种事实所采取的不仅是胆怯的态度，而且从理论上说甚至是不成熟的态度。我们很高兴，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吃得很好并且穿着很漂亮的皮鞋。我们祝贺他们。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一切东西都是超过半数以上的没有东西吃也根本没有鞋穿的人们所献出的代价。德国的繁荣并

不是由于生产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来的。而一半人口要挨饿，则一定是由于生产资料不是全世界所支配之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需要欺骗和责骂，它自己会很好地维护自己。

我愈来愈相信，我们应该把第一阶段革命的战斗工具和起环节作用的思想行话交给博物馆，并提议对那些行话感兴趣的人们（他们一定比那占了人类一半人口而又没有动物蛋白质吃的人要多），理智地检验性地讨论一下，干脆说，慎重地讨论一下。最低限度说来是奇怪的，最理智的合逻辑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共产主义，今天用起头痛粉或麻醉丸来了，却逃避公开的思想斗争。假如共产主义采取崇神主义的墨守成规，这就不再和教堂的仪式有什么区别了，那时，人们会说宁愿要教堂的仪式，因为那儿有更多的手势做作、效果和敬神的香，而这种仪式也不向信徒们要求这种积极性，这种做断胳臂还要做的事。我把这种事情说的象开玩笑，但是请你想想看，假若用不可触犯的公式喂育我们而不鼓励我们去思考，那么这件事情是否这样呢？……”

另一篇文章发表在1956年10月19日《华沙生活报》上，题目是《问题的实质》，作者叶日·普特拉曼特。

文章指出：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波兰出现了自1948年以来统治波兰的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我们迄今为止所不得不接受的经济制度，即建立在过分庞大、极端集中的官僚机构上的经济制度，无疑地并且无可挽回地破产了。”

文章说，苏联模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专政，各个总管理局的集权，副总理们主管的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所处特殊情况的产物。然而，“这种集权和官僚化的特殊型式，成了典型而被机械地搬到条件完全不同的人民波兰来”，从而造成了波兰今天的危机。

它认为，“已是让我们的党政活动家了解的时候了，他们在波兰所搞的型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可能的型式，最低限度已有了两种很重要的型式”。除了苏联模式之外，工人自治型式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制度。这种工人自治制度“不仅是打击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而且是确定我国经济中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在我国政治中工人阶级特殊作用的国家政权形式”。大家都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国家生活公开化、分权、民主、自主”，其中，对人民波兰具有决定性、关键性的问题是工人自治问题。这个问题的适当和迅速的解决，会使其他一系

列迫切的问题迎刃而解。工人自治问题的解决可给予上述四个口号以明确的、政策上正确的解决。”

这篇引起人们广泛重视的文章最后说：

“不把社会主义看作空洞公式的人和那些不认为社会主义已过时的人，那些认为揭开斯大林主义的底细是个悲剧但对社会主义还有信心的人，以及那些既不同意波兰回到‘戒严状态’又不同反革命妥协的人，他们必须看到：在波兰，或者由工人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的责任是同工人阶级一起参与这个运动并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在反思和批判的热潮中，人们集中议论的一个话题是早在40年代中期哥穆尔卡已经提出的“波兰式道路”的问题。在批评苏联模式和旧的领导方针的同时，自然会把注意力导向新的政策和前景。这方面，波兰知名经济学家、担任政府高级经济顾问的奥斯卡·兰格的谈话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

1957年兰格在一次讲演中以《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为题，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提出一些重要看法。

关于“波兰式道路”，他说，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到处一样，我理解其意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到处一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细节上，例

如在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管理经济、计划等等方面不能有区别。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取得权力一事本身，它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新国家使用的手段，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国家为废除旧生产关系和创建新生产关系而使用的手段——所有这一切按照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国之间可能不同。传统和历史背景在产生新制度的各国中是不同的。它们在苏联不同，在波兰不同，而在捷克或保加利亚更加不同。如果印度采取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会不同的。波兰的道路必须从我们的历史需要出发，从我们的历史和地理——经济的条件出发，最后，它必须从将要决定我们的人民国家和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那些社会力量中产生。

关于旧的体制及其形成原因，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在革命成功初期照搬苏联模式，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第一，害怕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因素在社会中和在国民经济中的破坏作用，导致要求把这些因素尽可能快地从他们可能对经济有影响的一切位置上排斥掉。第二，要求加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同时把它引到能向国家提供最大国防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今天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变形的那些现象。战时经济方法——用行政决策和政治（精神）号召代替经济刺激，在一定时期中可能是必要

的和有益的，但不能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永久性方法。如果这些东西应用时间太长，超过必要，就会使集中了权力的官僚机关在某种意义上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如同保安机关变为国家机体中的一个独立力量一样。

关于波兰经济模型，他设想：首先，这个模型将把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和方向与尽可能分散的管理结合起来；其次，经济管理将在整个经济的中央计划和方向的框架内，以工人自治和部分地以合作社自治为基础。波兰模型不应当象苏联经济那样，另一方面，它又会比南斯拉夫建立在更集中的计划基础上。其计划范围无疑将比过去窄一些，国家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而自己不必涉及细节。它也要求企业有较大的独立性，实行自治原则，工人委员会同管理当局共同管理企业。原则上价格政策由国家制订。党在发展方向上起领导作用。国家掌握关键部门，即重工业、银行和信贷系统及实际上所有的运输。不仅合作社集体经济有存在的理由，而且仍然有一个私营部门，首先是在农业以及手工业和小规模生产方面。①

然而，对于“波兰式道路”有关的理论问题，

① 兰格的详细论述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59—76页。

比起40年代中期提出这一概念时的设想来，还是哥穆尔卡本人在这一时期作了最有力、最系统的阐述和发挥。

1957年5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九中全会上，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又一次解释了他本人在十多年以前就提出过的这一问题。

他指出，“波兰式道路”的提出是基于一般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之上的，这条道路的存在并不否定一般规律，这些属于一般性的规律是：第一，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第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波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建立在各个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道路是国际性的道路，同时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一般的国际性道路都具有每个国家所具备的自己的民族背景，我们说的民族的道路，即我们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那么，“波兰式道路”与传统的道路有什么主要区别呢？哥穆尔卡说：

“八中全会确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式的三个方针。第一是工人委员会，第二是扩大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第三是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农

民自治的经济形式。这三个方针构成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针对那种攻击“波兰式道路”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的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说道：“有时，因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的）道路亦即民族的道路这个名词，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因此就必须确定这个名词本身包括何种政治内容。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是同一切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狭隘的一个民族的事情。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它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而不仅仅是全民族的。强调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严格确定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区别于某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区别于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波兰式道路”问题上的哥穆尔卡的最深刻、最有价值的思想，从下面的论述中表达出来：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俄国的或者更广泛些说苏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何时都不能同个人迷信这个概念混为一谈。许多同志就犯了这个错误。诚然，个人迷信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带来了许多害处，造成了歪曲，但是．尽管如此，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并

不是由个人迷信确定的。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苏联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条道路的一定阶段上避免了个人迷信这种歪曲的话，那么这条道路是不是就适合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呢？更重要的问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对这些国家是不是必要呢？大概不是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理论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通过议会道路而无需急剧的转变过渡到社会主义。

……

从我所讲的这些话中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苏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在对俄国来说是特定的、造成了在它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必要，也不适宜。”①

哥穆尔卡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以来的形势使许多人重新见到了希望。在那一段时间里，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发展。

首先是波苏两国经济关系的调整和改善。

① 见《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在1956年以前，波兰一直被置于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地位。根据1945年8月16日波苏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协定，波兰必须参加德国对苏联的综合性赔款。作为对一部分赔款的抵偿，波兰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向苏联出口主要自然资源之一的煤炭。对于波兰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波兰人曾试图作某种改变。后来提供煤的定额减少了一些，但价格仍保持不变，直到1953年，这项已让人无法忍受的协定才停止生效。那时华沙流传着一则黑色幽默："我们给他们白糖，他们却拿走我们的煤炭。"另外，波兰从1945年以后一直是苏联的大债户。1950年4月以前，苏联总共向波兰提供了折合为10亿美元左右的贷款，用以支付苏联的原料和成套设备。这之后，波兰又得到一笔新的4.5亿美元的补充贷款。这些贷款不仅使波兰承受了沉重的负担（1956年11月1日的账面余额表明，波兰尚欠苏联5亿美元的债款），而且使波兰经济严重依赖苏联的工业设备，靠苏联提供大部分铁矿石、石油、棉花、铜等等来满足自己需要。

直到波苏最高领导莫斯科会谈之后，波苏关系才有了改善。1956年11月15日至18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会晤。18日签署了波苏联合声

明，声明宣告："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兄弟友谊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会谈时全面审查了两国以往的经济关系，并确定了过去一直未得到清理的财政问题。双方同意：到1956年11月1日为止波兰已经使用了的苏联贷款，可以被认为已经偿还，用以作为苏联对波兰在1946年到1953年向苏联供应低价煤的补偿。双方还就清理铁路运输的财政账目问题以及非贸易性支付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同意在1957年以赊卖的方式向波兰提供140万吨谷物，还同意贷给波兰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以支付根据双方商定的货单苏联提供给波兰的货物。

除此之外，联合声明还宣布了某些对波兰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比如，双方商定，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的暂时性逗留，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波兰的主权，这些军队的驻扎、调动和演习，应由双方政府通过协商作出规定。另一个被解决了的敏感问题是如何使战后划归苏联的那些地区的波兰居民回国。根据联合声明，这些居民大部分在1956年和1957年迁回波兰，主要是迁移到靠近弗罗茨瓦夫和奥波莱的西部地区。

联合声明的签署和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改善

了波苏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对缓和社会公众的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

波兰国内形势亦发生了良好的变化。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决定，要按照波兰具体情况发展农业。首先要在现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即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而把农业生产合作化放在较长的时期内去完成。同时决定解散那些用强迫命令方法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全国只剩下1803个农业社。1956年底，农业社拥有的农业用地只有23.2万公顷，农户为23万户。至此，被认为是不适合当时波兰实际情况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告一段落。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农业政策的决议。决议规定对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户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决议要求逐步取消国营拖拉机站，放弃这种苏联式的国家控制农村、榨取农民的方式。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方面，从1957年1月1日起，取消了牛奶的义务交售，并降低谷物义务交售量的三分之一；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义务交售价格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①

① 义务交售价格低于收购价格。以1956年为例：每公担小麦的义务交售价格为98兹罗提，收购价格为137兹罗提；每公担土豆的义务交售价格为19兹罗提，收购价格为23兹罗提。

另外，在投资比例、价格政策、信贷方法和管理方式上也作了一些改革。

“工人自治”，这在1957年的波兰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是千百万人付诸实践的行动。根据有的资料，1956年至1957年间，波兰的各个企业中自发地组成了5600个工人委员会。这种现象被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了，党和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并颁布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

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第二条写道：“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法令的以下条款详细规定了工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提出关于年度计划草案的意见；

2）在总的经济计划指标的基础上制订企业的年度计划；

3）制订企业的执行计划；

4）制订有关企业的结构和组织系统的方案；

5）确定企业发展的方针；

6）作出旨在改善生产和劳动条件的指令；

7）对企业的活动作出评价和规定年度收支平衡，交由上级机关核准；

8）根据经理的意见，作出关于出售不需要的机器和设备的决定；

9）在企业的职权和集体合同的范围内，规定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和奖励办法；

10）决定如何使用属于企业的那一部分收入，以开展企业的经济活动；

11）确定分配企业基金或属于集体的那一部分基金；

12）制订企业内部的规章。

至少从法令内容本身看，工人委员会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被赋予重任——几乎企业的全部职能都由它承担了。

为了建立兰格所说的波兰经济模型，为了改革早已陈旧的管理体制，1957年政府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兰格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副手切斯瓦夫·波布罗夫斯基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里集中了波兰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最有经验的经济组织工作者。

波兰经济委员会认为，经济模式由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组织体制和计划体制构成，因此改革应当从这三方面进行。1956年，政府在经济学家建议下，撤销了6个部，其中5个是经济部，还撤销了3个中央局。约·西伦凯维茨总理在1957年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议会解释说："这样做不是为了机械地精减部，它首先是同正在进行的计划管理体制的

改革有关，同分权及扩大中央各管理局和人民会议的独立性有关。改组是分权的结果，但它也同时关系到进一步分权，并将便于和加速分权的进行。必须指出，这种改组的主要目的是加速下层环节的自主权的实现。”1957年6月，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府的意见和经济学家的建议，提出了“关于改变经济模式方向问题的提纲”，对中央计划的范围、企业的自主权及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对工业实行有计划领导的措施及实施的阶段、步骤作出规划。在它的建议下，将以往下达给企业的几十项指标减少到8项；企业在使用银行贷款方面的权利也扩大了。

从1956年底以后，共产党、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维辛斯基大主教被释放并恢复了原先的神职。天主教人士的代表甚至参加了议会选举。在1957年大选中，当选的无党派议员里包括12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他们在议会中组成了称作“标志”的天主教议员俱乐部。

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对天主教在波兰的存在采取了宽容和合作的态度。哥穆尔卡在党的代表大会和许多场合都谈到了波党对宗教及教会的新的方针。他说，进步天主教运动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是可能的。“……为了巩固我们大家的祖国——人民波兰，我们还将寻求能把我们同进步的

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把我们同他们分割开来的东西”。他指出，党和政府不能在政策上对教徒采取施加行政压力的方法，而不考虑这样的事实：旧日同教会的争执使数以百万计的教徒敌视人民政权，使他们脱离了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必须加以纠正。“力求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是我党的指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党在社会上也不实行根据对宗教的态度划分人们的政治路线，而仅仅根据公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来判断他们的状况，公民为国家做的工作和为波兰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实际贡献是衡量他们的主要尺度。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国家对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问题，应当同对待每个公民的私人问题一样，应完全允许和保证宗教容忍及其信仰自由，即既保障进行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保障谈论世俗化原则和宣传科学世界观的自由。”①

新领导人对于天主教会的态度，大大改善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提高了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并从而巩固了政权以及新方针的合法性。这一点，从作为民意测验最好方式的大选上得到了反映。

1957年1月，波兰举行了新的议会选举。这一次与以往几次选举的最大区别在于，实行了差额选

① 《新路》，1959年第4期。

举方式；此外，这次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各大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协商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名单。

参加选举的选民达94%以上。人们看到选举站的出口处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形式的压力。这引起了良好的反应。投票者中有98.4%的人投票选举人民统一阵线的候选人。这是对“十月方针”的巨大支持——人们把哥穆尔卡八中全会上的讲话称为“十月方针”。在所有候选人中，哥穆尔卡得票最多，获得99.4%的选票。

按党派归属计算，被选入议会的议员分配是：

波兰统一工人党	239名	52%
统一农民党	118名	26%
民主党	39名	8%
无党派人士	63名	14%

社会气氛发生了急剧变化，八中全会的决议和哥穆尔卡的重新执政，使波兰举国上下感到兴奋、轻松。从华沙中心到边远小镇，到处有重见光明之感。“波兰的十月”在人们中间传诵，所有报纸、电台频频加以报道，舆论界充满宽松、自由气氛。人们听到了各种流派的歌曲，舞会上奏出了爵士乐和摇摆舞曲，人们的穿着也在发生变化。华沙的咖

啡馆重新开业，剧院里开始上演新的、过去不知名的作者写的讽刺剧和其他剧作。

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新的令人振奋的气象。

从1956年以后，被称为“波兰电影学派”的第一批电影艺术家崭露头角，他们在以后的年月里为波兰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斯大林主义时期曾经奄奄一息的电影界，创作出了新的、有深远而巨大影响的杰作。

电影大师、导演安捷依·瓦依达的电影《下水道》，被当作具有全国意义的头等大事而受到欢迎。这部电影第一次用电影艺术的语言表现出1944年夏天华沙起义的英雄主义和悲惨结局。对于参加过起义或有亲人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华沙人来说，观看这部电影是一个令人激动、心潮起伏的时刻。在“斯大林化”时期，华沙起义曾是一个忌讳的主题。瓦依达实际上是把这部影片包括在自己的三部曲之内。这三部曲是：《一代人》、《下水道》、《灰和金钢钻》。这三部曲的充满激情、感人肺腑、惊心动魄的画面，表现出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战斗和牺牲，以及华沙起义和战后初期的悲剧性的内部冲突，成为波兰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另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导演是安捷依·蒙克，他与瓦依达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主张少一些激

情，多一些思想，试图以自己的每部影片来传达某种信息、鞭笞某种罪行、惩治某些社会上和精神上的病症。他的影片是讽刺性的，然而是严肃的，多少带有一些悲剧性色彩。他留下了几部令人难忘的影片，如《小茅屋里的人》、《爱洛依卡》、《斜视的幸福》。不幸的是，由于过度劳累，他在这个世界上比一般人停留得要短。他最后一部没有完成的影片《旅行者》，是描写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滔天罪行的。

第三位电影艺术大师是耶曰·卡瓦莱罗维奇。他以《火车》和《约安娜-安琪儿的母亲》两部影片而闻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电影艺术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如沃伊切赫、哈斯、卡齐米曰·库茨、罗曼·波兰斯基、塔德乌什·赫米耶莱夫斯基等等。

在戏剧界，出现了独出心裁的、应用先锋派手法的创作，导演手法上也出现一系列小小的革命。著名的导演有卡齐米曰·德伊麦克。克里斯丁娜·斯库尚卡和耶曰·克拉索夫斯基等等。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揭露性作品，如卡齐米曰·布兰迪斯的《克罗尔兄弟的母亲》、耶曰·安捷耶夫斯基的《黑暗笼罩着大地》、罗曼·布拉特尼的《当机立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题材内容的作品，力图反映“斯大林化”时代人们的悲惨

生活和命运。

在诗歌方面，崛起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有阿·鲁特尼茨基和特·鲁热维奇。

克拉科夫地区创办的《横断面》周刊上，出现了颇有才华的青年讽刺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著作《大象》在波兰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他又写了一组讽刺剧，如《警察》、《在公海上》等等。他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讽刺效果，在全波兰甚至国外都有影响。

辩论俱乐部、大学生剧场、新的报纸和杂志——这一切，在“波兰的十月”之后的一段时期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理论研究方面，波兰的社会学特别活跃，引人注目。战前社会学在波兰已有悠久的传统，出现了克希维茨基、兹纳涅茨基、哈拉申斯基等优秀社会学家，但波兰社会学在“斯大林化”时期几乎销声匿迹。现在，社会学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和社会的论坛上。除了老哈拉申斯基之外，又有一些专家继承了波兰社会学的分析传统，象奥索夫斯基、霍赫菲尔德、扬·什切潘斯基等。

1957年，扬·什切潘斯基教授的著名论文《诊断的尝试》，在波兰全国引起热烈讨论。这篇文章试图找出波兰社会畸形的原因。作者认为，原因主要

有：（1）历史条件导致人们的心理平衡遭到破坏；（2）使社会整体化的非形式上的联系被抛弃了；（3）体制在形式上的组织（机构、团体）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4）政权的结构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执行其决定的方法不适当；（5）由于上述原因，历史形成的波兰人性格的某些消极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

文章写道："应当说，近几十年的历史是给波兰人民带来了过多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常现象的成因。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失业。1939年对德战争的失败、华沙起义的失败、国家解放后的各种悲剧、对六年计划的失望、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只是肯定会对人们的心理平衡产生不良影响的某些现象……。使人们不易理解的是另一些现象……。当人们把他们已经有的东西按照他们的想法认为可能有或应该有的东西不断地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反常。无疑，把我们的条件同其他国家的条件经常进行比较，就往往带有一种病态的性质。"

扬·什切潘斯基深刻地指出，"在波兰的困难中，经济困难并不起最主要作用。困难首先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性质。许多这一类的困难，即使没有大量的贷款和投资，也有可能加以克服。克服的方法是改进各种机构和政权机关的工作，发挥其他一

些社会团体的职能。政权过多的、拥有相互交叉职能的领导机构，造成了它们相互推脱责任的可能性。……居民们往往不知道该由哪一级政权解决他们的问题。政权机构极其复杂，而且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断发展和扩大，犹如一座可怕的迷宫，进到里面就很难找到出路……。政权机构无能和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这些机构是组织社会的唯一正式机构而带来了更大的损失。由于种种原因，不允许成立自愿的公民团体和协会来解决自己的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甚至经济的问题。缺乏这种自愿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无能，就抑制和分散了社会力量，导致了社会纪律的涣散和居民的不适当的行为举止……”①

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甚至今天看起来仍有意义。无怪乎当时许多波兰人就认为这是一篇他们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文章。

总之，“波兰的十月”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人民波兰处于反思和批判、转折和改革的充满希望的阶段。在悲惨的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被赐予了摆脱危机的良机。所有的波兰人都为十月方针所振奋、所鼓舞。人们都真诚地信赖着八中全会以后新上台的领导人，衷心地期待着一个新波兰的出现。

① 波兰《文化评论》杂志，1957年4月5日。

第五章

哥穆尔卡的悲剧

“我知道，一旦决定发表这部作品，我就踏在薄薄的冰层上，因为我写的题材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悲剧的，在人民的意识中又是活生生的。”

——米·弗·拉科夫斯基

从1956年到1970年，是波兰现代史上的“哥穆尔卡时代”。二届八中全会上众望所归的他，被一致推举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重任；15年后，五届七中全会上失去支持的他，又被解除了这一职务。在这不太长的15年中，哥穆尔卡经历了他本人政治生涯中最辉煌、最荣耀的和最耻辱、最痛苦的时刻。然而，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感受和遭遇如何，而在于千百万波兰人民的情绪和经历的变化。对所有波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由喜悦、期待、振奋变到失望、沮丧、悲叹的时代。

评价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是由于波兰

人自己对它存在分歧和态度上的犹豫，比如政治领导与知识分子之间、历史学家之间等，而且的确因为这段历史中同时包含了大量复杂的、既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因素，包含了太多的未知数（它们中间有些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和解释的）。我们不得不根据已有的有限知识和分析工具，对哥穆尔卡时代的成就和（尤其是）最终导致他个人和波兰民族的悲剧的错误、问题和失败作一大致的描绘。

哥穆尔卡时代的最大成就——对于第一书记个人和整个波兰都是一样——是波兰战后边界的被承认和波兰国际地位的巩固。这既是波兰外交政策的胜利，又是波兰人民追求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懈努力的结果。

如德·米利伏耶维奇准确地指出的那样："哥穆尔卡是这样一个人，在自己整个一生和在政治斗争中，最为重视的事情就是保障波兰的领土完整、承认波兰的新的边界。他在1945年和1948年为此而斗争过，在他为国家掌舵的14年期间也是如此。后来，许多人批评他，说他为了自己的'圈子'而忽视了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确实把巩固和保障波兰在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边界，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和毕生的事业。"①

① 《波兰在十字路口》，第85—86页。

波兰在战后确定的边界，很早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承认了。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坚决否认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的最终性质；在欧洲，联邦德国是唯一不同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形成的波兰地理版图的国家。这种不承认现实的态度，怂恿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的修改边界主义者和复仇主义势力的活动，使许多波兰人余悸不散。它使“冷战”气氛在欧洲迟迟难以结束，并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波兰坚决地拒绝了由某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家倡议的一切不彻底的解决方案，揭穿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届政府企图在边界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立场中制造裂痕的每一次尝试，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持下，坚持不懈地为波兰的主权、波兰民族的生存而斗争。哥穆尔卡政府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全力以赴地展开了争取联邦德国承认现有边界的工作。

这种努力最终得到了报偿。

由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要求和争论，以及勃兰特“东方政策”的成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改变了立场，不得不适应现实，承认了波兰的要

求。1970年12月7日中午12时，座落在华沙“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的部长会议大厦的圆柱大厅内准时开始了一次重要的、使所有波兰人难以忘怀的仪式——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的签字仪式。在条约上签字的，一方是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外交部长莱德里霍夫斯基，一方是来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谢尔。条约的主要设计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站在他们后面。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工作的声音咔嚓作响。在当天向波兰、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千百万电视观众播放的电视新闻中，在翌日出版的欧美报纸头版的新闻报道上，都重复着这个场面。

更使波兰人难以忘却的是这样一个情景：签字的当天上午，勃兰特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官员陪同下，在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簇拥下，向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死难者纪念碑献了花圈。就在这一时刻，他出人意料地在纪念碑面前跪下，表述德国人的忏悔之情。

这一姿态和以承认边界为基础的关系正常化条约的签订，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促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发生良好的重大

变化。哥穆尔卡的夙愿变成了现实，所有的波兰人为之欢欣鼓舞。

哥穆尔卡的这一成功只是他执政以后波兰整个外交政策成功的一部分。从1957年以后，波兰积极地投身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多地提出各种倡议、主张，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成为一个为世界所公认的为国际和平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例如，早在50年代末，命名为“腊帕茨基计划”（腊帕茨基是当时的波兰外交部长）的著名倡议，向世界各国提出了在中欧地带建立无核区的主张，在东西方引起了很大兴趣和讨论。以后，又在类似问题上提出了所谓“哥穆尔卡方案”。波兰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十分活跃。

波兰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1956年11月联合声明以后，波苏关系逐步建立在比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都有扩大趋势。波兰是经互会中除苏联之外最大的国家，就经济潜力而言，它也是经互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60—70年代这段时期中，波兰同经互会其他国家在能源开发、技术合作、资金利用和共同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哥穆尔卡执政年代，波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相对某些东欧国家而言，始终是良好的。两国特别有效地发展了经济合作并给双方都带来了益处。1957年，哥穆尔卡访问了南斯拉夫，1964年，铁托总统回访了波兰。在那时的气候下，这些合作和访问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德·米利伏耶维奇这位南斯拉夫知名的记者评论说："诚然，当'阵营'内的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而冷淡下来的时候，波兰也参加了某些反南斯拉夫的活动，但这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恶化两国的关系。众所周知，1958年4月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南共纲领。而在这次大会的筹备期间，就在阵营内的各国共产党中间引起了反应。于是，在报刊杂志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波兰人是最后参加这场运动的，他们对于纲领草案的批判性意见只局限在某几个问题上。首先，他们对于霸权的定义感到不悦，其次是关于如何评价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同盟国协定问题，还有对于集团政策的态度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设想，等等。他们认为，如果南共纲领草案已经通过，那么，纲领的内容应当是有关南斯拉夫发展的问题，而应删去有关国际关系和动向，以及一切不属于南共联盟管辖范围内的问题部分。"① 显然，波兰人不愿看到争论的再度扩

① 《波兰在十字路口》，第87页。

大化。

必须指出，在哥穆尔卡时代，波兰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采取过十分消极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它参与了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不过，总的讲，这一时期波兰外交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在经济方面，哥穆尔卡执政年代也是一个在波兰继续展开工业建设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期。波兰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世界上最发达的10个工业国家的行列。发展的重点仍然是在重工业、冶金工业和采矿工业上，同时开始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和一般化学工业。还发现了储量很大的铜矿，使波兰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为欧洲重要的铜生产国。在这个时期，对基础设施也给予很大的重视，修建了现代化的道路、飞机场、百货商店等等。国家越来越对世界开放，并且相当迅速地摆脱了以往的孤立状态。

然而，波兰这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成就宣传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和错误。大体上，可以把1956年至1970年的经济发展分到两个阶段：前一个时期从1956年到1960年，后一个时期是整个60年代。前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使经济逐渐恢复平衡；后一时期的方针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重蹈旧辙，并最

终引起了危机。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情况。

1956年至1958年的3年，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七中全会、特别是八中全会作出改变经济政策的决议后，这几年出现了较好的形势，主要是因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速度和改变了投资结构，例如对农业增加了投资。农业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停止推行集体化，鼓励个体农民扩大生产。

1956年至1958年间，在“波兰式道路”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批判了管理体制的过分集中化。这场讨论的结果，加上其他工作，使制订计划的方法、经济核算、价格的制定原则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过去那种过分集中化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阻碍生产发展的东西减少了，扩大了企业和工人委员会在制定计划和实行管理方面的权限。

1956年以后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保障经济更加有比例地平衡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50年代初期被废止的非农业性个体经济成分也重新得到恢复。

1956年至1960年的5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到1958年，这一时期工业生产每年以

9%的速度稳步增长，市场商品和居民生活用品的生产增长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因此，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产品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相同的。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六年计划期间开始兴建的大量工业项目纷纷开工，同时一部分工厂转向生产市场需要的商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工业投资规模没有大幅度增加，而生产却得到了发展。1956年至1958年的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6%左右（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5年至1960年期间投资年增长率为9%左右）。

由于缩小了投资在可分配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用于消费部分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956年至1958年间，实际工资增长了约25%。

然而，1957年底以后形势开始变化。靠"吃"六年计划期间大量投资带来的效果扩大生产的可能性逐渐耗尽了。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因而要为他们提供劳动岗位。同时必须注意巩固外贸支付的平衡。

这些因素导致重新增加投资，使结构又发生了变化。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比例又扭过来了。1959年第一部类的产值增长了33%（1958年为9%）第二部类增长了仅5%（1958年为11%）。对此发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农业在连续3年增产

后，1959年的情况不如以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削弱了消费增长的势头。如果说，1956年至1957年消费基金年增长率为11%（实际收入约增长14%），那么1958年至1966年期间仅增长了3.2%（实际收入增长了3.5%）。

尽管如此，与60年代相比，1956年到1960年这一五年计划期间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居民的工资和实际收入都增加了。住房建设的成绩也不小：总共交付使用的住房达60万套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1950年至1955年六年计划期间的两倍。医生的人数从1955年的1.8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29万人。每年的中学毕业生人数从27万人增加到39万人。此外，书报杂志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了。

整个60年代与5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相反，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直至完全陷于停顿，然而，用于积累的支出却大量增加。1961年至196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原料基地的建设，投资周期很长。用于发展燃料开采和电力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32%。还有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化工原料和有色金属的开采。最初的打算是，到这个五年计划终了时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消费品生产，结果因为原料和能源

投资大量增加而告吹。在1965年，用于燃料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21%，电力工业占11%，化工和化工原料开采占12%。

在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的年增长速度约8%。由于就业迅速扩大，劳动生产率仅增长4%。1961年至1965年间，从工业产品结构讲，第一部类产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第二部类产品的增长速度。前者增长了55%，后者只增长了37%。

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1962年是战后最严重的一个灾年，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谷物、土豆严重受灾。造成农业形势不佳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以牺牲个体农户为代价，片面强调发展公营经济。

这一切都对消费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一时期中，年平均消费增长率为5%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3—4%。同时，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也很低。如果以1960年的实际工资为100计算，那么到1965年，大约只有108。这就是说，这一时期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只有1.5%左右，其中1962年增长0.4%而1965年增长指数为零。

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计划期间，经济仍然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4%，而增长幅度呈减慢趋势。国民收入头3年的平均增

长率还达到7%，而后两年只有4%。这种下降趋势在国民经济的所有基本部门都是如此，而以农业为最甚。与创造的国民收入相比，这一时期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小，5年只增长32%。

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的同时，投资额的增长幅度却相对较快，达到平均增长9.2%。结果，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从1965年平均26%增长到1970年的27%，而用于增加固定资产的净投资额比重从18%增长到21%。

消费增长速度比60年代前期更差。如果说，1966年至1968年消费的年增长率为4%，那么，1969年至1970年增长率却都低于2.5%。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从1966年至1967年的年平均2.6%减少到1968年至1969年的年平均1.5%，到了1970年，增长速度为零。尽管1969年投资速度下降到6.9%，甚至在1970年下降到2.3%，但还是无法扭转这种趋势。影响这一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当时，年增长率为4.9%。

60年代末期，经济形势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业生产效果极差，这不仅是因为气候条件恶劣，而且也因为发展计划中对农业的需要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1968年相比，1969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

4.7%。1970年4种主要农作物（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公顷21.6公担，下降到每公顷19.6公担，而畜牧生产下降了1.1%。

国民经济发展形成的这种宏观比例影响了市场平衡，由于居民的生活支出不断增长以及农业形势造成供应十分困难，社会不满情绪增长了。

有关居民生活条件的其他领域的状况也很糟糕。诚然，1966年每1530人分到1000间住房，而1970年每1370人就分到1000间住房，但这一时期中交付使用的住房面积大大缩小了，即使这样，住房数量的增加还是远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如果说，1965年每1000对新婚夫妇分到了853套住房，那么，到1970年每1000对新婚夫妇只分到693套住房。

哥穆尔卡时代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发展的这些数字，有助于我们理解波兰1970年危机的经济根源。波兰经济学家M·米夏克认为："总起来说，60年代经济遭到挫折的根源在于没有采取坚定的一贯政策进行经济改革。由于保守势力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施加压力，十月转折之后，在经济政策中曾出现过的建设性因素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势头，因而导致经营效果下降，在消费领域也出现了种种消极现象。这就是发生1970年12月沿海地区悲剧性事件的根本

原因。”① 至少从经济角度看，他的结论是不错的。

波兰从1956年后一度有过的经济改革势头并没有持续下去。事实上，这场改革在不声不响中由于各种原因流产了。从1956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至1958年期间，经济学家们尽了各种努力，制订经济改革方案并督促政府实施。但这项工作始终限于纸上谈兵。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进展缓慢，除了使人有些兴趣的理论讨论外，它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经济委员会为实际运用它的理论而采取的部分措施，未能维持多久，因为这些措施要想奏效，必须触及到经济体制本身的根本变革，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后面将进一步说明这种条件中的政治反作用——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经济委员会的建议甚至招致反感和冷淡。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当时就抱怨说：“不论我们创建什么，试图改变什么，都被看作是我们带来了损失！”

与经济改革一起流产的还有工人委员会。从一开始，当工人委员会还处于上升阶段之时，就潜藏着一个内在的矛盾（不管人们当时是否已经察

① M·米夏克：“波兰经济发展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波兰《问题与资料》杂志1984年第26期。

党）：虽然当权者和工人们一样为工人委员会的出现而鼓掌，但他们与工人们的期望却是不一样的——官方的意见是，工人委员会应当在经济事务方面照管国家无法顾及的那一部分工作，而不是发挥政治社会影响。这一点，在1957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决议中表述得很清楚："工人委员会应当首先集中注意改善经营状况，节约原料、动力和燃料，改善劳动组织，正确地使用劳动力和配置领导干部，实行切合实际的工资政策，反对盗窃和舞弊，改进劳动纪律，推行辅助性生产"。工人们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则不太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主张："不能要求委员会象迄今为止那样成为一个纯经济性机构。我们认为，把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任务移交给工人委员会，也是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必要前提。"①

正是这两种差别巨大的想法和要求，使得工人委员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许多麻烦和阻力，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工人委员会将要夭折的命运。人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未得到改革之前，自治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很难成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官方和对于隶属于官方的经理阶层来说，这总是一个公开

① 1954年第4期《直言报》。

的或潜在的威胁。也许举一个今天的例子不会是无益的：1981年8月19日，波兰全国70家大企业的经理们在拜会政府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时，表示反对在那些“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企业内实行由职工自治委员会任命经理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企业的经理和厂长应由国家有关机关任命，必须由政府明确规定企业经理和厂长的权限以及任免的原则。

还在1957年，在华沙工人集体代表会议上，“7月22日”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谈到了中央机关是怎样拒绝承认他们的每一项倡议和每一点独立行动的；“帕伐瓦格”工厂的工人委员会主席则讲到他们如何经常被指责为想要制造“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为他们的集体寻求最为有利的解决办法。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抱怨，他们继续从中央得到原有指标的计划，政府机构想要继续按照旧的体制管理企业，等等。不只是工人代表们有这种不满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对拖延和消极的做法感到失望。一些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党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应通过“新的革命”来摧毁官僚体制，并按照工人委员会的原则从下而上地改造整个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对变化缓慢越来越不耐烦，有的工人委员会出现了过激的情绪和要求，

有的甚至同官方控制的工会在“谁更重要”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和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委员会逐渐被看作是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异己力量，看成是一个已完成了其短暂的过渡任务、因而应当加以取消或改变的形式。

1958年初，政治家们已在准备提出关于企业中工人管理的“新”设想。哥穆尔卡在1958年4月14日的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说：“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所有企业中，无论是已有工人委员会的企业，还是至今尚未建立工人委员会的企业，都建立企业的新的社会性机构。这种机构可称作‘工人自治代表会议’。”按照他的建议，“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应包括工会、党委、共青团和原先的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虽然从名称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这种“工厂自治代表会议”是在党的委员会控制、监督之下的，它意味着原有的工人委员会名存实亡，用一种职能不明确、构成复杂的半官方机构取而代之。实际上，正象德·米利伏耶维奇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新的“工人自治会议”从未获得过象波兰十月时出现的工人委员会所拥有的那种职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代表会议仅仅起到了一种生产咨询会议的作用。

1958年12月20日，波兰议会根据波兰统一工人

党的“建议”正式通过决议，决定在各工矿企业建立“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决议规定了代表会议的构成原则，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作为工人自治机构的工人委员会接受工会的监督，它的一切职权均由工人自治会议接管。工人委员会的短暂历史就这样结束了。波兰著名经济学家，1956年至1958年经济改革设计人之一的布鲁斯教授指出：“波兰是最早制订出进步的经济改革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因为在1956年十月事件后不久就迈出了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步。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承认，他们——在他们所发表的纲领中——反复声称想要实行那些改革方案的愿望。但是，事实仍然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原因主要是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些限制。要使经济制度中的变化同工人自治的成长相互联系起来的尝试招致了特别的冷遇。‘波兰的十月’期间在工厂里自发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变为差不多是纯粹形式上的作用，完全丧失了它作为经济管理中工人的真正代表机构的特征。”①

读者或许会问：哥穆尔卡不是在波兰人民的拥戴下才上台的吗？他不是一直希望走他所说的“社

① 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会主义的波兰的道路”和多次强调工人自治的必要吗？为什么仅仅几年内（事实上只有一两年时间）他就改变了思想原则呢？

象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哥穆尔卡虽然很早就提出过“波兰式道路”的设想，但他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苏联的模式在波兰行不通，希望有一个更符合波兰国情和特点的发展方向；他并没有真正从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和它体现的那套制度决裂，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根源和危害；他甚至把苏联1953年以前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个人迷信”，从而放弃了彻底批判和根除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绝好机会。对于他来讲，需要否定和抛弃的只是那些不人道、残暴、恐怖主义的东西，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并不过分地讲，哥穆尔卡以及由他所代表、所执行的政策是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斯大林时代的。所以，当工人委员会真正兴起并要求日益扩大其社会政治作用时，当经济发展和经济困难迫使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在彻底改革旧体制和回到原先的做法上作出抉择时，尤其是当外部压力大得足以迫使放弃对旧时代作有限的批评时，哥穆尔卡和他那一批“新”领导人都最终地站到了旧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一边。

195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重大裂

痕，南共联盟纲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谴责，使1956年以后一度改善的南苏关系又趋紧张，也使共运内部及各国党的思想倾向发生急剧变化。

南共联盟纲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1958年4月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按照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制订的南共联盟纲领。这个纲领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带有过渡性质，应当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力量活动的自由范围；它强调了国家消亡的必然性，提出应当逐步缩小国家对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政策的作用，而把对它们的管理交给社会机关。

南共联盟纲领谈到，生产者、劳动集体和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承担者，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任务是“使这些因素能够在整个社会计划和统一制度范围内自由地进行活动。”根据这种认识，南共联盟把社会主义确定为“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化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生产由联合起来的直接生产者管理”。

纲领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中采取的强迫方式，主张走农民同具有主要作用的社会部门自愿合作的道路。

纲领谴责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认

为它造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相应的落后现象。纲领主张通过认识和揭示新的现代社会现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它还提出，南共联盟在这方面绝不搞任何垄断，也不充当社会科学方面公断人的角色。它说，“任何已经创造的东西对于我们都不是神圣不可超越的，都不是不能让位给更先进、更自由、更具有人性的东西的。”①

南共联盟纲领所包含的不妥协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和否定旧体制的态度，在仅仅把批评斯大林时代限制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整个苏联和东欧地区引起强烈不安。很短时间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回潮，南共联盟纲领受到各国党激烈的批评和攻击。

1958年4月21日，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费多谢耶夫等写的《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一文。该文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有不少地方同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显然是有分歧的。”

4月25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三国党的负责人在各自召开的纪念列宁诞辰88周年集会上，指责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多处违背马列主义

① 参见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396页。

原则。

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南共修正主义观点必须严格批判。

5月10，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说南共纲领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公开宣扬修正主义并且替敌人打掩护。

6月3日，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七大上发表演说时说："南共领导人无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经验；修正主义是一种特洛伊木马计，企图从内部瓦解革命政党。"他赞扬"各国党团结一致坚决谴责南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恶劣立场"，认为"情报局1948年关于南共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

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苏波人民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世界已经找不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这样的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会同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会表示捍卫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立场。工人阶级的一切革命政党都认为南斯拉夫纲领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并严厉谴责南共领导人的破坏性的分裂活动"。

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莫斯科声明》，一致谴责"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

义”，提出：“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波兰不是南斯拉夫，哥穆尔卡也不是铁托。从50年代后期的最后两年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从“十月方针”后退，不再提“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这一概念；尤其严重的是从这时起，“修正主义”取代“教条主义”成为党的思想上的主要敌人。与“波兰式道路”相联系的工人自治、工人委员会、经济改革、人民代表会议等等设想自然也都付诸东流。

哥穆尔卡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这样解释“不得不”进行的转变：

“……对教条主义和对过去错误的尖锐的、必要的批评，在政治上不够坚定的、动摇的同志中间，引起了走向另一个极端、接受修正主义立场、对我们思想体系的科学基础产生怀疑等倾向……。”他强调，“在当前情况下，修正主义是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因为它破坏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散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性、合理性的怀疑”。

1959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他更加系统地批判了“修正主义”：

“……在目前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这并不在于修正主义分子的人数多少，而在于修正主义同国内外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势力有着客观的联系。

修正主义的代表并不多，但是他们却大肆叫嚷。修正主义的危险在于他们从内部破坏党的思想上的一致，散布对共产主义、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信任。在党的困难关头他们通过钻入宣传中心，如报刊和电台等，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际反动派，以及在他们的队伍中的我们的某些流亡分子集团，把希望寄托在修正主义者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于修正主义他们能够分裂我党的团结。正因为如此，反动宣传的喉舌采取了加强和扩大修正主义影响的方针，并把它看作是客观上的同盟力量。

……

修正主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它同绝对民主化的要求和‘社会力量自由竞赛’的要求对立起来。

修正主义分子提出了煽动性的社会口号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各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和在工业中的全民所有

制。

修正主义者把自己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党给予修正主义以有力的反击，是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条件。”

然而，可惜的是，这种对于“修正主义”的讨伐，不仅没有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反而使这种东西真正泛滥开来。从60年代起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宣传文件、方针政策中，开始见不到独立思考的影子，有的只是与其他党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公式。

哥穆尔卡的调子逐渐变化，愈来愈趋于保守、封闭、谨小慎微。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波兹南事件一周年时，本来许多人预计他将根据八中全会精神，进行详细的、有批判性的分析，但结果，他只是说这是波兰人民历史上的一页悲剧性的篇章，应当在冲突双方的墓前放置花圈。

从50年代末开始，波兰的当权者又逐渐同人民对立，传统的“我们的”和“他们的”政治词汇又重新回到工人、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哥穆尔卡本人也与那些为恢复他的职务创造条件的广大群众发生了冲突。直到他下台为止，这种紧张的社会局面就再也没有缓和过。

1957年，著名的大学生杂志《直言》被查禁。它的编辑部被解散。大学生们对此反应强烈，出现了严重的骚动。这年秋天，大批大学生在华沙举行抗议示威，警察奉命进行了严厉的干预；

同一年，罗兹的电车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罢工，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较小的罢工；

许多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开始退还党证，以此表示自己对于“十月方针”的落空感到失望和抗议。他们中间有安杰耶夫斯基、雅斯特隆、瓦日克、扬·柯特等人（这在后来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即用退党的方式表示对政策的不满）。

60年代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当年3月8日，由于政府决定禁演根据亚当·密茨凯维兹的具有反俄性质的长诗改编的话剧《先人祭》，引起知识分子和作家协会华沙分会的抗议，华沙还爆发了大学生游行示威事件。这一斗争从3月8日延续到3月22日，并扩展到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人们后来称这次事件为“三月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抗议浪潮中，大学生们的口号是“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

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哥穆尔卡领导层又逐渐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近乎于独断专制的决策程序，并对社会公众和

舆论重新采取了封锁信息、欺骗社会、掩饰错误的态度。布鲁斯就当时的情形举例说：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经验不可避免地教会人们，服从党的路线——不顾现实的社会后果——会得到利益，而批评党的路线则会给个人带来麻烦。就经济领域来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要把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计划方案——它的执行带来了特别是1970年12月的悲剧后果——付诸讨论的尝试流产了。计划所包含的概念——在有关农业政策特别是农产品对外贸易这个限度内——由于担心有可能降低肉食生产从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引起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反对。这是在1964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大会前正式发表的公开讨论期间发生的。有人做了公开表示保留意见的尝试，尽管没有任何一点是关系到根本的社会主义原理的，而全部是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具体解答。一位最知名的、在国际上受尊敬的波兰经济学家（指米哈尔·卡莱斯基——引者注）用论文发表了他的意见；并且他没有停留在只是批评上，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党的领导立即对他采取了异常激烈的行动。所以实际上的讨论尝试马上都被压垮了，而且党在任何时候（包括大会）甚至连探讨已经提出的代替方案的可能性都不考虑。在这个经验之后，有

主见的经济评价或分析的余地的任何希望都不存在了。”①

米·弗·拉科夫斯基这位非常熟悉上层内幕的政论家，在他的著作《十二月转折》中详细披露和批评了哥穆尔卡晚年的专制集权作风及其表现。他指出，哥穆尔卡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领导人，他喜欢要求人们从属于他自己，并强加自己的意见与他人。他忠于思想，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但如果有人说他的统治作风容不得不同意见，他会感到惊奇和不满。在他担任第一书记的年代里，他的工作作风造成了一种不能对领导人进行任何严肃一点的批评的气氛。这不等于说在中央全会上从未有过批评性的发言，但持不同意见的人必须事先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将被列入第一书记的充满原则性的总结中去，作为受到批判的靶子。

拉科夫斯基认为：“对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专断作风应负的责任，假如都加在一个人身上，加在哥穆尔卡身上，那是极不公正的。但是，抛开最亲密的同事应负的共同责任不谈，应该注意一个事实，即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整个结构中，特别是在执政党的结构中，第一书记处于客观上被赋予极其广

①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第128—129页

泛权限的地位。他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的、不允许滥用党的权力的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就是这种机制。可是事实上这种机制无论在十二月事件前，还是在十二月事件进程中，根本没起作用。”①

波党五届七中全会成立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题为《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结论》的文件表明：50年代后期，政治局还经常召开会议；60年代以后，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少；到60年代末期，政治局一年只开几次会，中央书记处几乎是根本不开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经常认真地讨论问题、交换观点和开展批评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决定是在第一书记已经事实上拍板定案的情况下通过“转圈子”的方式作出的。在政治局内都有一个狭小的“由第一书记贯彻的人组成的小团体”，形成所谓的核心领导，控制着实权，不能容忍批评，不容纳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倡议。

上述文件认为，政治局内实际上有一个包括哥穆尔卡、克利什科和雅什楚克的“三人领导小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事先由他们先决定好了的，然后政治局、书记处履行公文手续。雅什楚克是政治局

① 《十二月转折》，第二章第四节“痛苦的清算和活动纲领”。

委员和主管经济政策的中央书记，克利什科是政治局委员和掌管干部政策和思想生活的中央书记。我们可以从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这次会议解除了上述3人的职务，它是在十二月事件之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们对哥穆尔卡等人的激烈批评中，窥视一下“核心圈子”专断独裁的情况：

肯帕指出，“哥穆尔卡同志不遵循集体领导原则，专断地决定一切”，这对于以恶劣的方法领导党的工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或反对的意见”。他“对许多人，对集体，以及对整个党组织”都疑心重重。

克鲁克在描述1970年12月以前政治局里的气氛时指出，“今天说起这些是痛苦的，因为哥穆尔卡同志在长时间内对我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列数了哥穆尔卡为党建树的功绩，然后说：“我们同样应该知道，最近几年他已经不是正确地在领导党了。这是因为在他的个性中有一些不好的特点，他多疑，甚至对最接近他的一些领导成员也怀有成见。后来，象雅什楚克这样的人又向他进谗言，弄虚作假，说悲剧可能威胁我们的国家，说所有的人都想捞一把……这些致使他失去了健康。”

沙夫兰斯基说，较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党内事情不妙，同工人阶级谈话越来越困难

了”，不安和怀疑被“政治局委员们，特别是哥穆尔卡同志的威信”遮盖过去了。不受党监督的第一书记个人的权力增大，再加上个性的特点，导致领导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中断。

莫查尔说，“我既不打算袒护维斯瓦夫同志，也不想得罪他。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好几年了。我同他是在很困难的时期、即德国占领时期建立联系的。但是我要说，维斯瓦夫同志就好象党内的家长，并且毫无疑问也是个独裁者。他周围的人都是百依百顺的。否则，维斯瓦夫绝对不能容忍，并会把他们抛弃。与此同时，他不认为这样是不能领导党的工作的，也没想过应该听取不同的观点。”莫查尔认为，那些围着哥穆尔卡转的溜须拍马的人利用了他性格的特点；是这些人使哥穆尔卡一直相信他的所做所为都是正确的，英明的，一切均应如此等等。“由于那些吹鼓手，结果使维斯瓦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逐渐地避开了同人们的接触。我记得，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需要这种接触。他变得更难于接近了，接着人们也回避他，不愿意碰见他，因为他有时很严厉。”

当时任总理的西伦凯维兹说，向各领导成员通报食品供应恶化的情况引起了“哥穆尔卡同志的勃然大怒”。这说明没有可能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谈自

己的观点，“因为这会刺激哥穆尔卡同志妄自尊大的敏感性，破坏他的权威感，好象他的权威会因不同意见而发生动摇。”实际上，说话只能顺着哥穆尔卡的意思，只能对决定略作修改。他举例说，几年前，“有一位杰出的并对我表示信任的经济学家，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给我送来了一份他写的关于经济形势的备忘录。我认为这个文件很有意思，就转给了哥穆尔卡同志，并注明值得一看。几天后在一次见面的时候，哥穆尔卡同志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文件并要求撤这位作者的职。从那时起我就不给他送有不同意见的备忘录了，以免损伤他人。”西伦凯维兹认为，60年代前几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商量的可能性，“当然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那样就会被怀疑是另树旗帜，而且也不管什么用。当时只能个别交谈……最近几年就连这点也不可能了。任何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相反，政府和我本人受到了猛烈而粗暴的攻击”。

人们对雅什楚克和克利什科也作了大量指责，比如进谗言、假报告、压制批评、专横无理、任意干预等等，认为他们“以不能容许的专断方式直接干预了政府和经济部门的活动”，与哥穆尔卡一道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仅中央委员们，连

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无法了解一些重要情况，无法参与决策和发表意见，使得政治极为神秘化，使人民群众远离权力机构。这是哥穆尔卡时代继承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表现。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示这种东西的性质："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国家已经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势力而存在。"①

在上层、在权力机构中是专制集权和神秘化，在下层、在社会生活里则推行着一种"禁欲主义"和原始平均主义，哥穆尔卡时代向人们展示着这样的画面。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哥穆尔卡总是在向人民灌输一种淡泊、清贫、寡欲的生活信念。比如，当有人告诉他，工人们对于住宅大楼里几家合用一个卫生间表示不满意，他就回答说："我家只是在院子尽头有一口水井。他们应该理解，波兰现在有很多叫人操心的事情……"。60年代中期，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造价低廉的住房建设。这是一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303页。

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的住房。它甚至连厨房都不开窗户，尽管大家都知道许多工人家庭的家庭生活都是在厨房过的。当人们告诉哥穆尔卡，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一辆汽车，他却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对于现代生活的要求，他即使理解，也不予以重视。以致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印象，追求应有的生活水平是坏事，有了小汽车是奢侈。《政治》周刊的政治家在1970年底提出了生产廉价小汽车的经济和社会目的性问题，结果被公开指责为散布“消费情绪”。有人警告编辑们，不要无批判地宣扬西方杂志推崇的时装。拉科夫斯基批评说：

“在60年代，生活水平的提高过于缓慢，几乎不为人们所感觉，波兰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一年比一年加剧。很大一部分劳动者，例如轻工业部门的工人，不开私人门诊的医生，教员，国家机关的小职员，他们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线上。他们工资本已微薄，又多年无所增加。与此同时，宣传工具几乎每天都在向社会灌输说，波兰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正在不断地改善。甚至向社会进行这样的说教：你们不好好工作；你们给予国家的少，向国家伸手要的多；你们的生活超过了可能。

……

对于千百万波兰人来说，6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

政策一年比一年难以理解和缺少吸引力，赞成这一政策原则的人也日渐减少。社会上滋长了一种看法，即国家在原地踏步走，国家领导人似乎建议大家在今天和明天实行某种清贫的社会主义。前途不是大有希望和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对于百万年轻的波兰人更是如此。对于年轻的波兰人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已经不再是回忆对比的出发点了。可是那些领导人，他们在斥责‘消费倾向’的同时，却一再引用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不愿意或不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在许多公开讲话中，他们求援于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他们引用的事例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唤起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想象力。许多人认为，领导人如此热心地大谈特谈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主要是企图依此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没有能力解决由于整个战后时期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①

由于官僚主义和旧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作用，许多事情都半途而废了，经济又重新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计划和总产量的增长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尺度，而忽视了质量指标和生产中的比例关系。企业中劳动力的大量过剩使劳动生产率下降，

① 《十二月转折》，第一章第一节“暴风雨之前”。

消极的、有意无意的怠工现象层出不穷。虽然花费了巨额投资，但投资效果极差，周期不断延长，大量材料燃料和宝贵资金耗在里面。报上经常有这一类报道：有的工厂到了一批设备，当安装它们时，发现新修好的厂房太小以致设备无法安进去，于是只好折掉厂房重建。计划一再落空，指令性的中央指标在人们眼里的信誉日益下降。

农业在各部门中尤其落后。这不仅是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改造农村生产关系的方针和有效的手段，而且由于各项具体政策卡得太死，缺乏刺激作用。国家的价格管制政策表面上是维护人民生活水平，但却导致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按6个兹罗提1公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的牛奶，却以4个兹罗提1公斤的价格在国营商店出售，其差额由国家补贴。结果，许多农民卖出牛奶后再到商店里买回去。最困难的是肉类。由于饲料主要靠进口以及价格制度方面的问题，肉类生产从来没有满足过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不堪，而城市居民却很难领国家的情，因为他们看到有钱也难买到东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始终调动不起来，因而生产老也上不去。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恶性循环。

到了70年代初期，哥穆尔卡政权对于波兰人民来说变得同样难以忍受。虽然在这个政权下不会有

50年代中期以前那种危险，那样的不安全感，但一种新的、慢性病似的东西缠绕着人们的手脚和社会的机体。真正的热情、认真的工作已没有了，有的只是牢骚满腹以及潜意识状态的抗议。特别是当波兰人看到西方邻国日益变得更加繁荣同自己国家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不满情绪便加剧了，成为新的危机的引子。

布鲁斯教授在分析波兰“十月方针”的失败时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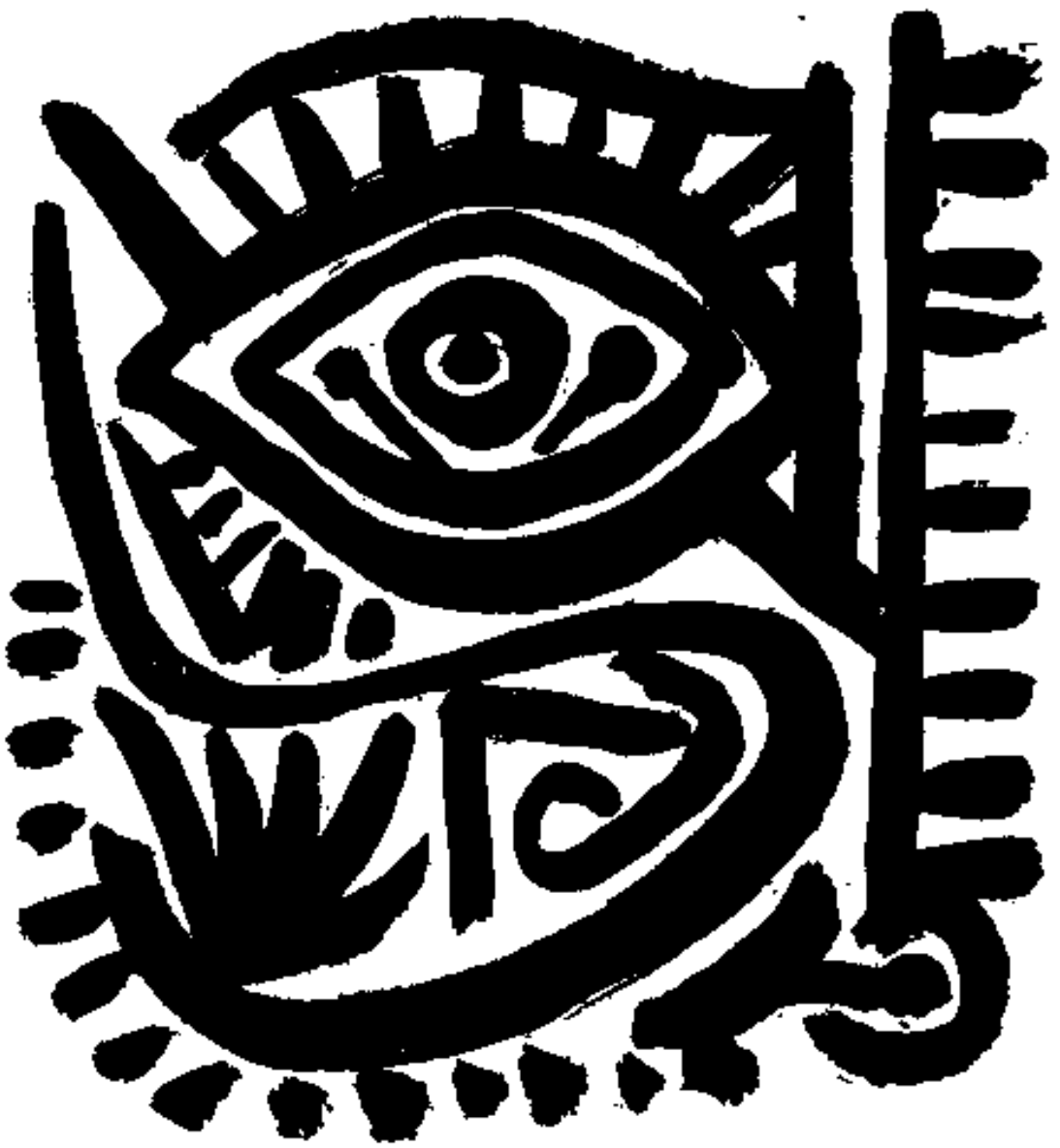
“1956年想通过党的变化来达到东欧社会主义的真正改革的波兰的尝试，终于以失败而告结束，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匈牙利革命是由于苏联军队的野蛮干涉，在流血中被窒息了，那末波兰的十月事件首先是当它在做正常化努力之际，得到苏联及其集团其他各国领导支持的内部保守势力进行了煞车，紧接着就被迫发生了形势的倒转。哥穆尔卡的掌权曾经被认为好象是一个胜利，并且绝大多数居民和大部分复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曾祝贺了这一胜利。但是实际上，这是寿终正寝的开始。运动逐渐地而且持续地开始倒转，那就是要使波兰的制度在本质的方面（即使不是在所有的方面）同其他东欧各国相调和。”①

① 《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第143—144页。

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六章

十二月危机



“事情很明显，不能只在提价和提价方法所造成的痛苦中探讨十二月危机的根源，危机是多年滋长起来的，并具有更深刻的原因”。

——爱德华·盖莱克

对于波兰人民来说。70年代第一个年头的最后一个月，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被称为“十二月危机”的这次事件，给波兰人留下了血的记忆。

物价的变动，成为这次震撼整个波兰的爆炸性危机的导火线。

1970年12月13日，星期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公布了部长会议头一天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商品改变零售价格的决议。决议中说，价格的变动“是多方面的，包括了比较广泛的市场商品”。它告诉波兰人民这次物价变动是“有升有降”的。有40种产品的零售价格平均降价从86%〔香皂〕到45%〔丝涤纶长袜〕不等。降价的

商品包括：电视机、收音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涤纶混纺布匹、人造丝、药品、弹力连袜衬裤、电灯泡、自行车灯泡、手电灯泡、颜料和油漆、某些玻璃器皿、火柴、某些食品罐头，油毛毡等等。45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提高幅度从3.6%〔纱布绷带〕到92.1%〔人造咖啡〕不等。其中，肉和肉制品平均提价17.6%，小麦面粉和稞麦面粉提价16.6%，牛奶制品提价3.8%。鱼及鱼肉制品平均提价11.7%，果酱等提价36.2%，甜点心提价12.4%，麦粉提价23%，大麦米提价31%，通心粉提价15.3%。在建筑材料中，陶瓷砖提价36.6%，陶瓷瓦提价17.8%，花瓷砖提价19.9%，木材平均提价20.1%，硬煤提价10%，焦炭提价20%，褐煤提价14%。提价的商品还有亚麻布、丝绸、某些种类的毛料、棉织长袜、衬衣、睡衣、皮鞋、白铁和生铁器皿及冶金产品、自行车、摩托车、某些体育用品、纸张、木质家具、尼维牌牙膏和儿童爽身粉。

公众从决议中还得知，部长会议认为，提价所获得的金额“只略高于降价所减少的金额”。它是这样算账的：在保持目前购买结构的情况下，一年中居民因零售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支出将为157亿兹罗提。与此同时，居民因零售价格降低而减少的支出为

109亿兹罗提，两者的差额为48亿兹罗提。这个差额，将由于对收入最低家庭进行家庭补贴〔约9.2亿兹罗提〕，由于降低电视收费〔由40兹罗提减为30兹罗提，将少收5亿多兹罗提〕。由于分期付款商品削价而减少每月的付款额〔8亿兹罗提〕和提高猪和牛奶的收购价格〔15亿兹罗提〕而“大为减少”。

正象拉科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一般说来，这种计算得失的方法不为消费者所称道。靠自己双手劳动谋生的人，是根据自己家庭条件和收支情况来比较价格的涨落的，而不是根据整个社会或社会中哪一部分人的生活条件来比较价格的涨落的。对于许许多多的波兰家庭来说，12月13日的价格变动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① 提高猪和牛奶的收购价格，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喜讯，但这对工人和城市居民来讲，没有丝毫的意义。因而那在部长会议的公报中打了折扣的15亿兹罗提便立即失去了宣传作用。任何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降价的商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购买的商品或不常购买的东西，如高档耐用消费品；而提价的商品中，许多东西是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肉、鱼、面粉、牛奶、煤、木材、纸张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提价，势必大大增加一般人〔尤其是城市居

① 《十二月转折》，第一章第一节“暴风雨之前”。

民〕的开支，它绝不是几件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幅度不大的降价所能弥补的。

抗议涨价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

12月14日，即部长会议公报发布的第二天，波兰西部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造船厂发动机车间的工人，在上午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聚集到造船厂经理办公楼前。他们公开表示对涨价决定不满。其他车间的工人也加入了集会。随后，一些集会的工人组织成一支几百人的游行队伍，向市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省委大楼方向前进。厂内罢工变成了街头示威。在省委大楼前，一位省委书记试图劝说示威人群离去，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示威者控制了一部“邮电”广播车，在车上的广播里播送要求政府撤销涨价决定的呼吁书。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区街道上，一些人到“列宁”造船厂和工业大学门前，试图说服那里的工人和学生一起参加，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随后示威群众来到广播大楼，要求播放他们的呼吁书。由于技术性原因，这一要求也未能实现。这时游行的人数已增加到近万人，他们再次来到省委大楼前面，沿途冲开了警察的警戒线。按照正式的说法，由于人群中有人两次试图烧毁省委大楼和《海岸之声报》编辑部，阻塞城市交通运输，向公共建筑物和商品投掷

石块，用装有汽油的瓶子武装自己，这一切使警察局“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恢复秩序。警察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内务部军队进驻省委大楼。

12月15日，星期二，从清早起格但斯克造船厂和许多其他工厂开始进行占领性罢工，有组织的工人一群群地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在逐渐有些混乱的秩序下，一些流氓和坏分子也混入人群，并且使游行活动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和破坏性。有人开始烧汽车，后来他们又冲击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和民警局大楼。当警察部队击退冲击的人群后，将近两万人集中在邻近的省委大楼和中央车站附近。一些人用石块和汽油瓶袭击省委大楼，很快，这栋大楼就着火了。他们还焚烧了十几辆警车、消防车和邮车，焚烧了中央车站及其附近的几座建筑物。人群捣毁并抢劫了十几家商店。为了维护秩序，政府增派了警察和驻军，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这一天有几百人受伤，数人死亡。紧张局势加剧。

当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乔韦克在地方节目中发表电视讲话。他批评说，许多工厂停了工，并以最后通谍形式提出了各种提案。“我想坦率地讲：正象不能撤回已作出的决定一样，大多数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他指责中断工作的人为街

头闹事创造了条件。同一天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下令实行宵禁，禁止任何集会。这一天夜里召开了省委执委会议。在沿海地区的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考虑到翌日发生街头示威的可能及其一切后果，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克利什科命令封锁“列宁”造船厂。与此同时，政府向这一地区增派了部队。在发给所有治安部队的命令中写道：

“……命令警察机关和保安部门，以及其他与这些部门配合的机构。采取一切法律许可的强制手段，包括使用武器，反对那些以暴力威胁居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抢劫或破坏社会财产或公用设施的人……”。

12月16日。星期三。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的造船厂，暴发了占领性罢工。其他许多工厂举行了短时间的声援罢工。在罢工的工厂里，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一系列要求。早晨8时左右，一些用铁棍木棒武装起来的罢工工人，试图通过2号门到城里去，结果遇上了封锁造船厂的军队，冲突中死了两个人。

这一天在整个沿海地区其他城市的工厂和街区，形势也在恶化。傍晚在斯乌普斯克和埃尔布隆格也发生了街头动乱。斯乌普斯克地区的几百名学生袭击了市委大楼，并企图烧毁市人民代表会议主

席团大楼。示威者被警察以及党团积极分子驱散。在埃尔布隆格市，人们袭击了警察的广播车，捣毁了几十家商店。同样，这里的示威者也被军警驱散。在这两个地方，治安部队都没有动用武器。

星期三傍晚，科乔韦克再次在格但斯克电视台发表讲话，又一次拒绝了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并强烈呼吁造船工人们恢复工作。

沿海地区发生的事情，全国公众是在星期四〔17日〕早上才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一天《人民论坛报》在头版发表了波兰通讯社关于格但斯克骚乱的公报。公报内容如下：

“12月14日和15日在格但斯克发生了严重的街头骚乱。那些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冒险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在格但斯克造船厂职工中出现的局势，破坏和焚烧几座公共建筑物，并抢劫了几十家商店。面对治安人员的干预，发生了枪杀人的事，还有许多重伤者目前住在医院。由于流氓挑起的冲突，有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当局采取必要的坚决步骤，击溃了冒险分子，恢复了市内秩序。

与此同时，当局警告，它将坚决打击一切破坏公共秩序和反对国家的行动。”

从公报下边刊登的编辑部评论中，公众了解

到政府动用了军队，格但斯克实行了宵禁。评论把冒险分子、教唆分子与工人阶级明确分开。它写道："为了从格但斯克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应当回答一个问题。这些骚乱是怎样发生的？首先，造船厂的部分职工是否真有理由丢下工作走上街头？"回答是很明确的。《人民论坛报》认为，没有真正的理由。作为论据，该报还引用了造船厂工人平均工资的数字。他们比一般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22.5%，当然，造船厂也有与改进劳动组织、实现企业现代化等有关的困难问题，它可能引起人们的气愤，但这些问题应当在平心静气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中研究解决。可惜的是，"部分职工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呼吁，丢下工作走上街头。……其实，所有那些与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以及与某一具体企业形势有关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党、工会和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解释和解决。船厂职工具有利用这些可能性的一切条件。格但斯克事件证明，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只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悲惨的后果。"报纸呼吁为责任感的胜利，为关心共同利益的胜利，为停止一切无政府主义行为的胜利而斗争，并警告："一定要严惩杀人放火和抢劫的肇事者。"《人民论坛报》的读者从评论中获悉，格但斯克的大多数工厂

星期三均开始正常工作。

然而，这是不真实的报道。它没有说明罢工的真正原因，没有说明罢工和示威仍在继续扩大的真正现实。

12月17日，星期四，一周中最危急和最悲惨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工厂工人的罢工和街头闹事。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开始了总罢工。接着，总罢工涉及到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在什切青和格丹尼亚的街上发生了流血事件。

格丹尼亚一些工厂的罢工始于12月15日。那天上午“巴黎公社”造船厂的几百名造船工人向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办公楼进发，示威者在同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马利安斯基的谈话中要求他承认罢工委员会，马利安斯基表示同意。这样以来，罢工委员会的存在就成为合法的了。12月16日“巴黎公社”造船厂继续罢工，其他工厂如远洋捕鱼公司和港务局也在继续罢工。这是声援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的罢工。应当指出，这两天在格丹尼亚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或抢劫之类的事，那里秩序井然。12月16日深夜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当局继续实行对抗的方针。还在16日下午，克利什科就“巴黎公社”造船厂问题作了两项决定：第一、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第二、封锁通

向造船厂的一切路口。根据《海岸之声报》12月28日的报道，第一个决定于16日晚8时由造船工业联合公司经理部门用电话通知了所有造船厂。科乔韦克当晚上通过电视呼吁造船工人回厂工作时，他不知道在此之前已作出了封锁造船厂的决定。于是只好深夜派人到工人住宅区去撤销科乔韦克的呼吁。

17日早晨5点50分，一些工人朝造船厂方向走去。在格丹尼亚造船厂车站，火车开始从格但斯克和维伊海罗克两个方向开来。车上乘坐着上早班的工人，扩音器里不断呼吁他们回家去，但没有奏效，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船厂的入口处由军队封锁着，人群朝那里拥去，要他们停止前进的命令无效，于是枪声响了。先是警告性的，向空中放枪，后来子弹射向了人流……。一小时后，在格丹尼亚客运车站，军队和示威者发生了新的冲突。9时许，在格丹尼亚造船厂车站附近的大约有5000人的人群向军警警戒线冲击。骚乱一直持续到下午。在格丹尼亚的这一天街头动乱中，有18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同一天，什切青成了流血冲突的另一主要地区。在“瓦尔斯基”造船厂的船体车间，一清早就举行了有1500多人参加的抗议集会。约有1000人离开

造船厂涌向市区。与此同时在"格雷芬"修船厂也举行了集会。这个厂有约700人走上市区。街上一些居民，主要是青年人，也加入了工人的游行队伍。近2000人聚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大楼前。警察部队驱散了游行队伍，随后不久，被驱散的人群又在市中心集结了近10000人。两辆警车被烧毁。两小时后，估计有15000人聚集到省委大楼前，大楼由军队保护着。人们往大楼窗口里扔汽油瓶，大楼着火了。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运兵车也被烧毁。但在省委大楼前的军警部队始终没有使用武器。

从各方面的描述看，什切青示威者的咄咄逼人的活动越来越猛烈。他们袭击镇暴的警察和士兵，烧毁汽车，砸抢几十家商店，还放火烧了报纸编辑部和省工会大楼。他们袭击了省警察局大楼，并曾两次试图占领监狱，致使监督的卫兵开了枪。什切青街头冲突持续到深夜。这一天这一地区死十几人，伤几百人，当局宣布了宵禁。

在激烈的气氛和混乱的冲突中，人们似乎无法区分哪些是工人们的抗议，哪些是破坏分子的行动；任何报纸都没有刊登当时"克尔斯基"造船厂和修船厂罢工委员会开始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中有：

——让那个从来没有捍卫过劳动群众的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台；

——建立隶属于工人阶级的独立工会；

——释放在事件中被拘留的工人，不在法律上和工作上给他们任何处分；

——惩办那些屠杀工人（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工人）的罪人，绝对禁止枪杀手无寸铁的劳动群众；

——惩办那些对导致国家目前的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人，不管他们在党和政府里担任什么职务；

——停止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把工人称作流氓，并惩办那些称工人为流氓的人；

……。

然而，这些要求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没有产生丝毫反响。

17日晚，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西伦凯维兹发表电视讲话，他呼吁人们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理智。他说话时声调十分激动，反映出当时政治领导人的情绪。

他一开头就说：人民政权和国家的代表“不管有什么悲痛”，都必须从国家的范畴考虑问题，都必须以整个国家和整个人民的利益为行动的指南。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中包括每一个波兰家庭的最根本的利益，今天“感情用事”的人迟早也会相信这个道理。

在提到抢劫、破坏和焚烧建筑物的行为时，西伦凯维丝说："结果发生了不幸的冲突，治安力量被迫使用武力，出现了人员伤亡——警察和市民死十几人，伤几百人"。尽管他把事件局限在格但斯克，但他在讲话中有一句话暗示听众，事态正在扩大。

谁应当对发生的事情负责呢？他认为："这就是那些缺乏理智和责任感的人们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后果。他们丢下工作，走上街头，给那些社会败类、冒险分子和敌人以破坏、抢劫和杀人的机会。"他说工人不应这样做，因为"存在着一切条件，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在自己的工作厂里，在社会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的会议上分析和讨论工人阶级关心的许多问题。"

他针对工人们的要求说："我想指出，国家从价格变动中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也不会以此增加国家的收入。"他没有正面回答是否撤销提价决定及其他问题，而是说："我们将继续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要在安定和正常生活的气氛中进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国家、人民生活和每个公民的根本问题已经摆在日程之上。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它对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的赶超，它的经济潜力的扩展，都取决于为了达到全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目的

而奋斗的一切力量的团结。社会纪律和人民在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和敌对势力企图破坏这种一致和纪律，破坏这种共同的努力，而那些不自觉地或在苦恼中响应他们号召的人，则起了助桀为虐的作用。”

可以想象，波兰政府总理的这番讲话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工人们这时已不接受任何说教、劝告和威胁。

12月18日，星期五，由于总罢工，什切青的生活处于瘫痪状态。在这里和在埃尔布隆格还发生了治安部队同人群的激烈冲突。这一天参加街头闹事的人数并不多，最多只有几百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袭击警察，多次试图放火焚烧埃尔布隆格市委大楼和地区诊疗所及电话局。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砸抢了几十家商店，治安部队开了枪，许多人受伤，部分人伤势很重，结果两人死亡。这是一周来悲惨事件中的最后一批死亡者。

沿海事件的结果是极其可怕的。根据官方的公报，一周来共死亡45人，伤1165人，全部或部分地烧毁、破坏19座公共建筑物，其中包括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两地的省委大楼。毁坏民用汽车47辆，烧毁警察和军人的车辆装备好几十辆。焚烧和毁坏220家商店。在格但斯克地区由于破坏造成的损失达1.05

亿兹罗提，在什切青地区这个数字达3亿兹罗提。

从12月14日到20日，治安机关在沿海地区共拘留3989人。那些被怀疑有抢劫、主动攻击、纵火行为和非法拥有装器的人被逮捕。在被拘留的人中有1990名是25岁以上的年轻人。被拘留的人中有2843人到1971年1月18日以前逐渐释放。

然而，在闹事和枪击事件结束之后，全国范围内政治形势仍继续紧张。19日，星期六，7个省的近100家工厂罢工。在全国各地，散发靠拢被当统一工人党和呼吁组织集会游行的口号、传单和标语的活动越来越多。

危机性质在变化。经济危机通过社会危机转变成政治危机。所有人都感觉到，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必须立即"换马"。

星期六上午，政治局委员勃赫马赛克哥穆尔卡。在谈话中他对哥穆尔卡说，他认为哥穆尔卡应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哥穆尔卡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上，中央委员、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什拉赫卉发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极力推荐盖莱克为新的第一书记候选人并把盖莱克调到华沙。

星期六下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哥穆尔卡"因病"未参加会议。医生通知政治局委员们说，他的患者必须住院治疗。政治局讨论了国内的政治

局势以及由于第一书记生病在党内出现的情况，决定由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职务。

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4点，举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届七中全会。政治局委员科乔韦克就沿海地区事件的经过作了报告。他认为，国内动乱持续不断不可避免地会使党对事态的发展失去控制。如果发展到那一步，国家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更换党的领导的问题已提上日程，只有这样才能打通摆脱危机的道路。他批评说，在不幸的一周的最后几天里，党的领袖越来越悲观失望，甚至指责工人阶级的行动会葬送波兰。这是可悲的，然而却又是真实的。

科乔韦克发言后，全会接受了哥穆尔卡因“病重”而辞去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请求，并推选盖莱克接替这一职务。同时，全会撤销了雅什楚克、克利什科和斯柴莱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了马·斯彼哈尔斯基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新选进政治局的有巴比乌赫、雅罗谢维奇、莫查尔、奥尔夫斯基和希德拉克；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雅鲁泽尔斯基、雅希翁斯基和肯帕；新当选的中央书记有：巴比乌赫、巴尔齐科夫斯基、科乔韦克。

在哥穆尔卡辞去了党的第一书记3天之后，12月

23日，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和几位副总理及部长也辞去了他们的职务。雅罗谢维奇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1971年1月15日，洛加-索文斯基辞去了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大规模的高层人事变动仅仅是妥协态度的一部分。新政府撤销了原先的涨价决定，并宣布，“除了有季节性价格变化的食品外，至少在两年内，冻结其他所有食品的价格”。新总理向议会提出了政府工作的方针，他认为，第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改善最低工资收入者、多子女家庭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物质状况。为此目的，政府将拨款70亿兹罗提。12月20日和26日在100家最大的工厂里举行了协商性会晤，讨论有关分配70亿兹罗提的各种建议，决定这笔钱用于补贴因12月13日涨价而受损失的工资收入最低的家庭。几天后，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关于对某些工种的职工实行工资补贴，关于提高家庭补贴和退休金、养老金”的决议。最低工资从850兹罗提提高到1000兹罗提。次年1月3日，波兰政府决定拨出86亿兹罗提用于改善最低收入和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条件，提高最低退休金和养老金的数额，同时宣布把基本食品的价格冻结两年，并开始大规模地调整工资。1971年至1973年期间给640万职工调整了工资。1972年取消了工资

税。

在党和政府作出各种妥协姿态之后，国家缓慢地恢复了正常生活。12月22日，什切青“瓦尔斯基”造船厂的最后一部分工人停止了占领性罢工。什切青港口的职工、“奥得拉”服装厂的工人、什切青“格利劳”修船厂的职工、建筑公司职工以及其他一些工人都复工了。经过一段时间，稳定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然而，罢工斗争和流血冲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事情的了结。任何人都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二月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怎样避免将来再发生这种悲剧性的事件？意味深长的是，党和政府、社会舆论、知识分子中持批评态度的人，对这些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和说明。从这里所包含的深刻分歧中，可以透视出新的一轮发展的轮廓。

1971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八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特别委员会起草的题为《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结论》的文件。

文件认为，工人阶级对党和政府的基本决定的抗议是事件的根源，食品提价是事件的导火线。这次抗议采取了如此激烈的形式，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例如，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严

重忽视社会福利政策，实际工资一直不变，供应困难，生活费用上涨等等。

文件指出，在危机期间，假如哥穆尔卡及其亲密的同事不赞同“工人行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的论断，那么不排除事件的进程会更缓和一些。“在危急的日子里，一切论断都是由哥穆尔卡同志提出的，没经过集体讨论，也不受集体监督。这些论断的思路是：开始，只是在非社会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活动中寻找挑起工人行动的势力；尔后，随着罢工和闹事规模的扩大，给这些行动定了反革命的性质。对波兰人的命运在历史哲学上的悲观看法是这种态度的表现。根据这个看法，我国的统治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国家引向灭亡。贵族的无政府主义导致第一共和国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盲目反苏造成第二共和国的失败，现在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将会搞垮人民波兰”。

文件说，这种对波兰工人阶级的极端悲观主义的论断打开了通向镇压的道路。“这个论断实际上论证了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是控制局势的唯一手段，同时还规定了宣传路线，试图证明关于对物质状况不满的论点是同真实情况和社会感觉格格不入的。强调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武器，是这种立场的直接的主要的表现。”文件认为，使用武器，这对

于参与这一行动的波兰人民军战士和执勤民警来说则是一场极大的悲剧。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他们是第二次被用来镇压工人的抗议。

文件指出，十二月事件证明，党同劳动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同工人阶级的联系一旦遭到破坏，就可能“在我国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党应当从这场事件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将来必须致力于防止同社会的冲突，必须“开动可靠的能预告冲突形势的体系，并创造出在我国社会机构和组织范围内消除冲突形势的条件。”

文件认为，在沿海事件爆发前，党的总路线还是正确的，通过党而组织起来的人民在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努力并未白费。但是，与此同时，人民在发展经济方面所作的努力与一般劳动者在获得这一努力的成果方面感到的不足之间形成了日益增大的差距。工人阶级和某些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增长缓慢的物质后果，强烈地感觉到在一些行业中实际工资水平停滞和国家逐步限制社会福利的物质后果。同时，看不见光明的前途，缺少完整的富有逻辑性的和预见具体成果的发展主张，也对社会意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人们更加确信，国家的发展慢于可能有的和应该有的发展，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缺少一种对需要的感觉，也不理解现代发展的规律。

在这次会议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

他提醒大家，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的行动开始时是平静的，但是领导人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谈话，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消除紧张…沿海地区事件的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盖莱克认为，企图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导致流血，造成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并为反动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开辟活动场所。

他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对于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不满，对于领导党和国家事务的方法的不满，一直在增长和扩大。“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对党政领导的信任危机。因此十二月危机首先可以称之为信任危机”。

盖莱克列举了几条产生危机的原因：生产资料的增长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之间，社会所必要的比例关系越来越遭到破坏，1965年至1970年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小；忽视了住宅的需要，大砍保健方面的投资，等等。

投资政策是不正确的。首先是耗费资金多而见效慢的项目与便宜而见效快的项目之间比例失调。此外，投资项目也完成得太慢。虽然“多次批评，但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效果”。领导和管理经济的

方法对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产生了不利影响。60年代曾在这方面提出过不少设想，但“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只作了些零星研究，一些单个的设想与改革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协调的体系。结果在经营方法上进行的改革没有什么效果，而其中有一些反而引起了混乱。”

另外，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长远的设想，这一点对于近年来整个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影响。经济政策是临时制定的，最近期间更往往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缺乏长期纲领也使得社会感到看不见前景，并相信我们是落后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波兰。”

新任第一书记这样谈到党本身及领导人方面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的党在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悲剧和危机。今天我们又在批评坏的领导方法及其执行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清算，首先考虑到未来……我们的党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类经过考验的保证首先是：遵守党章规定的原则和准则，道义和政治气氛，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自由，敢于进行批评，正确选择干部，干部的思想政治品质、业务水平以及道德和心灵美。”

在这一次中央全会上，所有与会者都以比以往更加坦率、直言不讳的方式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记录其中一些人的发言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反映了在危机和震荡之后党的领导机构内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观点分歧，而且反映了许多人曾经有过的思想深度及其长久价值。值得庆幸的是，拉科夫斯基在《十二月转折》一书中给人们留下了可以信赖的记载。

乌卡谢维奇说，在党的和职工的会议上，许多问题和答案涉及到的主要是这件事："除了公开的声明，怎样才能保障我们与之周旋的局势过一段时间后不再重复出现呢？"讨论中提出了各种要求，包括"从制度上"保证在党的领导班子中进行定期的变动和制定新的选举法等等。他认为，根本问题"首先是党的领导班子的实践，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央委员会不能只是举手通过政治局早已作出的决定的机关。它必须是一个机体，在这个机体里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和建议，制订出对目前和未来，对党的政策具有预见性的原则决策。在中央委员会中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气氛，即不能把每一个批评意见都当成列人所谓的"集团"和"派别"的理由。乌卡谢维奇

要求党的领导成员及第一书记同劳动人民、同党的积极分子和党员保持“经常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要事先彩排，不要由我们亲自审查问题和答案，也不要搞我们所特有的排场……”。

莫查尔认为，目前人们普遍提出下列问题：“为了使具有威胁性的和令人痛苦的一切类似的事实不再发生，党打算怎么办？党准备建立什么样的报警装置，以便能及时预报面临的危险？党有无能力建立一道壁垒，以便使今后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首先他表示，在人民波兰历史上这个最深刻的震动之后，党应当对“苦涩的经验”进行彻底的和有计划的研究。不能只在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应该在党和国家的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这种保证，即首先要建立这样一种条件，使领导永远不会丢掉列宁主义的方向盘……”

依照肯帕的意见，“首先，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竭尽全力，使全党自上而下始终不渝地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把每个党组织及其执行机关均置于经常的、有权威的监督和批评之下”。这位华沙党组织第一书记，坚决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制度的彻底民主化”，他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提出的

要求。他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1956年的第二阶段论者，其余的则是1968年的道德家"。

佩卡提出的论点是，"必须改变我们病态的政权机制。在现有的条件下和'上级'永远有理的干部制度中，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特殊病症的态度，即害怕做决定，也就是害怕担风险，害怕出现为党的前领导所谴责的所不能容忍的不同观点。要捍卫这些观点需要有勇气"。说得委婉一些，这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陈旧过时的党的工作模式。

比亚乌科夫斯基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这个从根本上说来是好的制度，经过一段时期积极有效的作用之后会变得徒具形式，甚至僵化？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当出现紧张形势时，它会这么没有用处？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心问题是批评。但是如果对每一步都事先由代表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党委会里商量好，而党委会对这种做法又毫不忌讳，并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那么又该由谁来批评谁呢？现在非常必要的是在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要"有一种坦率、自由表达意见以及能绝对自由地开展党内批评的空气，讨论时的发言不应由上级加以规定"。执行干部政策时应该不致使人产生这

样的看法，即“党证是加速获得提拔的手段”。

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米尔恰雷克一开始发言就说，人民和党期望全会做出决定，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令人痛心的可悲的事件。“能否做到这样的保证呢？”她回答说，“只要我们能觉察到并揭露那些使政治生活发生偏差、在领导党的工作中产生独断专行的环节”，我相信这个保证是能做到的。她的下一个问题是：“一些过去受到信任和受到尊重的人却不得不带着个人的悲剧离开了党。怎样才能保证使党内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呢？她认为，对领导人的权威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他们的爱戴和尊敬要有个界限，要防止歌功颂德和称赞他永远正确，因为那种颂扬必然要坏事，会造成社会危害。”

科瓦尔契克认为，为了避免今后发生冲突，“对于工人参加管理工厂的作用和形式应该进行彻底的审查”。工人参加管理应该加强，因为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不断提高，它同工人阶级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不相适应。他注意到，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和工人委员会的作用经常限于形式上接受上面已确定的指示。

中央委员、“和平钢厂”的钳工谢曼诺夫斯基补充了科瓦尔契克的论点，他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把十几个象我这样“拿铁

锤的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是否象对待最高机构的成员那样来和我们商量过问题呢？是否一目了然地，尤为重要的是真实地向我们介绍过情况呢？……”

中央候补委员、弗罗茨瓦夫工业大学校长波伦布斯基在探讨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时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具有一定美德和素质的人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确运转，然而毫无缺点的人是没有的；（二）如果与领导人一道出主意作决定的人能够正确地工作，就可能使这些缺点不至于表现出来”。为此他建议改进工作要从“正确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入手。应该为中央委员们创造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也有义务就日常生活中一些问题向政治局报告情况和提出意见，应该保证所有出席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能真正参加讨论，应该改进党内通报制度，加强并扩大党内批评。“要使批评起到自己的作用，党内就不应该有不能批评的人。”

与“波兰的十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十二月危机”之后，波兰人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抱有疑虑和不信任态度，正如拉科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感受到的那样，它和1956年10月之后最初几周所具有的那种兴高采烈大不一样。在党的、工会

的和其他组织的成百上千次会议上，在报刊上，在给编辑部的信件以及私下谈话中，人们一再提到和分析十二月事件的过程，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首先是对未来的保障问题。人民想知道，党是否将实行一种能使不久前大家经历过的形势不再重演的政策。

在十二月危机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这些讨论主要是对导致悲剧的政策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并不只是因为涨价，人们才走上街头，而首先是抗议对社会生活的歪曲。长时间以来，许多人已经感到在党的领导层同广大党员和社会之间出现了鸿沟，感到几年来不断加剧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如果党的领导能从波兹南的历史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那末这次事件本来是可以防止的。

人们广泛地认为，几年来波兰出现的紧张和国内的气氛，已经把社会弄得疲惫不堪了。本应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社会，却用标语口号和连篇空话来充填社会的饥肠。对记者的批评尤其多。人们呼吁他们认真对待那些能够揭示沿海地区事件真相的问题。报道不完整的消息，不敢多讲真实情况，这不仅不利于恢复人民的信任，而且会引起社会的淡漠、消沉和厌恶。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是赞成社会主

义的。当然，是赞成没有“病瘤”的社会主义。人们愿意同当局对话，希望当局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当局能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负责任的公民那样对待他们。不仅要讨论改善经济形势的方法，而且还要讨论党、政府、部长、厂长行使权力的方法。对这些机关所作的决定，应该规定由社会进行监督。个人所担任的职务不应是终身的。只是到了工人走上街头的时候，中央机关才作出人事变动，这就说明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讨论中对政权问题谈得最多。人们对于部政策的弱点、党委会的官僚主义化和缺少自下而上的批评现象进行了尖锐抨击。人们提问是谁决定进一步“勒紧裤带”的？为什么哥穆尔卡忽视社会情绪？诺瓦胡塔钢厂的一位工人说：“……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再有哥穆尔卡曾经享有的那种信任了。因此，社会的先望要求领导必须有更多的理智和谨慎、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岌岌可危的兄弟间的相互残杀及其难以挽回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已经赢得了信任，但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迄今的经济措施对于需要来说只是沧海中的一粟。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

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要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人们说，如果党想实现对社会各界的保证，就应该真正尽快地不仅同自己的党员，而且同全体波兰人民开始诚挚坦率的谈话。“对最高审判者——波兰人民，必须讲真话，只能讲真话，全部讲真话！”人民很了解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局势，不需要别人来教训。在讨论中，许多发言和提问都涉及到改进领导及管理体制的过程问题。人们问，“已经决定了的某些改革为什么半途而废？”“修正主义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为什么许多早该解决的事情我们抓不住，只是修修补补呢？”

讨论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人参加工厂的共同管理及其作用问题。大家说，“工人自治”是个空架子，事实证明，它同工厂委员会一起只能给行政部门和厂领导装点面子。工资制度也需要改进。行政部门的庞大和许多机构的重迭也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从各种会上的许多发言看，从写给各种报刊编辑部的来信看，对于领导人，对于党的各级活动家和政论家所作的保证，即下决心摆脱十二月危机，社会上某些阶层和群众是不太相信的。十二月事件后

的最初几个月里，许多人常常采取以厌世哲学为特点的态度。一家华沙报纸的读者在给编辑部的信中问道："我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会不再谈论革新的需要呢？"另一个读者写道："1956年10月以后，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现在肯定不能和那时同日而语了。恐惧、担忧、犹豫甚至厌世，是当前形势的特点。我们所遇到的倒霉事太多了，太频繁了。为了不向它屈服，确实需要很大的忍耐力。为了能够坚持下去，就需要抱有希望。我们努力靠这种希望生活下去。1956年，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但它始则缓慢地、随后就闪电般地开始熄灭了。我们大家知道，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坏的事情即将开始。大家都知道了，只有领导还是两眼漆黑，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是怎么搞的呢？是制度起的作用不好，还是人不好呢？如果我们承认是制度不好，是它没有受住考验，——那么一切就此完结！但是，我们排除了这种想法。……那末，为什么人们要怀疑呢？这里只留下了一种解释，即人不好。是所有的人都不好吗？可能每一个人都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主要的过错却应由那些指导体制运转的人来承担。"

在1971年初那段时间里，各种声音相当活跃，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畅行无阻，各种人都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了独立的评判。不过，要找例外的情况也是

有的。那些被社会和公众指责为参与镇压工人示威，对以武力对待同胞的各种人——下台了的领导、对开枪负有直接责任的干部，对设置警戒线并且与游行队伍发生流血冲突的警察和军人——这时完全失去了发言机会。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很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透露了自己的心情。

这里是一个军人的想法：

后备役上校翁索夫斯基硕士，当时曾任边防军旅长，他在题为《1970年格但斯克事件中战士的悲剧》一信中写道：

"……我是1970年12月悲惨事件的参与者（不仅是消极的观察员）。我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有必要谈一谈这些问题。特别在当前革新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询问这些事。因此，不仅要谈谈原因、过程，而且要谈谈那些起过或大或小积极作用（假如在这场民族悲剧中还可以讲积极作用的话）的人们。但是，我认为，要谈就必须有一个条件，即真相必须完整，任何细节也不必隐讳。这并不是要'揭破已愈合了的伤口'，而是要把真相交给社会，交给往往只了解被歪曲了的事实的社会。

现在我想以战士——'治安力量'的代表的观点，从战士的经历这个角度，来看看悲剧事件的整

个问题。我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思索，都是以‘我们工人’的立场为出发点的。但我想从‘另一方面’，从治安机关方面来看看问题。我认为除了一些思索之外，任何一个人迄今也未具体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在镇压格但斯克地区十二月悲剧事件时，我认为也应该谈谈波兰人民军和边防军战士、值勤民警和公安部队所经历的悲剧。他们之中也有人牺牲。在事件过程中，当开枪的命令下达的时候，以及在事件过后，当社会上的全部怨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特别是集中在格但斯克和格丹尼亚卫戍区战士和军官身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悲剧。当各种人物在火车上或商店里带着挑衅的口吻议论着不光彩的绰号，什么刽子手啊，杀人犯啊，当军官的他不得不把这类脏言秽语装进耳朵里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写过和谈过民警、公安部队战士和军官的自我感觉，以及他们的情绪和怅惘。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期间干部在教育战士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要解释历次冲突的原因，这是更为困难的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正式的评价，即使有了，也不彻底，而战士是在每天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来思考悲剧的一切时刻和事件的。这种情况也包括干部家属和文职人员。

这个时期军队同社会的联系遭到严重的削弱。

这种联系本来是很密切的，是通过战士向社会的献礼活动和战士为社会进行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在悲剧事件之后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重建军队的威信，才能密切军队同社会的联系。在悲剧事件时期，我那个旅有一位战士，他保护港口设施，忠于职守。而他的亲兄弟，格丹尼亚《巴黎公社》造船厂的工人却悲惨地牺牲在‘上班途中’。此时此刻这位战士在想什么呢？在经历着怎样一种生活呢？同他的家庭很难谈得拢。为了缩小、哪怕是部分地缩小他们的家庭悲剧，不得不立即让他复员……

同许许多多军官一样，1970年12月我曾经思考过，今天我仍然在思考，可能思考得更深一些，更广一些。这次事件对整个民族，对许多家庭是一场悲剧，对‘另一方’——也就是对军队和治安力量也同样是一场悲剧。当时他们执行了建立在对事件错误判断基础上的命令，被迫使用了武力，动用了武器。”①

布鲁斯教授的看法在各种观点中可能是最透彻和鞭辟入里的。他在1971年为意大利共产党《再生》杂志撰写的题为《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一文里，深入地探讨了波兰十二月危机的性质、原因和教训。

① 见《十二月转折》，第一章第一节“暴风雨之前”。

他说，工人阶级的示威运动、流血悲剧及各种严重现象，都“证明了折磨着波兰的社会对立矛盾的深度和广度。它已经不再是抽象意义上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存在矛盾的理论问题，而是这种矛盾的具体的、可以触摸得到的结构问题，即提供不可避免的若干一般结论的那种结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马克思主义方法可以有效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分析，那么从波兰事件中引出来的结论，就决不能当作仅仅是和个人崇拜或一时过错有关的东西把它打发掉。它证明，即使怀着最大的善意，仅仅是谴责和弹劾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和歪曲’是不够的；或者即使是进行了变革，如果这些变革只是表面的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或者不能为连续的调整过程创造条件，那也是不够的。”哥穆尔卡等人都是老革命，在斯大林年代受过迫害，1956年10月正是以“不许重演波兹南悲剧”的口号象凯旋将军一样回到了政治舞台；而现在他们的不光彩引退，又是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而且是以众多牺牲者为代价实现的，这简直象一出古典悲剧。可以想象，哥穆尔卡本人是曾经力图避免重蹈旧辙的，但车轮还是倒转了。因此，这只能说明，“在现在的波兰统治体制（不能认为它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似乎有实质上的不同）中，一

定妨碍解决社会和经济矛盾的种种因素。”

布鲁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困难的基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生产资料国有化了，国家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控制着整个经济，政治权力的体系和统治方法成了生产关系网络的不可分的并且可能是中心的特征。一旦党和国家作出错误的决策，破坏力是比在任何制度下都大得无可比拟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70年12月恰恰是圣诞节前决定提高食品价格时，它所能够利用的情报的范围有限和歪曲的程度实在惊人。从十二月事件后所发表的公告来判断，党的领导不仅对经济形势缺乏了解，而且对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以及党和政府的上层中的当时的政治见解也是不清楚的。暴露了对决策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没有跟上现实的形势。从十二月事件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很清楚，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政府和工会的干部，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对于正在准备中的（涨价）行动是采取严格批判的态度的——一部分人是戏剧性地表态。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证明为了收回决策进行过任何尝试，也没有证据证明进行过任何有力的反对。”

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过去15年波兰实行经

济改革的尝试总是流产的全部历史，可以作为现有政治体制对经济过程发生破坏作用的一个实例。波兰是最早制定出经济改革方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1956年10月事件之后就迈开了步子。然而，最高政治当局虽然承认改革方案，但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做。其原因主要是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些限制。使经济体制的变化同工人自治一起成长的尝试受到了特别的冷遇。工人委员会变为差不多纯粹是一种形式，彻底丧失了它作为经济管理中工人的真正代表机构的特征。这些看上去直接或间接地与十二月事件之前的经济状况和原因有联系的问题，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它们清楚地表明错误的政治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阻碍的影响力。"

布鲁斯批评说，常常有人企图否认在最近的种种事件发展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简单地把工人的要求说成明显是"纯经济性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推论。因为，"第一，即使工人的要求是纯经济性的，产生引起示威运动的那种局面的，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理论依然是没有争论余地的。第二、工人的要求，虽然他们没有采取充分的、一般的表现形式，但直接间接都是和重要的政治问题有关的（我认为，这是

由于工人和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缺乏合作；尽管另一方面，在现实形势当中，这个事实是否没有带来有利的结果，是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作为要求首先提出的是：工业内部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党的组织在内，改变某些组织的选举的性质，工会的真正自主性和对工会的新的认识，公布没有歪曲的情报，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斗争，取消随地位而来的特权（非公开组织的那种类型），等等。在经济领域中，有相当多的要求是提高企业的自主性。这些要求，有两层重要意义：作为更广泛更有效的利用生产能力的基础，以及作为真正（不是虚假的）工人自治的基础。如果仔细地探讨这些要求，人们就不能回避它的巨大政治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正是波兰工人阶级——在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在关于提出它的要求的程度和方法所表现出的卓越的现实感上——证明了它自己的成熟性。”

波兰几次危机的一个教训是，人们总是一开始就把全部希望寄托于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导人，而最终这些人或这一个人总让人们失望。针对这一现象，布鲁斯说：“为了制定出适当的纲领，当然必须考虑到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的性格，他们对事件的原因理解到什么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实行必要的

改革有多大程度的准备和决心。但是，不要抱有幻想。”要把改革付诸实行，与其说用适合现在的政治形势的方式来行动，不如去反对那些习惯于用压制方式对待改革的保守势力。因此，采取批判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人们将会继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不可能对以他们的名义所做出的决策发挥影响。”

布鲁斯最后说，从十二月危机中所引出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是：“即使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也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变动的社会过程中进行的。并且，其结果与其说取决于个人的善意，不如说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适当平衡。”他认为，波兰的社会压力——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施加的压力——的重要性，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以往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现象，看作是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清除的可悲现象；并且已经习惯于认为，如果不可能消除原因，至少也要消除后果，把它们尽可能深深地埋葬起来。“现在是结束基本上仅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智慧缺乏信任的那种气量狭窄的态度的时候了。”①

到这一次危机结束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

① 见1971年第6期《再生》杂志。

信心（布鲁斯甚至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希望无论如何未来不会再重演已经两次震撼人民波兰的悲剧，希望新的领导人真正吸取以往历次危机的教训，带领波兰走出危机的循环。千百万波兰人在诉说着同一个心声，千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新的发展。在经历了危机和批判之后，波兰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第七章

“盖莱克主义”

“如果必要的话，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会是公平合理的。”

——一位普通工人的话

与1956年的哥穆尔卡一样，1970年的盖莱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举世的瞩目。70年代波兰的发展和挫折，波兰人的命运，他们的欢乐和忧伤，都与这位第一书记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爱德华·盖莱克，1913年1月6日生于本金县波隆布卡一个矿工世家。他的曾祖父就是矿工。他的父亲因矿井事故去世。盖莱克本人从13岁起就下井干活。在随母亲移居法国的年代里，盖莱克积极参加了法国工人的革命斗争。1931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1934年因参加矿工罢工被法国警察局驱逐出

境。回波兰呆了3年后，1937年他再次流亡国外，到比利时当矿工。战争结束后，他在比利时组织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爱国者同盟，并领导了在比利时的民族委员会的工作。1948年盖莱克回到波兰，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1949年他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省委书记。在卡托维兹他念完了大学，获得煤矿工程师证书。1954年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从1957年起他兼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

正象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在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当中，盖莱克有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哥穆尔卡和奥哈布都出生在加里西亚地区，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贝鲁特则出生在卢布林地区。加里西亚和卢布林地区是波兰的二类地区，经济的落后给那里的文明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哥穆尔卡、奥哈布和贝鲁特都是在这样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只有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波兰西部地区的党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在西欧国家侨居了22年之久的共产党领袖。同前面3人相比，他是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上成长起来的。

希隆斯克省（即卡托维兹省，波兰人习惯称之为希隆斯克）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希隆斯克是“波兰的鲁尔区”。那里密集着波兰的大型工矿企业，因而也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盖莱克领导这一地区长达13年之久，逐渐成为希隆斯克乃至全波兰的显赫人物。许多旨在提高矿工生活水平的倡议和活动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希隆斯克的住宅建设比波兰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宅都要讲究和整齐。据说，盖莱克曾要求改变标准住宅的建筑设计，因为按原先设计的标准住宅厨房太小，而矿工家庭大部分时间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他还积极奔波，使每一个工人都得到一小块土地，用以栽花种菜，让工人们在繁重的井下劳动之余，能够放松和休息一下。人们如果要去找盖莱克，也比较容易，可以找他摆摆问题，要他到华沙的中央政府去想想办法。每逢星期天，他都不带警卫在公园里散步，人们可以走近他，同他握手。他还非常喜欢观看足球比赛，并且和矿工们一起为著名的“索斯诺维兹”俱乐部队当啦啦队。

这一切使得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人们没有必要去知道比亚威斯托克或者奥波莱、或者波兹南的省委书记是谁，但在整个波兰，人们都知道希隆斯克的省委书记是爱德华·盖莱

克。

因此，盖莱克在十二月危机之后的当选不是偶然的，他似乎是领导国家从无所作为和停滞不前走向比较美好的未来的理想人选。他被视为实用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和现代化倡导者而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护。他的个人性格和作风也使得他容易获得普通人的好感。恰如科尔邦斯基教授指出的那样，“他给波兰政治生活中带来了新的、带有个人标记的、明快的作风，同哥穆尔卡的冷酷，迟钝的作风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

在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高领导者之后，盖莱克深信，只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在希隆斯克的工作方式和追求目标，是可以赢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度过暂时的困难时期，清除危机造成的悲痛，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他在1971年2月6日党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谈到自己的施政纲领时说：

“……为了使领导和管理体制现代化，这种体制必须是与发展的战略任务紧密相联系的。政治局和政府将成立一个由各方面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组成的专家小组，首先是管理、经济、财政、社会学、情报研究、工作方法学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小组应该制订出管理职能制度的整个方案（包括这一方案的实施阶段），制定出10—15年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任务所适用的方案。

……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发挥人们的首创精神创造条件，扩大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作用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到并充分估价这个事实，即有效的管理是进步的巨大力量。”

事实证明，盖莱克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前，波兰所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在应验第一书记的预言。

他的令波兰人民耳目一新的工作作风是：每天要会见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各种职业和有专长的人士的代表，以及各机关和各业务部门的代表，同他们尽可能广泛地交换看法。他会见了国内所有最大企业的经理们，与他们交换了恢复生产的迫切任务问题。他会见了冶金工人、矿业工人、化学工人、建筑工人、造船工人、铁路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教授、设计师、妇女、青年团的代表们，以及各城市和地区、学校和工厂的代表团。他在以后的10年中一直坚持这种“直接领导”和“直接对话”的作风，并称之为“和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协商”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

上台伊始，盖莱克便有力地证实了他这种方式

的有效性。

1971年1月中旬，什切青造船厂的某些领导“为了支持党的新领导和为了人民波兰的利益”，组织发起一次所谓“生产献礼”运动。这些人不顾工人们的厌恶和不满情绪，按照老一套的方法行事，想以溜须拍马的行动赢得上面的赏识。自然，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感，抵触态度最终导致了工人们的罢工。当时，造船厂的罢工有蔓延到什切青其他工厂的危险。

面对刚刚开始的“革新过程”（盖莱克当政年代始终坚持“革新过程”的口号）遭遇的这种严重情况，1月24日，盖莱克本人与总理雅罗谢维奇等党政领导成员一道到造船厂，与职工代表直接会面、谈话。会见持续了9个小时。整个会见过程都由厂里的广播站予以立即转播。包括船厂工人和城市居民在内的10000多人聚集在船厂大门前收听会见经过。

据报道，会见是在坦率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什切青广播电台的评论称，这次会见中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有的是认真、坦率、毫不客气的和毫不隐讳的讨论，是最高党政领导的代表与工人们的谈话，没有秘密，毫不掩饰，没有躲躲闪闪的外交辞令”，所有的、往往是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

问答。“任何一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立场，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

在9个小时的讨论中，大家谈到了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以及厂里的问题，就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法制和治安等发表了意见。在许多发言中，人们以尖锐和坚决的口气要求从战后以来令人痛心的经历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谈到，有必要作出持久的保证，使任何危机形势不致再次发生。例如人们要求制定具体而可以核查的干部政策，其中包括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干部要实行定期轮换。有个工人说：“1956年，我们给了哥穆片卡以完全的信任，但希望落空了。我们现在十分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失望。我们真诚地相信，今天我们给予盖莱克同志的充分信任一定会对他有好处。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没有弄错。”

在讨论中，占时间最多的是当地的问题，尤其是造船厂的经济与组织问题，福利情况，人与人的关系，行政的活动，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工人自治机构的活动。什切青的造船工人代表说：“为了支持盖莱克同志，我们准备额外造一艘船，可是我们担心在我们船厂目前这种劳动组织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及时赶造出来”。另一个代表补充说：“即使我们克服了劳动组织上的困难，这艘船也到不了盖莱

克同志那里，因为工厂领导会把它当奖金自己分掉”。工厂行政和领导编制不断扩大的现象也遭到了严厉批评。一位工人说：“过去我们车间里监督与今天相同的工作只要一位师傅就够了，而今天却由7个人来做。一个主任有几个副主任，结果谁也不对工作负责”。关于福利和工会工作也提了不少要求。工人们说，许多党和工会的活动家同工人阶级失去了联系，他们同工人的接触只在过节时才有。他们不是进行交谈，而是作单方面的演讲。党组织讨论生产问题，但却忘记了普通的人。党的会议经常限于“听书记读文件，却很少有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多党员是“专门开会的，而不是给人树立工作榜样的”。一位造船工人说，如果谁想当共产党员，“那么就让他为我们共同的福利而奋斗吧”。人们多次提出，要精简群众组织的编制，尤其是工会的编制。“我们不要那种成天往上级那里跑、成天坐办公室把裤子都磨旧了的人”。最后是工人与厂方的关系问题。什切青的工人说，我们必须有把握“将来能与厂方共同解决所有的基本问题”。但是“厂长办公室并不是与工人阶级进行对话的地方”。

大家对于在悲惨的一周里活动在沿海地区的治安部队，对于当地领导核心的成员，对于报纸报道事

件进程的方式以及对什切青地区的议员们都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一位工人说："盖莱克同志和雅罗谢维奇同志，这些话很不客气，可能伤你们的心，但是我们只能用这些话和用我们的劳动来帮助你们"。

来自华沙的政治家们不是被动地听取工人们的发言。他们在讨论中也发言，进行解释，纠正某些评论和观点，表示赞同并表明要积极行动以消除惊人的不正常状态。内务部长向船工职工们表示，参加罢工的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雅罗谢维奇总理也发了言。

盖莱克在讲话中说，在什切青造船厂和全国出现的形势是由来已久的，尤以近三年最精。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计划实际上被舍弃了。经济情况逐年恶化。目前国家已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使新领导有所作为。他说："我们把车子开进了死胡同，很难按我们所愿意的那样调过头来了"。至于造船厂工人提的许多要求，盖莱克对其中的很多表示同意，对另一些则进行了争辩和解释。关于报刊的报道，他指出："肯定要改进这项工作，也要在党的、工会的和青年的组织中重新进行选举"，"我完全支持这点，但是这必须是真正民主的选举，选出的必须是真正能代表职工利益和

我们国家利益的同志”。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这位新任最高领导接着说，在我们祖国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每一个不慎的步子只能有利于那些使国家变成目前这个样子的人。这是大家都理解的。在七中全会开过的最初几周里，那些在12月20日被从最高职位上撤下来的人仍然认为，在危机的一周中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认为新领导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是不对的，他们首先把群众看成是冒险分子。

盖莱克不仅呼吁人们理解国家当时所处的形势，也呼吁人们要有耐心。他说：“还必须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许多长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但这是个长期过程，因为长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不可能在几周之内解决”。

在会见时，人们默哀一分钟以悼念十二月事件时在什切青牺牲的人。当盖莱克等离开造船厂时，到会的工人用掌声欢送他们。《什切青之声报》在报道会见情况时，用了一个航海术语作为标题：《向着革新——全速前进》。该报写道，党和政府新领导的立场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同”。

盖莱克又从什切青到了格但斯克，与各方面的代表进行了8小时的会见。工人们批评的那些弊病和在什切青谈到的一模一样。他们还说：如果真要

使工人感到他们也是企业的共同主人，那么只把决定通知工人而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与他们磋商决定的实质内容，这显然是不够的。一位工人说："25年来，我们重建并扩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原本指望，我们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口号，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会是公平合理的"。

盖莱克在讲话中请求工人们谅解和有耐心。他指出，当时经济形势的特点就是缺少储备，从而无法取得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他说："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们，情况是多么困难"。"你们把我们也当作人吧——也象帮助人那样来帮助我们吧！我们需要的只是安定，劳动，理智和时间"。"请你们相信，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泥土捏成的，除了在这里宣告的目的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目的。如果你们肯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就能够共同地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怎么样——你们肯帮忙吗？"

回答是一片整齐的喊声："我们帮忙！"1971年最流行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与这一口号相适应，在盖莱克时代，波兰党和

政府提出了“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在它的激励、督促下，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1971年1月8日，政府主席团会议就新的投资项目作了决定，其中包括着手修建“波莫沙尼”铅锌矿和在希维诺乌希切修建冷藏鱼库。1月上旬，中央书记处致信各企业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主席和总经理，这封信里注意到工人阶级生活福利情况与生产问题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考虑了工人当时在集会上提出的批评。中央书记处断定，这许多意见都涉及到职工的劳动条件。要满足这许多正当的要求，需要花很大一笔经费，但是其中好些问题不要多少资金也可以解决。信里还提到必须公平分配用于奖金、奖励和福利事业的钱，必须加强监督厂方遵守安全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各种规定。中央书记处还提到，必须不断改善为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配备的必要的福利设施，诸如存衣处、淋浴装置、饭厅等等。

紧接着中央书记处的信之后，报纸公布了部长会议主席就个人领导和责任问题致各部长、联合公司经理和企业经理的信。信中指出，并非处处都正确地执行了个人领导原则。他提醒大家注意，最近几周中发生的事件说明，在执行政府的重要决议和指令方面，部分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采取了消极态

度，用于讨论和开会的时间过多，存在容忍劳动纪律松弛和违背规章制度的现象。

政府开始注意改善农民的生活和福利待遇。自1972年1月1日起，政府宣布全部取消农产品的义务交售。由于取消义务交售，波兰农民每年可增加25亿兹罗提的收入。与此同时，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首先提高了肉类和牛奶的收购价格。1公斤猪肉的收购价格从1970年的20.86兹罗提提高到27.85兹罗提，提价率为33.5%；生牛肉从1公斤11.74兹罗提提高到16.79兹罗提，提价率为43%；牛奶从每升2.64兹罗提提高到3.43兹罗提，提价率为35.1%。畜产品价格的提高刺激了农民对养奶牛、养猪等事业的兴趣，为发展畜牧业创造了良好气氛。1970年至197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30.5%；而这期间农民购买的生产资料（农机、化肥等）的价格平均只增长8.2%，因此农民从提价中得到很多好处。

70年代以前，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农产品收购制度相联系，即根据农民向国家提供农产品的情况择优供应。这之后，一律改为自由购买。尤其是农业用煤也由配给供应改为自由购买，从而消除了畜牧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所谓“燃料障碍”。

1956年以后在波兰农村中就已准许进行土地的

自由买卖，但政府把个体农户的土地拥有量限制在20公顷以内。一直到1970年，这种限制始终未变。经验证明，这一政策对个体农户的集约化生产不利。为了发展专业大农户和农业生产，波兰议会于1971年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个体农户的土地拥有量可达到50公顷（西部地区可达100公顷）。同时也规定了有利于大农户的土地税政策。1971年还调整了土地所有制，使1956年以前私人买卖的土地得到法律的承认，以此促进个体农户增加投资、合理经营、扩大生产。

在农民的生活福利方面，国营农场工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早就享受与工人相同的生活福利待遇，只有个体农户没有此种待遇。1970年以后，政府为了调动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决定给予350万个体农户及其家属享受免费医疗。1977年，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个体农户退休的立法。法律规定，男65岁、女60岁的农民，在自己庄园上进行生产并向国家每年交售价值至少15000兹罗提的农产品达25年的男性农民和达20年的女性农民可享受退休待遇，退休金额按每个农民退休前5年每年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平均价值计算，共分35级，最低每月1500兹罗提，最高每月6500兹罗提。国家再通过土地基金会把领取退休金农户的土地转给国营农场、

农业社或专业化农户经营，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福利待遇，是新领导人的一种积极态度，缓和和增进与社会公众及舆论的关系，进而改善十二月危机中形成的社会政治气氛，则是另一种主动姿态。

据报道，盖莱克在“会见采矿工人、炼钢工人和造船工人之后”，1971年1月20日又在党中央大楼会见了文化艺术界代表。会见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告诉大家，“关于华沙市政当局和各界代表建议重建华沙王宫”一事，政治局抱“积极态度”。文化艺术界代表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人民论坛报》评论指出，这是此次会见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感人肺腑的倡议是关怀民族进步传统的证明”。

评论写道：过去缺乏这种会见，缺少这种气氛，缺少这种交谈，借用著名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缺乏建立在“善意推测”原则上的这种谈话。在会见时，盖莱克向创作界人士们说：“我们想把你们的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去解决。党将确定文化政策的主要方向”。

华沙王宫是波兰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彻底毁坏。1949

年7月2日在立宪议会第67次会议上，第一次作出了必须重建王宫的决定，并计划在1954年建成。但这个决议没有付诸实行，其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缺乏资金。

1971年1月26日，在华沙成立了重建王宫公民委员会，由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沙省委第一书记肯帕牵头。他讲话说："当我们在古老的城墙旁使王宫耸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伟大象征将重新复活，这是独立的民族持续存在的象征，是我们最重要又最悲惨的历史篇章的见证人"。委员会向居住在国内外的波兰男女发出号召，"都来参加这项伟大的事业"。号召的结束语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暴，我们独立国家的纪念碑——王宫，将重新屹立在维斯瓦河峻峭的岸边"。

修复王宫仅仅是"革新时期"振兴民心的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指示，1971年1月底在华沙又出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教育和高教部长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由世界著名学者斯切潘斯基教授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教学、教育等方面评价教育制度的功能，评价教育机构在整个波兰社会活动中的效果"。人们认为，这表明国家的新的政治领导致

力于波兰的现代化，致力于加速波兰发展的问题。

素以专家治国论者著称的盖莱克，从上台以后就一反哥穆尔卡的“小家子气”作风，以现代化推行者的姿态大刀阔斧地重新组织经济。在70年代初期，波兰采取了广泛参加国际分工、大规模引进新技术、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经济发展战略。

当时包括领导人和专家在内具有的一种认识是，只有大工业组织才能较好地解决技术进步的问题，从而与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相适应；也只有大工业公司才能在国内外大规模地经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从1973年起，波兰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组织的规模，建立起众多大型经济单位，并推行新的经济财政原则。1973年开始，确定了27个工业联合公司为实行新经济财政的试点单位，它们的产值占国营工业产值的20.3%。1974年又增加46个联合公司为试点单位。此时，进行试点单位的产值已占整个公营（包括国营和合作社）工业产值的44.7%，它们的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38.5%。1975年又增加了39个试点单位。到1975年，除两个省外，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一律并入新成立的大型联合公司中。

盖莱克时代提出了“建设第二个波兰”的雄心勃勃的口号，并为此制定了“高速发展战略”。这

一战略包含有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内容，比如有国民收入、消费和生产的同步巨大增长方案，有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方针，有开放经济的战略和积极的借贷政策等等。

计划指标是可观的。1971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六大规定，1971年至1975年这一五年计划期间，与上一个五年计划比较，国民收入增长39%，工业产值增长50%，农业产值增长19—21%，投资总额增长42%，实际工资增长19%，出口额增长55%；1973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发展的良好势头，把上述6个数字分别改为55%，66%，25.5%，79%，38%和102%。

高积累方针得到了贯彻。波兰在1973年至1978年期间，积累的比重均超过了30%，其中1974年达到37.2%，到70年代的最后两年，积累比例下降到20%左右。1971年至1975年的投资大幅度增加。用于增加固定资产的净投资额每年以19.6%的速度递增。这方面，工业部门特别突出，70年代初，波兰上马了450项重点项目。

高消费政策亦得到落实。1971年至1980年期间，职工的名义工资比1970年增长143%，除去生活费用上涨部分外，实际工资提高55%，加上社会福利，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75%。在这期间，通过

完全取消农民的义务交售和提高收购价格，以及对全体农民实行免费医疗等，使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与职工大体相等。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迅速增加，10年内社会购买力提高了两倍。

高积累和高消费同时大量增长的基本条件，是手头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资金。70年代初，正好是东西方关系解冻的时期，波兰与西方各国的良好传统关系，使得寻求巨额贷款成为可能。对于西方来说，波兰既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又是改善与东欧和苏联关系的重要渠道。西方政府和金融财团的大量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入波兰，成为70年代初波兰经济迅速增长的“助推器”。

在盖莱克执政的头几年里，波兰人接受了他的方针，并满意地看到了其显著成效。人人都可以大胆而自由地尽力满足自己被压抑多年的消费需要，人们吃穿和供应都比过去变得更好。现代化的商店、超级市场也越来越多，可供选择的商品品种增加了，不仅有本国产品，也有进口商品，各种产品的质量也比过去好多了。

盖莱克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消费心理和工作动力。过去，哥穆尔卡要求人们：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应该生活得尽量俭朴一些。与此相对照，盖莱克提出了另一种口号：更多地工作，挣更多的钱，

更多地购买和消费。他对矿工们说："你们拿出更多的煤炭来，让我们去换外汇，用更多的外汇就可以进口更多的商品。因此，你们多工作就会有更多的商品，有更多的报酬来购买更多的东西！"他的话的确兑现了。70年代的外国访问者，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的波兰。波兰人似乎热衷于追求住宅、小汽车。在这一时期，购买小轿车也不必等以往那么长的时间；如果用外汇购买的话，甚至马上就能提货。住宅建设相当活跃，例如，1970年交付使用的住宅为19.4万套，1975年为24.8万套，1978年达到28,4万套。70年代每1000间住房所分配到的人数降低了：1970年平均每1370人分到1000间住房，1975年每1240人分到1000间，1980年1100人就分到1000间。

按照波兰的惯例，在报刊、电视和政论文章中，对这一新形势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利平斯基提出，不要过分地追求"汽车文明"，而首先应该是"住宅文明"，因为住房同其他需要相比更为迫切。此外，还因为住房不足，出生率就会下降。有人说："年轻夫妇首先需要的是床铺，而不是汽车"。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两种"文明"都不可排除，都很需要。甚至有人还补充了第三种所谓"电气文明"，理由是人们也需要家用电气设

备和其他一切现代化的生活用具。

波兰居民去国外旅行也越来越容易了。在长期受限制之后，大批波兰人现在享受着出国探亲访友和旅行的自由。由于同民主德国签订了护照免办出境签证的协议，波兰人可以直接进入民主德国，那边的人也可以直接进入波兰。

盖莱克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比哥穆尔卡更加积极、活跃。在忠于华约组织、经互会同盟关系并与苏联步调一致的同时，他主动同西方建立多渠道联系，努力使缓和态势不可逆转。他利用自己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享有的个人声誉，安排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华沙的会晤。尽管他自己没有参与会谈，但作为这次会晤的设计师和东道主，他在世界各国舆论中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在国内，在他的整个执政期间，盖莱克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几乎每天都会见各种代表团并同他们谈话。他经常到工厂、城镇和学校巡视，参加各种集会和庆祝活动。在这些会见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并努力创造一种直接的、自然的、非正式的气氛。比如，有一次在访问一家工厂时，盖莱克注意到工人们都穿着新工作服，于是就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得到新工作服的？工人

们回答："今天早上！"他立即转过身去简短地对工厂的行政负责人说："我不是为了竞选代表来的。我下次再来吧！"说罢，便转身离去了。

盖莱克时代，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继续保持了某种良好的关系，双方建立了一种"默契"。有一次，盖莱克在回答一个工人提出的国家与教会关系问题时说，在波兰，"国家和教会之间没有冲突，在政府和教徒之间也如此"。在他表态之后，紧接着以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为首的主教团也作了回答。在书面文件中，主教团表示："认真的劳动和忘我精神的基本条件是对政权的信任，而政权通过自己对全体居民的福利的真正关心才能获得这种信任……"。盖莱克在当政期间，对梵蒂冈作了访问。1977年12月他在会见教皇时说，在波兰实际上不再存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冲突的形势；相反地，双方都希望为实现一个伟大的、全民族的目标而共同作出贡献。当时盖莱克指出："使我们联合起来的事情，以及我们同波兰教会的最高首领维辛斯基大主教在有关我们不久以前的谈话的声明中共同强调的事情，就是对我们祖国命运的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多万波兰人被杀害，他们是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在他们中间，有成千个为自由而牺牲的天主教教士……"。他还补充道，整

个波兰民族不仅为国家的发展而推崇爱国主义的团结，而且正在努力克服信仰上的差异。这种对波兰教会在维护民族统一中的作用所作的肯定评价，受到广大的天主教教士的欢迎，也受到梵蒂冈方面的高度重视。1979年6月，世界天主教领袖、梵蒂冈首脑约翰一保罗二世教皇，即波兰克拉科夫从前的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访问了自己的祖国——波兰。他所受到的盛大欢迎，体现了教会与波兰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1977年3月，波兰议会举行选举，有100多万青年人第一次参加投票，也有很多年轻人被选为议员。这是一次对盖莱克体制的检阅。在这次选举中，盖莱克获得了99.8%的选票，在选举中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社会上的气氛逐步地发生了变化。一位评论家写道："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往往被指责为懒惰的波兰人，也想要更好地、更有效地工作了，但必须在获得很好的报酬和基本上满意自己工作的条件下……"

一位外国记者证实，在人们中间没有象过去那种可以觉察到的不安情绪。他们现在比较满意了。因为，他们至少消息比较灵通了。持这种看法的人举例说："在哥穆尔卡时期，政治局是秘密地工

作。一切情报都掌握在上层。而现在，比方说，每个人都知道政治局每星期二召开会议，还会发表关于会议的公报。”

公开报道的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灵活了。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居民和政府之间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

在盖莱克当政期间，还完成一项大的变革，即国家按省、区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旧的行政区划——区、县、省——从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变，它使得地方和中央的联系非常困难，从上下达每项决定和从下递上每个申诉和建议，都要通过所有这三级，这是一种繁琐的行政阶梯。变革之后，取消了县这一层，只保留区和省，这样可以分别给予这两级以更大的权力。人们认为，这样做将有利于打破地方的“封地”。以往在这些“封地”里，县的官僚主义者长期逍遥自在，既逃避自下而上的监督，又逃避自上而下的监督。而两级的行政体制则可以更多地发挥区的主动性，省这一级也可以更多地接近基层，接近居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还进行了一项干部制度的改革。恢复了过去曾经有过的省长职位。现在省长成了省里的第一号人物。这样做——按照德·米利伏耶维奇的说法——也满足了波兰人对传统的偏好。

70年代的蓬勃发展，使得盖莱克确信，波兰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八大之前所提交社会讨论的提纲中，广泛列举了波兰已经和可能取得的成绩。到70年代末，波兰按人口平均有3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从而成为世界上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波兰的工业已经能够制造诸如计算机、集成电路、程序控制机床、小轿车、家用电器设备等产品。国内保证了充分就业，因为近12年来开辟了25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从哥穆尔卡时代起，就业一直是困扰波兰领导人的严重问题之一。战后的波兰曾经是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

生活水平已比前一个时期大大提高。如果拿汽车的数量衡量生活水平的话，可以看出，1970年每71个人有1辆小汽车，而1980年每18个人就有1辆小汽车。对很多波兰人来讲，现在小轿车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奢侈。

1971年时，盖莱克就在党的六大上提出了在波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1973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更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说在波兰“有一切条件制订在20年内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

70年代中期的1975年底，在国内呈现一片兴旺

繁荣的气象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盖莱克代表党宣布：

“我们祖国、人民波兰，正在跨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跨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我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大部分任务，在30年里已经完成。

今天，我们的国家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权归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作用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社会主义使波兰人民的政治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容。

多年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工业中占绝对优势。在农村，社会主义的地位也在增强。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正在执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正在加强和完善这些原则。

我们有权指出，我们基本上已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现代波兰已属于那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已取得了自己巩固的基础的国家。”

他承认仍有困难和问题，但他表示党和政府对解决这些困难抱有充分的信心。

“在从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时，

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总的来看，已较深入，但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水平是不平衡的。在许多领域我们已在实现新阶段的典型任务。对实现这些任务，我国作为整体来讲已经成熟。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农业，我们还在解决前一时期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在发展的更高阶段，以适当的形式解决前个阶段的某些任务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社会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以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力量对比（这是十分重要的），都为这样做提供了方便条件。”

由于1952年制订的宪法已不能适合“新时期”的要求，1976年2月，波兰议会通过决议对1952年宪法进行修改。2月16日，波兰颁布了新宪法。宪法第一条说：“波兰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修改宪法的说明中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国家阶级性质的改变，因为从1944年起波兰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这样的提法更符合国家的实际，1952年的宪法说，波兰是人民民主国家，因为当时是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而今天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说：“1952年的宪法没有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而新宪法第二条规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这就

是说，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不仅是波兰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之一，而且成为波兰制度的根本的法律准则之一”。新宪法还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的三党合作是波兰人民统一阵线的基础。它规定，把原先属于议会的最高监察院，划归部长会议主席领导。

然而，读者不应产生这样的印象：盖莱克丝毫没有觉察在他的统治下所潜伏和滋生的严重问题。应该说，他对一帆风顺的盖莱克体制，在其作用的后期，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并且试图对原先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作某些局部调整——尽管现在看来这些局部调整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而且为时过晚。

1980年2月11日至1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今后几年的经济任务。新任务的特点是降低发展速度，加强本国的粮食和饲料生产。投资重点转向农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动力工业、交通运输、出口生产、原料生产等方面。人们指出，波兰经济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例如，除食品、肉类和许多日常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以外，能源的日益短缺也更加突出。

在八大上，中央提出了新的关于下一个五年计

划（1981至1985年）的建议。从实际面临的困难出发，领导人有意识地在计划的前三年整顿经济状况，建立对能源情况的监督，改善铁路交通运输，加速发展食品经济。

在新的计划中，没有规定象前一个时期那样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但也制订了迈向现代化的发展途径。新的、命名为"维斯瓦"的综合规划证明了领导人继续现代化的想法。这个规划预计要解决贯穿波兰全国的最大河流流域的基础设施、水利工程、运输能力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计划试图通过大幅度减少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使建设方向由重工业转移到通盘解决国内问题、解决人民的需要的方面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工厂企业的代表，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分析了现存制度的各种问题，公开指出了它的缺陷。他们要求尽快改革和完善这种与现实生产力明显不协调的结构。实际上，正如观察家们指出的那样，这是在继续公众中早已开始的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有经济学家、报刊机构和大批群众。在所有讨论中贯穿着一个要求：争取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加强劳动者的自治作用。

盖莱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附和了这种要求。他在报告中主张：到1983年底，在所有的经济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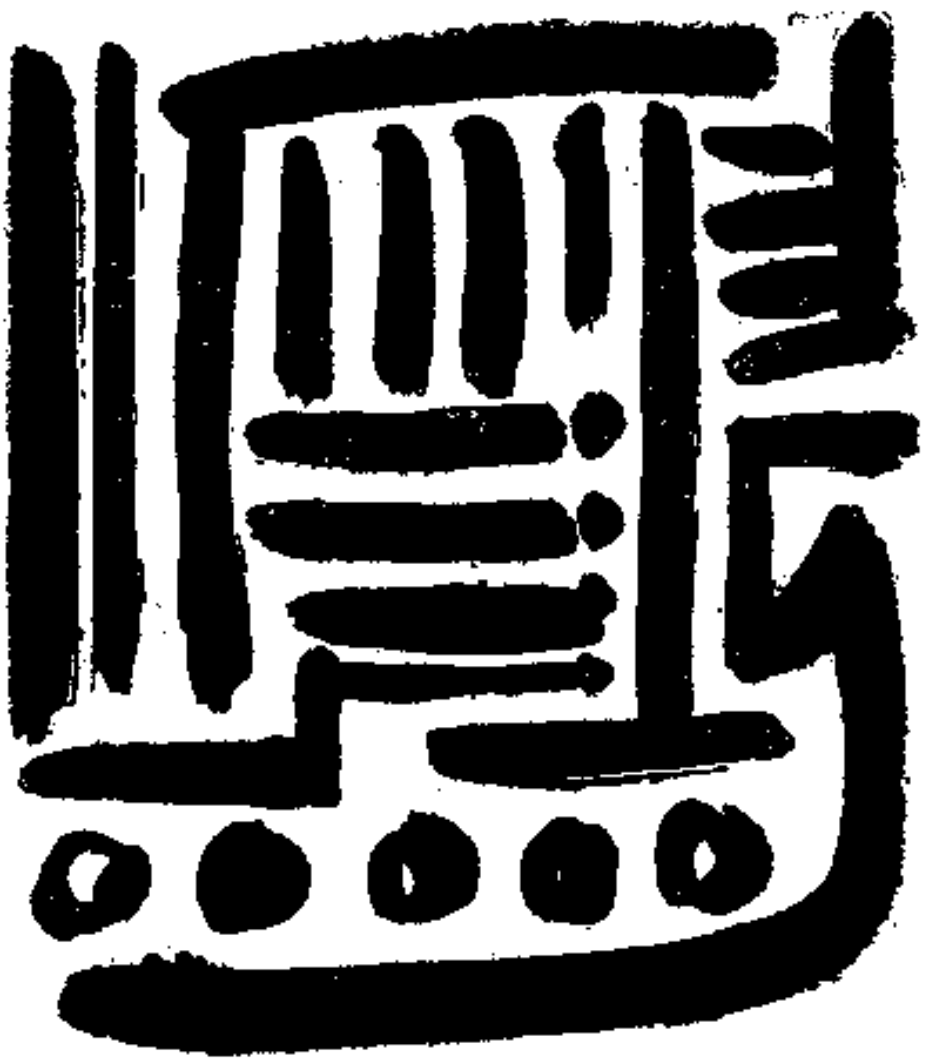
中，要完善并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他说，这个体制将唤起责任感，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对经济核算的重视。这个体制也将确定体现合理价格的作用。这是一个急待尽早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的价格制度如同一块绊脚石，使得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无法推进。

在八大上，领导层作了人事变动。彼·雅罗谢维奇退出政治局，并在当天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在大会文件中，政府受到严厉批评，“因为它缺乏主动性，对党的领导所建议的改革推进得很缓慢，过多地靠发指示办事，某些部的工作缺乏效率，等等。大会之后，议会马上提名爱德华·巴比乌赫为总理。他早在盖莱克上台时已当上政治局委员，也是盖莱克最亲密的共事者之一。他还是经济学硕士，党的富有经验的工作者，多年担任华沙党组织书记。

据认为，高层领导的这种人事变动，意味着新班子将在早已确定的党的现代化纲领的基础上，更坚决、更踏实地开展工作。很多人相信新的政府会立即开始经济改革，纠正业已明显暴露的弱点。无论如何，盖莱克政权仍然对自己的治理方式和波兰的前途充满信心。任何人——无论是这次大会上持批评态度的人还是盖莱克本人——都没有料到仅仅4个月以后盖莱克政权将经受一场毁灭性打击。

第八章

旧戏重演



“怎么做才能抑止无冕的帝王们的成长呢？人人都只会对下面讲话，训斥……人们在创造某种制度。我们熟悉这个特定的制度——一切都引向教条主义，民主集中制是个好东西，但是让我们记住，我们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民主集中制。”

——马海耶克

波兰70年代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一个特殊前提之上的，这就是：它可以通过向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借贷的形式获得为雄心勃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这个前提在盖莱克执政的前期是基本成立的。如同德·米利伏耶维奇所说：这个时期一开始，幸好赶上东西方关系解冻，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世界市场比较有利的行情，使波兰新领导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然后向西方寻求巨额贷款。当时得到贷款也相对地比较容易。因为在那种形势下，西方

财团认为波兰不仅可以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也可以成为向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输入西方商品和技术工艺的枢纽。①

但是，从1973年世界市场爆发石油危机之后，各种燃料、原材料价格猛涨，西方经济急剧萎缩，各国银行及世界货币和基金组织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甚至不肯再继续出借资金。这样，波兰不仅难以得到所需要的优惠资金信贷，而且使原有的还本付息成为沉重负担。外债的问题严重突出，成为波兰经济紧张和矛盾重重的重大原因之一。

据统计，到1980年底，波兰通过各种渠道和不同形式，向西方国家借款累计达230亿美元，1981年底增加到255亿美元，到80年代中期已超过300亿美元，成为苏联和东欧地区欠西方债务（按总数和人均计算）最多的一个国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债务远远超过了波兰本国的偿付能力。波兰推行所谓"积极的借贷政策"以后，国内形成了一股不考虑实际需要和可能的盲目的借贷风，使外债的数目在1975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债务的两大安全界限：一是当年还本付息的总额不能超过同年出口创汇额的25%，而波兰1975年这个数字达到26.3%；二是硬通货债务的累计数额不能超过一年的出口总额，而

① 《波兰在十字路口》，第109—110页。

波兰1975年外债额超过了当年出口总额的1/3。随后这一比重逐年上升，1980年还本付息的支出共8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收汇额99亿美元的81.8%，仅剩下18.2%的余额用于进口，而外债累计数额超过当年出口总额的132%。

见表：（单位：10亿美元）①

年份	年终欠西方国家的长、中期贷款	每年偿债增加的数额	每年应归还的本息	还本付息债款占当年向西方国家出口收汇的百分比
1971	1.2		0.4	17.4
1972	1.5	0.3	0.4	15.4
1973	2.8	1.3	0.5	14.7
1974	4.8	2.0	1.0	19.6
1975	7.6	2.8	1.5	26.3
1976	11.2	3.6	2.1	34.4
1977	14.3	3.1	3.1	45.6
1978	16.9	2.6	4.5	60.8
1979	20.5	3.8	6.3	75
1980	2.3	2.5	8.1	81.8

波兰在外资的使用上也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波兰买的专利和机器的设备利用率很低。70年代从

① 见波兰政府1981年7月向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

国外买进428项专利。由于进口专利时未充分考虑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原材料的供应以及生产的需要和可能，大量进口了一些国内可以解决或无法利用的专利，造成巨大浪费。其次，用进口的技术设备装备的工厂和用外国专利兴建的工厂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多数靠从西方国家进口，耗费了大量外资，增加了对外的依赖性，同时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1971年至1980年间，波兰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占其从西方国家总进口额的50%左右。再次，波兰利用外资从事的项目选择不当，建设周期太长，造成对新的外资的不断的追加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债台高筑的紧张局面。例如，盖莱克时期修造的“卡托维茨”钢铁厂，计划将成为全欧洲最大的钢铁中心之一。它不仅吞噬了巨额资金，而且建成周期一再延长，追加的投资不断增加，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农业发展对进口的依赖也深化了矛盾。波兰农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比例失调，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发展一直快于种植业，盖莱克提出一个口号，叫作“让我们出口肉，换回粮食和饲料。”忽视了本国种植业的地位。1978年与1970年相比，畜牧业总产值增长了37.8%，而种植业只增长了12.6%。畜牧业所需饲料的不足部分靠进口补充。到后来，畜牧业的发展主要建立

在进口饲料的基础上。70年代上半期，波兰每年平均进口400多万吨粮食和饲料。而波兰本国粮食和饲料的总产量仅1500—1800万吨左右；1975年以后，因农业连年歉收，粮食和饲料的进口量剧增。每年平均需要进口800多万吨，1980年进口量高达900多万吨。1971年至1980年10年内共进口粮食和饲料6100万吨，相当于同期本国主要谷物总产量(18600万吨)的1/3，其进口费用高达80亿美元。严重影响了外贸平衡。

在整个70年代，波兰在大借外债、盲目引进的基础上开展了广泛的投资活动，国家、地方、企业蜂拥而上，致使基建面过宽，建设周期延长，投资效率下降，大量资金停留滞阻在未完工的项目上。1971年至1975年的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投资额增加42%，但实际上增加两倍多，直到70年代最后两年，才削减了投资额。

在基建投资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基建规模过大。70年代初，波兰上马450项重点项目，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施工力量、基建物资的供应及运输能力，使每年都有大批的计划项目不能按期投产，积压了大批资金。截止1980年底，波兰因未投产的项目所积压的投资资金达800多亿兹罗提，其中600亿是引进的机器和设备。积压的这批资金约占10年内

总投资额的17%；要完成这批“胡子工程”，尚需投资13000亿兹罗提，相当于1980年全年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相应地另一个问题就是建设周期长。波兰基本建设周期一向比较长。特别是70年代后期，一般大中型项目从兴建到投产的整个建设周期平均需要35个月，比1975年延长8.5个月；工业项目建设的平均周期从1976年的39个月增加到1980年的47个月。1980年公营经济的基建项目有61%超过了计划周期，而1975年只占31%。此外，波兰经济的投资效果很差，其原因之一是不重视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挖潜，而是一味地兴建新项目。

在大量兴建新项目的时候，波兰政府忽略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所上的项目中大都是加工工业，而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些先行工业的发展却相对缓慢。比如，波兰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71年至1975年为10.5%，1976年至1980年为8.9%，而燃料动力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71年至1975年为6.6%，1976年至1980年为5.1%。由于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造成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使许多工厂因缺电、缺原料而停工，甚至连一些重点工厂也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70

年代后期，波兰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关于能源危机的抱怨。

这些说明了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波兰本来是一个盛产煤炭的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需要。“能源危机”一词本不应在波兰出现。问题在于，在盖莱克当政时期，波兰经济决策人不顾本国条件，片面引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依靠石油作为能源。而所有对石油的需求都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每当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波动，每当波兰的供应者提高要价，波兰经济就不得不承受新的打击。

波兰的交通运输在70年代发展极为缓慢。在增加对工业投资的同时，政府不仅削减了对农业的投资，而且削减了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其份额从60年代占总投资的10%，下降到70年代下半期的8.8%。因此，这期间铁路里长只增加1%，而公路里长还减少5.3%，致使交通运输与整个工业的发展极不适应，交通运输极其紧张，进出口物资，生产需要的原材料，人民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均不能及时运输。这不仅影响生产的正常节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正因为这样，盖莱克提出的经济高指标几乎全

面落空：从1973年以后这一现象已有表现，因原材料进口不足，致使许多工厂生产下降或停顿，并影响了出口生产；从1975年起，农业连年歉收，不得不大量增加粮食和饲料的进口；居民现金收入的迅速增加和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造成市场供应的日益紧张，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因此，1971年至1975年的五年计划，除国民收入、投资和实际工资增长指标超额完成外，工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完成。

见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的百分比）①

	1971年波党六大规定的指标	1973年波党全国代表会议规定的指标	完成情况
国民收入	39	55	59
工业产值	50	66	64
农业产值	19—21	25.5	19.4
投资总额	42	79	132.6
实际工资	18	38	40.9
出　口	55	102	66.4

1975年12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七大，不顾当时已面临的巨大困难，仍然提出了“为高速发展而奋斗”的口号。战略性的失误致使问题更加严

① 见《苏联东欧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15页。

重。1979年国民收入下降了23%，1980年又下降了5.4%，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反而造成了倒退和停滞。

在盖莱克当政期间，农业问题始终未能获得解决。虽然政府在一些方面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提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法。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败以后，在选择农业的发展目标上，波兰一直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集体化模式和西方国家的庄园式专业化农户模式中间徘徊不前。政府虽然察觉到个体农民小生产长期发展必然出现的问题，却没有任何变革方案和具体措施。加上相当多的农民反对，一些经济学家也不主张搞合作经济，致使波兰农业生产关系的落后局面维持了30年未变。

到70年代末，波兰农业中仍然是个体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局面。约70%的农业用地掌握在个体农户手中。其中工人——农民户① 占个体农户数的60%，他们拥有的土地最多为5公顷，其中许多农户占地在2公顷以下。他们中有部分人主要靠非农业收入维持生活，农业生产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活动。同时，由于耕地面积太小，不利于机械化和水

① "工人—农民户"在波兰人的概念中，指的是兼有农业和工业活动及收入的农户。

利化等先进技术方法的推行，对农业现代化很不利。这些农民的生产效率一般都比较低。个体农户中另一种不利的情况是，许多农民已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为数不多的公营经济成分在波兰农业中起着较小的作用。1979年时，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小组占有的农业用地为全部用地的31.8%，耕地为25%，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1.9%，而个体农户则占有农业用地的68.2%，耕地的75%，其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78.1%。同年，个体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在商品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是：4种主要谷物占77.1%，土豆占90.8%，甜菜占78.2%，猪肉占66.2%，牛肉占61.2%（其中小牛肉占84.2%），鸡蛋占93.3%，禽肉占66.9%，牛奶占85.2%。

国营农场和其他公有经济成分虽然在机械化程度上高于个体农户——1978年每100公顷土地上投入的劳力，国营农场为13.5人，个体农户为28人，而国营农场的经营成果却远远落后于个体农民。1978年，国营农场每1000兹罗提物资投资的农业产值为1124兹罗提；个体农户为1674兹罗提；国营农场每公顷农业用地的产值为32435兹罗提，个体农户为35056兹罗提；国营农场每生产1公斤猪肉需消耗4.06公斤精饲料，个体农户仅需2.74公斤。

波兹南郊区的国多维国营农场联合企业总经理曾经接待过来访的中国记者，他介绍说，解放前这里曾是贵族领地，土地一部分分给农民后，剩下的收归国有，成立了国营农场。现在的国营联合企业由8个农场和两座烘干厂组成，有耕地4500公顷，职工500余人。总经理十分坦率地向记者承认，多年来，国营农场多数都是亏损的，他的农场也不例外。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营农场必须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即使明知要亏损也要执行计划；二是农场的福利开支太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如房租、牛奶一律免费，而劳动生产率往往低于个体农户。

农村中生产关系的长期落后仅仅是波兰农业落后的原因之一。此外，盖莱克当政期间始终把重点放在发展工业和改变城市面貌上，忽视农业发展，使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例如，1971年至1980年间，工业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60年代的平均占37%左右，上升到平均占40.9%，有时甚至达42%。同期的农业投资比重，却从16.2%下降到15.6%。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根据波兰农业落后的实际情况，农业投资比重至少应占到20—30%。由于对农业的投资不足，10年内，工业增长103%，农业仅增长30%。

由此我们看到了波兰1980年危机的一个直接的、经济方面的根源：一方面，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食品工业长期落后，供不应求，其中畜牧业的发展靠进口饲料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又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待购货币越来越多，供需的日益增大的距离造成了人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国家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而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食品零售价格却长期冻结，为此付出的巨额补贴越来越成为国家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这种恶性的连锁关系使波兰社会经济处于持续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比如零售物价上涨，或进口饲料减少，或工资不发生变动，或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都有可能引起猛烈的连锁反反，从而使矛盾激化。

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1980年与1970年相比，波兰的肉、奶、蛋等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按人均的肉和猪牛下水的消费量由53公斤增加到74公斤。据波兰农业经济研究所估计，肉类生产的1/2靠近口饲料，所以消费量的增加是代价昂贵的。作为记者，德·米利伏耶维奇观察到，70年代后期波兰人的人均肉的年消费量超过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几乎和农业发达的法国相等。他指出，因此，对于波兰来讲："在生产不足和农业歉收的情况

下。肉类短缺是常事。……当然，肉类问题并不是不满的唯一原因。简单地解释为是肉类供应问题，也不能说明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中问题的全部真相。但是，由于各种情况凑在一起，肉类问题仿佛包含着这个国家经济政策中的许多矛盾，一碰到肉，就会牵动所有其他问题的链条，以致引起链条的断裂。”①

波兰政府自50年代中期以后为刺激农民积极性，曾多次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合起来价格约提高了3至5倍。但零售食品物价却长期不变，有的保持了50年代的价格，比如食糖、人造黄油等等。鉴于上述情况，国家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进行补贴。比如，仅对基本食品生产的价格补贴一项，就从1970年的170亿兹罗提增加到1980年的1650亿兹罗提，约占1980年国家预算支出（12430亿兹罗提）的13%左右。

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困难有多么严重，而在于领导人不把实际情况告诉群众，不相信普通人能够理解存在的矛盾。相反，当权者总是自以为是地拿出“药方”，轻率地作出决定。拉科夫斯基举例说：“国家的执行当局尽管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不征求（表面上却装作已经征求）有关职业团体和社

① 《波兰在十字路口》，第117页。

会集团的意见，以武断的方式作出各种决策，事先不打招呼，不吭一声。他们颁布倒退的管理条令（例如，喧嚣一时的一次性富裕税）对于那些颁布之后发现是错误的决定，也不予以撤销。这样一来，如上面提到的那条税收条令也未收到原来预想的财政效果。爱·盖莱克在这项条令颁布之后几个月在同记者的会见时曾声称："'假如我们原先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引起如此恶果，我们根本不会就此作出决议'。对！事情正是如此。假如我们能预见到当局还采用常常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所谓'法的引伸'，不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例如，为了换取农产品，当局同农民签订了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精饲料或煤炭的合同，后来'两手一摊'，就算了事）。当局宣布了平等原则，但同时又为产生'更平等的'公民打开方便之门；禁止在华沙的新世界大街通行车辆，却同时又给那些'更平等者'发放通行证；当局拒绝给X公民发放护照，但后来又在Y的干预下改变了主意。当局真有令人惊异的精力来规定社会支付各种名目的款项。它要社会相信，因为收成不好，所以必须实行食糖凭票供应，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1976年7月供应市场的食糖比1975年7月减少14%，原因是大量出口。……诸如此类的措施激起公民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进一步加

深对政府的成见。总之，不利于提高人民国家的威望，并为加强国家同社会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联系增加困难。我们许多对国家政策的制订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同志不能或者不想理解：任何言行不一、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任何不协调之外，捉弄公民的任何企图，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社会危害，而且也常常带来经济性危害。”①

M·米夏克指出：“70年代经济失去平衡的另一个起因存在于经济政策的错误之中，概括地讲，是掌握国家事务的人们藐视经济规律。这突出地表现在70年代的后半期，虽然当时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的社会混乱已经给人们提出了警告性信号，但他们还是不作自我检讨，也没有改变方针（1976年曾宣布了对付形势的措施，但只作了半途而废的尝试）。尽管70年代上半期对经济改革曾无知地大加吹擂，但还是没有实行。”②

波兰国内外的观察家都认为，1976年的拉多姆事件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盖莱克政权从这次事件中认真汲取教训，检查政策和战略，并迅速作出修改，很可能不致出现1980年那样巨大而猛烈的危

① 见《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一书第7章《我们的国家》，拉科夫斯基著，1981年波文版。

② M·米夏克：《波兰经济发展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波兰《问题与资料》1984年第26期。

机。然而，盖莱克对待这次事件的严厉态度，不仅使改革的幻想破灭，而且使他本人走上了哥穆尔卡的道路。

波兰的历次危机都有类似之处。这次拉多姆事件也不例外。

1976年6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总理雅多谢维奇向议会提交了“部长会议关于对零售价格作出某些修改和对社会补贴原则的建议”，议会没有进行讨论便得到“通过”。只有一个议员巴比乌赫（当时任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议员团和非党议员的授权”对政府的建议作了“积极的评价”，接着议会表示支持政府的建议，指示同工厂职工、机关和乡镇代表进行“磋商”，并把磋商情况向议会提出报告。

普遍的感觉是：“磋商”仅仅是掩饰已经作出的决定的一片障目的树叶。政府已准备在星期日（27日）开始执行，连新的标价卡片都早已印好，社会上都知道这一事实。人们把“磋商”看成是制造民主假象的官僚主义行动。

星期四下午，雅罗谢维奇发表电视讲话，讲话介绍了“在贯彻执行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战略中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但紧接着又说，居民实际收

入和价格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食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必要的变化。政府表示，价格改革的出发点是，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据讲话中提出的补贴表，预定给收入最少的人20%的补贴，给收入最高的人的补贴不超过10%。按绝对数来看，收入在1500兹罗提以下的人给补贴300兹罗提。收入为5000或6000兹罗提以上的人给500兹罗提。调价情况是，肉价平均上涨69%，黄油上涨50%，食糖上涨100%。

然而，仅仅在总理讲话的24小时后，他本人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并且垂头丧气地向社会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他说："我们向社会和整个社会提出的办法草案，只是一个建议，而不是最后决定。我们只能根据讨论的过程和结果，根据劳动人民对待这些问题和对待这一草案的态度来作决定。"

"根据讨论的过程和结果"是假的，"根据劳动人民对待这些问题和对待这一草案的态度"则是确实的。政府撤回涨价决定，是拉多姆以及乌尔苏斯、普沃茨克等地群众自发抗议和斗争的结果。

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通报，在6月25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急躁的忧虑生活前景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些厂出现了妇女集体痛哭的

场面，另一些工厂出现了中断工作的情况，也出现了放弃党证和工会证的情况。有这样一些说法："'这是一个如此破产的波兰'，'哪里有正义？'"'我们靠农奴制的面包来生活'。个别工人认为，只有施加坚决的压力（也就是罢工）才能正确地解决价格问题。人们不相信磋商的结果会带来什么变化，认为一切都已经事先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中的调门越来越高，有一些咄咄逼人的讲话，出现了敌对性的标语。大家期待广播和电视会对今天的事件表态"。

星期五早上7点，拉多姆地区的"瓦尔太尔将军"五金工厂的工人中断工作，一部分人到其他车间鼓动罢工。工人们开始聚集在工厂的广场上，不论是广播还是厂长的讲话都阻止不了工人的集会。8点至9点之间，有1000多人走出工厂大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邻近的工厂宣传罢工要求和寻找支持。

游行队伍向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拉多姆省委所在地出发。他们喊着口号："不要涨价！""我们是饥饿者！""我们要自由，要面包！"10点钟左右，大约有2000多人聚集在省委大楼前。他们没有推选出什么头头，完全是自发地在等待。

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引起地方当局的不安。省

委第一书记耶日·普罗科皮亚克试图向人群发表讲话，但被打断了。当一部分人涌进省委大楼并有人开始破坏建筑设施（如食堂和厨房）时，省委机关的人根据中央的指示从省委大楼撤离了。与之同时，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正在奔赴拉多姆的途中。14点30分，第一批警察进入行动。

5年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是这样说明拉多姆事件的经过的：

"……工厂职工中某一部分人放弃工作具有自发的性质，是反对日益艰难的生活条件和反对提高物价的真正的工人的抗议，也是对突然袭击和虚假的磋商，对政府提出的不公正的补贴办法（给收入最低的人以最少的补贴）的一种反应，在人群集聚的第一阶段，在行动的自发性和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上述问题作任何求实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

从10点到14点30分，人群的组成不断出现变化。可以说，10点时在省委大楼前集聚起来的人大多数是拉多姆各工厂的男女职工。他们进行自发的无组织的示威，要求取消涨价。但是，那个时候，由于集会的环境和目的而不断加温的激动情绪占了上风，有一些人和小集团在鼓动集会者采取使形势尖锐化的行动。

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很大一部分先来的人离开

集会场所回工厂和回家了。在下午，偶尔有些人来到省委大楼前的人群中，他们消极地观察事件的进程，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同时在人群中也出现了一些活动积极的人，还有许多由年轻男人形成的新的小集团参加进来。他们利用形势，大喊大叫。接着采取了具有犯罪性质的破坏活动，直至在城市中心纵火和破坏。

真正的工人抗议变成了犯罪闹事。对此，这些小集团中最活跃的肇事者应负有责任。这基本上是由非工人分子引起的和进行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拉多姆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从一早开始就采取了一切可能的行动，以便控制出现的局势。对集会的人群采取了心平气和与讲求方式的态度，表示出善意和对话的愿望。但这些均未带来任何效果。省委的活动扭转不了不利的情绪，因为要撤销涨价的决定，这不是省委职权范围内的事。

当人群开始破坏活动时，省委书记们撤离了省委大楼。

这时在省委大楼内外还没有警察。波兰统一工人党委领导认为还能够控制和缓和冲突的局势，没有调动维持治安力量，也没有置身于警察的保护之下。一直到14点30分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省委大楼

内外人群的行动。只是在火烧大楼之后，警察部队开始了行动……

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民警和警察部队均未携带武器，只有警棍、头盔、盾牌和催泪弹。下了明确的指示，只能进行自卫活动，只有在形势需要时才可以采取使用必要手段驱散人群的行动。这种行动在14点30分开始了。”①

同一天，在波兰的十几个省份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抗议、罢工和集会。三个地方发生了街头冲突。在乌尔苏斯，全体职工罢工了，其中一部分人在附近的火车站拦截火车，破坏和燃烧路轨。当局方面开始时“有意识地没采取警察行动，尽管后来还是动用了警察”。在普沃茨克，傍晚有人试图组织示威，“显然由于警察的动作迅速，示威活动被驱散了。”

“警察行动”已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动作迅速”。据官方审查过的报道说：“警方人员的干预没有超过可允许的界限和方法，但是考虑到一部分冲突参加者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在挑衅的情况下警方人员进行了长达11小时的行动，不排除他们狠狠地殴打了事件的某些参加者，也不排除对无辜者的损害。尽管警方人员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指向事件

① 见《十二月纪行》附录。

的偶然参加者，但街头冲突的范围可能使他们的行动涉及到一些偶然地处于出事地点而未表现出积极参与事件的意愿的人……”

尽管拉多姆事件迫使政府不得不立即撤销了涨价决定，但丝毫没有改变领导人的错误看法。在被迫取消涨价方案的同时，波兰统一工人党立即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声讨”和“惩罚”“闹事者”的运动。

6月26日，星期六，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中央书记巴比乌赫和希德拉克，主持召开了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电话工作会议，布置了“谴责”拉多姆人的工作。

盖莱克谈到了中央撤销涨价决定的考虑：

“考虑到整个局势，我决定（这也同讲过的话相符合）这是一次磋商，今后是否作出调价的决定，要看磋商的结果。我向政治局建议，由总理发表讲话并指出推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制定整个的方案。我们以为，这是最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如果我们在还不能说服所有的人之前，就用强力去贯彻执行，那将是不正确的。这里我不是指要说服那些流氓分子、敌对分子，我是指发生罢工的工厂中那些正直和软弱的人们，他们或者受到了压力，或者不了解问题的实质。”

那么，在最近几小时和最近几天内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他对省委书记们说：“应从昨天的事件中得出结论。这不是失败，但也不能说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把昨天变成我们的胜利。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明天和星期一在各省举行群众性集会，有成千上万参加的、有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参加的集会。这必须是由善良的人们组成的集会，必须是有非党人士参加的集会。在集会上同志们可以根据准备好的材料讲我们的决定和建议的正确性。你们可以讲，你们不支持流氓活动的方式方法，不支持把小集团的意志强加给工人阶级，强加给大多数人民的方式方法。”

盖莱克不仅用“流氓活动”为拉多姆事件定了调，而且利用了一个可以称心如意地迫使波兰公众和舆论屈从的理由。他说：

“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就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你们最了解我们作出这项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你们知道，同波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人民幸福的思想照耀着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允许国内最落后的人们，冒险分子和挑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此外我们还必须武装我们的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党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办不到这一点，那末我们在这个世界

上，在国际运动中取得的巨大威望必将付诸东流。人们将说我们是吵闹不休的民族，为了自身的小利而牺牲祖国的大利。在国内，反动派将感到巨大的快乐，流氓和不守纪律的人将拍手称快。我不想细说了，请你们想一想，并在明天和星期一举行强大的集会，支持这一重大的主张，支持对国家的民主领导，谴责一切不负责任的使国家倒退的闹事行为……。”

中央领导人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尤其要对拉多姆人采取严厉态度，实行“特别教育”，使之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盖莱克是这样指示的：

“应当把拉多姆居民召集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评价告诉他们。他们是怎样教育子女的。他们是怎样危害波兰的！简而言之，要让拉多姆人感到整个波兰都对他们意见纷纷，整个波兰要长久地记住他们干的事。我想，如果没有这种谴责，如果没有我讲到的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就达不到目的，就不能把这件事变为我们的胜利。”

中央书记巴比乌赫指示了具体的步骤：

“……在参加罢工行动的职工中，健康的部分首先要自己站出来，声讨挑衅者、策划者和教唆者。如果工厂内部没有足够的力量，那末就从外部

派党的积极分子去支援，以便利用昨天的事件清除所有的病患。事件向我们表明，人民的态度是好的，全党的态度是健康的，例外是少数。现在要对那些不称职的党员进行清算，清洗我们的队伍，使其秩序井然。现阶段的问题是，要把昨天的事件变成对第一书记、对党、对中央、对政府和对总理的支持。”

从电话会议的进程和此后由中央组织部发给地方的宣传提纲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工厂中开除不负责任分子”，“必须造成一种人人指责他们是有罪的羔羊的气氛”，对那些参加罢工和闹事最积极的人“还要在下周公开地当众宣布开除工厂，明确指出他们被解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人尊严的根本原则”。集会的口号是，“盖莱克同志，我们同你在一起！”

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各地连续召开了群众集会。报刊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对48个省的集会大肆作了报道。正如马里安·杜尔斯指出的那样，“这些集会。例如在‘十年’体育场举行的首都集会，是匆匆忙忙在压力气氛下导演出来的。”

按照计划，拉多姆的集会晚举行了两天。这是一次谴责的集会和“赎罪”的集会。有几个邻省代表团参加，借以表明拉多姆人第一是孤立的，第二

是不成熟的。集会在“拉多姆人”俱乐部的广场上举行，悬挂在主席台上的横幅表明了集会的主导思想：“用行动改正我们的错误和过失”。“那些人使我们感到耻辱”，“盖莱克同志，我们竭尽所能重新获得你的信任。”

为读者早已熟悉的那种论调在这次集会上再度出现。在大会上有人指责说，想象不到1976年工资增长比上一年高出20%的“瓦尔太尔将军”工厂的工人竟首先闹事！想象不到第六车间会成为抗议的倡导者，因为那里的平均工资已超过了4000兹罗提！

拉多姆集会是波兰唯一没有通过“神圣的决议”的集会。有人说，“拉多姆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国家不期待我们的言词，不期待赔礼道歉，而期待我们为良好声誉而进行劳动的愿望……”

对拉多姆人进行惩罚和迫害的程度已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这次事件后，当局先后对676人进行了拘捕和审判，对939人实行解雇，对许多人实行降职降薪。中央政府甚至还对拉多姆实行了经济惩罚，比如减少对拉多姆地区的商品供应等等。

马·杜尔斯基指出：“1976年6月暴露了波兰国家和社会结构在活动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1976年6月揭开了社会生活的帷幕，暴露了政权和

社会的关系上的演戏作风*。1976年6月肯定了把党和政府混为一体所带来的损害，肯定了剥夺（地方）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的自主性和责任性所带来的损害。1976年6月对党和人民政权是一次最后的严重警告。遗憾的是，除了决定立即撤销错误的草案外，党没有在活动的方法、执政的方法、与社会相处的方法、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相处的方法等方面作出结论，以致1980年夏爆发了危机。”他称1976年6月的拉多姆事件为通向1980年8月危机的“桥梁”。①

拉多姆事件以及盖莱克当局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表明这一政权已经脱离了人民。对最高领导人的敬畏和神化，政治上的专制和无情，社会宣传工具的一律性，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承袭……无一不显示出盖莱克政权又走入危机的轨道。

德·米利伏耶维奇观察到，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的文化生活开始变得日益贫乏和拘谨。许

---

* “演戏作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概念。这里有一个极典型的事例：1978年，盖莱克会见什切青造船厂工人。原定在13时会见，11时就把人们赶到大厅里进行迎接尊贵来宾的总演习。演习时高呼口号，规定了何时应当鼓掌，等等。而仅仅是在8年前，盖莱克在这个工厂还同工人们有过真正直接的和不加排演的对话，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① 1981年第26、27期《政治》周刊。

多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的名字逐渐从报纸上、从书店橱窗里消失了。对文化生活拥有监督权的机构增多了。比如，报刊影剧检查总署拥有广泛的权限。实际上，存在着不能同党报《人民论坛报》和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新路》进行任何争论的禁令。在许多情况下，50年代记者活动的那种方法又故态复萌了。电视广播里出现的尽是颂扬成就的节目，变成了不断开工的奶牛场、家禽场等等的联欢会和剪彩仪式。对作品实行严格检查的作法，使许多作家同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一度使舆论生活富有特色的广泛的讨论活动也减少了。并非偶然的是，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报刊、广播和电视部在70年代明显加强了对记者们的指令作用和对整个新闻界的监督作用。该机构人数越来越多，其工作人员对各种刊物编辑部提出要付印的文章进行检查，把他们所不喜欢的内容删去，对记者的出国要求，编辑部领导成员的更换作出指示，甚至对某个政治家的照片或介绍他的文章登在什么位置都要发表意见，70年代中期，在新闻媒介的管理政策中，还有一种防止国际事件对国内影响的规定。比如，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波兰公众还不知道水门丑闻事件，因为怕人们得出结论。报刊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报道一条新闻就会推翻最高当局。在处理伊朗事件

的报道上也是一样，报纸编辑获得指示，要他们在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时注意分寸。因为，某些情况，如宗教运动的力量和规模，国王的威望下降，警察驱散人群，等等，可能会引起波兰公众的联想。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两类出版活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一些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油印、复制）公诸于世，人们互相传阅，以逃避检查。

一些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家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某些留在国内的人自称为“叛逆者”。他们编写宣言、请愿书，以尖锐的批评反对政府。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反对共产党的人。出现了著名的“叛逆者”小组。其名称为“KOR”（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同党的领导和政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在1976年底出现的。它的主要人物是雅·库龙和阿·米赫尼克。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著名小说《灰与金钢钻》的作者耶日·安哲耶夫斯基，经济学界元老爱德华·利宾斯基和著名女演员哈丽娜·米科瓦伊斯卡等。按照其成员的说法，该委员会主要是在作家、演员和科学家圈子里为拉多姆事件的受害工人募捐。然而这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反对派。它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各种刊

物、公报、报告、纲领、呼吁书、号召书等等，它的观点和见解被“自由欧洲”电台广为传播，所刊载的文章、杂文、小品所涉及的，正是人们在休息室、在同事和家庭聚会时所关注的问题，而它们恰恰采取了与官方宣传不同的批判和否定态度。

在1976年和1977年这段时间，还形成了“自由出版运动”、“学生团结委员会”等组织，自发而又自觉地与当局对抗。并且，这种抵抗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根据某些波兰社会学家的研究，从这时起，知识分子、工人团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反对力量在斗争形式方面已与以往有根本的区别。1956年以后零星爆发的抵制和抗议，往往采取把事情诉诸当局的善意的形式。指望通过领导人态度的转变解决问题；从拉多姆事件之后，反对派不再采取这种斗争形式，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组织。从另一方面看、客观条件对这种变化也是有利的。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减少，国家越来越趋于回到严格的社会等级制模式上，由于人民群众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那种在盖莱克当政初期曾经有过的合作和支持的愿望逐渐消失，而趋于接近反对派的立场。

有的波兰学者认为，50年代出生的一代波兰人更推崇社会自由，并喜欢追求真正的个人目标。他

们是在“政治沉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时还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在那个时期，参与政治，意味着参加到现有体制一边。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新的政治观逐渐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头脑中形成。在“不介入政治”的冷漠表面深处，隐藏着对现制度、现政权及其保守的意识形态说教的强烈批判意识，他们具有独立的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如果说这些人中间很大一部分是所谓“反对派”的话，那末，这种反对派与某些政治上敌视和拒绝社会主义的力量不同。第一它是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并且竭力要求维护宪法中明文记载的权利，第二它希望依靠有组织的方式（独立工会、自治联盟及各种社团等等）更强有力地显示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愿望。它解释了80年代初危机之剧烈、深刻和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反对派”的主要目标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培养新的民族意识；

——创造独立的社会联系和结构；

——提倡独立的文化生活及政治与哲学的探讨；

——培养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超群人物；

——加快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实践的演变。

独立的、反抗的、批判的意识在知识界、创作界中日益成长，知识分子向着他们的传统的不与当局妥协的文化心理结构认同。譬如说，波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摆脱了权力结构的束缚，向着实证的、精细的和独立的分析方向迈进。它不仅与当代国际研究途径接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波兰现代已有过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回归。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指的是从1976年拉多姆事件到1980年夏之前的时期——教会在波兰社会中潜移默化产生的、改变现政权结构的巨大影响。

教皇在1979年6月对波兰——他自己的祖国——的访问，看上去既是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又是平静的，无碍于现政权的。当他走下飞机后，便吻着故乡的胸膛，开始了自己的庄严隆重的祖国之行。迎接他的是众多的教徒们，参加露天弥撒的人数达两百万之多。在波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领袖，能够象他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听众。在华沙，在克拉科夫，在琴希托霍瓦，在教皇所到的任何地方，人们象潮水一般地淹没了街道、广场和路边的空地。这是给人印

象极为深刻的景观。尽管过去人们也都知道，波兰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天主教的国家，教会拥有巨大的影响，但这一次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天主教行列，是教会力量的有力展示。

教皇会见了波兰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教会承认现政权，甚至会帮助它，并表示希望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其他权利。

教皇在对信徒们发表演说时指出，波兰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为它工作。并告诫教徒们，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将在这里，在波兰，在欧洲中部的这块土地上，而不是在西方，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教皇走遍了全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随即离开了。一切都很有秩序地、平静地度过了，没有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和不正常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看出教皇的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从教士们和信徒们的举止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会感到自己更强大、更自信，也更有吸引力了。这不仅反映在教士们的传教中，而且反映在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及他们提出的某些要求中。

实际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会及教士们填补了一个真空，一个存在于波兰千千万万普通人心目中的真空。这个真空是由现政权、由现政

权执政的方法及维持这种方法的保守过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波兰教会的力量在于，它不要求人们直接地与现政权对抗，它甚至鼓励人们勤勉地工作，它与当局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它在社会上享有着合法的地位。但是，它以宗教学说填补了虚伪的政治宣传，安抚着现体制的牺牲受害者，申张着在许多波兰人看来是正义的和道义的声音。一方面是现政权的专制、无能和镇压，一方面是教会的清廉、谨慎和守法，这使得教会取代党和国家成为波兰人民的精神领袖和道义支柱。旧的偶象坍塌的另一面是新的神灵的张扬。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教皇离开波兰的前夕，克拉科夫的大学生在亚当·密茨凯维支纪念碑的下部基座上贴了一条标语："圣父，请您让我们的祖国成为真正自由、平等的人的国家吧！"

盖莱克政权的危机是无法避免的。

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已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确，盖莱克最初也是想避免危机，避免同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对抗的。在这个体制建立时，它为发展社会经济曾作了重要的努力。但是，由于从根本上讲它的制度方式本身——特别是它的政治体制、管理方式和意识形态——没有作任何改变，逐渐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与人民对立并

且镇压批评者，最终仍然没有逃脱危机和毁灭的厄运。

问题出在体制上。正是这种体制，使一个开始试图与人民共处和合作的政府，一个看上去具有“现代意识”的不坏的领导者，最后变成人民的对手，为人民所否定和抛弃。

布鲁斯教授认为，这种发源于30年代的苏联的旧的体制，其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大一统专政”上（totaliayian dicta torohip），主要内容是：

——相对于正式选举所选出的国家行政、工会、党等等机关来说，中央决策者和“执行机构”处于优势地位；

——选举完全形式化、候选人是指派的，上级机关分别任命党、国家、工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决定各种机构的设立；

——“党的领导作用”意味着通过完全控制人事政策，禁止一切独立的政治活动和未经许可的结社等等，使其他一切制度上的机关从属于党的机构；

——通过“人事”的控制和全面的事前检查这两方面，对宣传媒介实行彻底的垄断。①

① 参见布鲁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两书中的有关论述。

"大一统专政"保证了政策的推行，同时也造成了群众与当局的对立。因此，社会的每个成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无明确的自我表现，不具有统制力和组织性，完全没有政治的或者合法的可能性）与领导阶层视为对体制的职能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即在一切方面握有决定权的国家）相对立。

布鲁斯深刻地指出，对于波兰人民来说，今天这种形式的体制并没有满足他们曾经有的希望，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一，"公有制并没有成为社会所有制，因为，在统治的状况下，国家决没有代表社会、社会利益和社会意志"；第二、"这个事实，对切合实际地利用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可能来说，成了最大障碍。"波兰长期的、循环往复的危机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后果。"如果必须打破现在的循环论证、达到可以满足扩大的居民需求的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那末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就是必要的。这种变化必须是能够为了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创造条件。"①

在没有改变旧的"大一统专政"之前，危机是无法摆脱的。

①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第150页。

第九章

“团结工会”的兴亡

"秩序支配着华沙，但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罗莎·卢森堡

"我们的民族象座火山，
表面上又冷，又硬，又平静，又凝固，
但是它里面的火始终燃烧千百年"

——亚当·密茨凯维兹

1980年夏天爆发的波兰危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是世界各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对于波兰人民来说，这次规模空前、极其深刻的危机，是他们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对于统治了波兰几十年，有过不同形式的那个体制，这场危机则是一次无比强大的打击。独立的"团结工会"的出现，是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它包含着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严重意义。团结工会的兴起、壮大直到失败和被取缔的过程，构成了那个体制的长久的、痛苦的、然而孕育着希望的"阵痛"的一部

分。

波兰历次危机的爆发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以价格上涨为导火线；而每一次引发危机的涨价，首先又是肉价的提高。肉的问题成为波兰社会的一个敏感点。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将“特种肉店”（其价格比普通肉店高，但供应比较充分）的去骨牛肉、肘子肉、肋条肉、熏肉、鸭肉和某些鸡肉等所谓出口肉类的价格提高40—60%。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波兰东南部热舒夫省的小城市米耶莱茨的一家交通设备厂首先举行了罢工。工人们要求厂方对物价上涨给予补贴。

大危机的第一阶段由此而开始。在这一阶段中，直接经济性的要求占据主导地位，罢工和抗议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以往的形式。

7月2日，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近半数的职工罢工，抗议政府提高肉价，要求厂方增加工资以补偿损失。在华沙钢厂以及罗兹、特切夫等地的一些工厂，也发生了局部性罢工。

7月4日，罢工发展到弗罗兹瓦夫石油化工厂，以及什切青和沿海的“三联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的某些工厂企业。华沙部分电车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7月11日，罢工浪潮波及到卢布林的21家工厂，以及日伊腊尔杜夫、希莱姆、波兹南、东布罗瓦——古尔尼查、格鲁琼次、皮亚塞希诺和华沙的一些工厂。这一天，反对派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表声明，其中说，由于罢工，已有33家工厂答应给工人提高工资10%。

7月16日，临近波苏边界的卢布林市的工厂、城市企业和铁路局的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者封锁了卢布林的铁路线，整个城市运输系统和其他服务行业陷于瘫痪。罢工工人要求当局把给工人的家庭补贴增加到与民警、军人的同等水平，保证对罢工工人不进行报复和重新选举工会等等。卢布林铁路工人的罢工行动，使铁路交通、包括与苏联的铁路联系中断了4天。7月19日，卢布林罢工工人同以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谈判并达成协议。工人们在当局答应增加工资后，结束了罢工。

各地看到如些情景，也纷纷仿效。海乌姆克拉希尼科的一些工厂以及“钢铁意志”炼钢厂工人举行了罢工。

7月20日，波兰“农民自卫委员会”、“独立农民联盟”和各个独立的农民刊物编辑部联合向罢工工人发出呼吁书，号召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并声明，“作为农民，我们完全声援你们工人并支持你

们的要求。”

7月21日，华沙分送报刊的货车司机罢工。奥斯特洛沃和“钢铁意志”炼钢厂的罢工仍在继续，工人们提出了改变现工会组成的要求。为防止发生新的罢工事件，当局预先答应给托伦和比亚威斯托克的某些工厂的工人增加工资。

8月10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自7月1日以来，全国已有150起罢工事件，声明还说：“目前罢工力量之所以强大，在于组织得好和团结一致”。

8月12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乌卡谢维奇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罢工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成为战后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工业动乱。目前罢工仍在继续发展。他说，罢工不是政治性的，不会使政治发生任何根本变化。

8月13日，波党华沙省委举行全会，讨论华沙省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全会呼吁同工人自治委员会进行“公开坦率的讨论。”

我们已经指出，在第一阶段的罢工浪潮中，罢工带有明显的经济性质，运动缺乏整体组织性，而且各地罢工时起时伏；最重要的，是工人们仍然象以往斗争时那样，更多地指望上面的“善意”。从8月中旬以后，斗争进入了新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

的主要特点是：最强大的工业地区、最重要的工厂企业率头举行了连续的、长时间的罢工。工人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并聚拢在它的周围，明确提出了成立独立的和自治的工会的要求。从这时起，罢工工人的注意力不再是光放在经济方面，而是鲜明地向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要求。第二阶段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8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16000名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推选莱赫·瓦文萨担任委员会领导。罢工委员会向厂方提出了解散现工会，成立自由工会，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建立纪念碑，保证罢工工人安全、增加工资、家庭补贴、抚恤金，恢复过去因罢工被开除的工人的公职等要求。但是，厂方只答应了恢复瓦文萨和女工安娜·瓦伦蒂诺维奇两人的公职、建造纪念碑和保证安全这三项要求。

罢工委员会坚持斗争，并得到各地工人的响应。当日晚，格但斯克省委召开全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尼亚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格但斯克的局势。海军上将杨钦森在会上表示，军队对切断罢工委员会同社会的联系无能为力。

形势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第一阶段的罢工并没有发展成全社会性的。

比如首都的居民在看到停驶的电车和公共汽车的时候，还多少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好奇心。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外部信号。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经济情况不妙。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糟，商店门前的队伍已越来越长。但真正了解这场危机深度的人还为数不多。“电视上还是一片乐观景象，小车走得很好，牛肥马壮，人心舒畅。只是自然灾害、暴风和洪水在和波兰作对，给全国人民的奋斗带来干扰。然而，在某些报刊上，一些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里，时而也出现了诸如‘不平衡’、‘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等字样，还谈论起什么‘失调’等等。不过这些警告却都是用一层豪言壮语的软垫包裹着的。”① 由于卢布林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才使得波兰全国紧张起来。在全国各地，人们从小道消息中得知，谁罢工，谁就能多拿钱。这当然是为罢工作了宣传。到处都知道，在某些工厂罢工之后，职工们选出了新的代表，罢工委员会并没有解散。

全国各地的各种反映和消息也传到了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并且在这里遇到了特别适合的

① 见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和莱赫·斯泰凡斯基著：《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原名《格但斯克1980年8月事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土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人们对“十二月事件”记忆犹新。围绕这个主题几乎产生了一套工人神话，而且生动得很。人们在悄悄的有时是大声的议论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要为死难的造船工人建立一座纪念碑。可是“上头”却千方百计地想使人们忘却那次事件。1976年，造船厂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罢工，尽管当时社会谈论得更多的是拉多姆。沿海地区一直有自由工会的萌芽（当然是非法的）在活动。参加自由工会组织和领导的有几个原先是“列宁”造船厂的工人，那年罢工之后他们被开除出厂并且遭到迫害。他们的遭遇是造船工人都很熟悉的。它激起的反应是“一种愤怒、同情和恐惧的混合物”。

沿海地区还是“青年波兰运动”的全国中心之一。很少有人对这个尚属非法的组织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是它的活动也引起了一种猜测和期待：“要出事”。在沿海地区，包括造船工人中间，流传着各种地下出版的传单、印刷品和刊物。格但斯克同全国一样，肉类供应不足，尤其是肉类。但另一方面，在这里可以更多地见到来自那些没有肉类供应紧张和诸如此类麻烦的国家的旅游者和海员。通过这个“观察世界的窗口”，看到的东西比在波兰其他地方要多得多。

瓦文萨和安娜·瓦伦腾诺维奇原先都是“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这次格但斯克掀起的风暴中，这两个人——尤其是前者——成为一个巨大的风口。

莱赫·瓦文萨，时年37岁，是6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孩子是在罢工爆发前一个星期，即瓦文萨还在押的时候出世的。他是一个电气安装工，后来又干过汽车电工。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位身高仅1.6米、蓄着一把特大的上唇胡子的工人，在几个月以后，将成为世界的知名人物，而在此之前认识他的人并没有多少。甚至可以说，当时在“列宁厂”他还远没有安娜·瓦伦腾诺维奇有名。他的同事之一、电工斯坦尼斯瓦夫·莱弗涅夫斯基（他在“列宁厂”工作了17年，其中有8年与瓦文萨共事）说：“我深信，他永远不会骄傲自大。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完全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瓦文萨是1970年12月罢工委员会以及“沿海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曾先后12次被捕，并被造船厂解雇。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为人和经历，1980年夏天之后，罢工工人们推选他为自己的领导人。

女工瓦伦腾诺维奇在造船厂工作了30年。开头是个焊工，后来又当过天车司机。在50年代，她是劳动模范。有一回，她在生产会议上发言，批评了

一些现象。从那以后，她和领导的关系就不好了。1968年，有一个工会干部挪用3000兹罗提的补助费去买彩票，结果输掉了。瓦伦腾诺维奇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揭发这件事，于是她所在的车间工会干部建议将她解雇。职工们不答应，但她被调到另一个车间。1970年占领性罢工的时候，她在船厂食堂工作。1971年1月，她被选为职工代表去见盖莱克。后来几年中，她一直为此遭到不断的迫害和打击，几次被调动了工作。1979年她担任了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成员。1980年夏天，她被厂方开除。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不受上面欢迎而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罢工由格但斯克迅速扩展开来，造船厂停工了，港口停止接待外国船只，国内运输也停顿了。

可以明显地感到，由“列宁”造船厂发动的新的一轮罢工斗争与以往任何罢工有本质的区别。工人们没有走上街头，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冲突，没有造成牺牲，他们没有给任何人以过去那样的指责借口。罢工工人在自己工厂的范围内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它领导罢工并负责维持秩序。它下令禁止喝酒，建立了罢工纠察队。它自己保护工厂的财产和设备，防止罢工期间发生挑衅事件。尽管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造船厂很大，有几公里长的围墙，

几个大门，还有吊车、生产车间、船坞、船体以及正在保修的船只，等等，这些都是工人们必须照看的。罢工者们汲取了以往斗争的教训，没有上街示威。而是安静地却又是坚定地停了工，在工厂里申诉自己的要求。

随着全国性罢工的铺开，社会气氛逐渐变化，“正式的”工会已无人理睬，各种官方的报道失去了信誉，行政机构正在失灵。与此同时，罢工委员会成为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大量的小报、刊物纷纷出现，上面登出了那些曾经处于地下的、非法的组织和团体的申诉和要求。工厂、机关和广场成了工人，各阶层居民的批评场所。

是什么事情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指责呢？

关于工资和收入问题议论得很多。过去在党政机关的所有报告中，通常是引用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数字。在波兰，1980年前8个月的平均工资是5397兹罗提，确实比上一年多297兹罗提。但是，稍加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平均数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差距和不平等。实际中有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多十几倍的现象。比如，经济部门中的最低工资为2000兹罗提，教师的中等水平为4590兹罗提，工人为3500至7000兹罗提，工程师为6900兹罗提，医生为8309兹罗提，而一些联合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的工

资为28000至30000兹罗提。

尤其令人们震惊和愤怒的是那些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巨额收入的人的行为：

有一个合作社的经理，为自己领取了40万兹罗提的巨额奖金，而这个合作社当时已给国家留下了8000万兹罗提的亏损和债务。

波兰“米涅克斯”公司的总经理、外贸部长负责进口投资装备的全权代表卡齐米日·蒂兰斯基，在同外国商行洽谈业务的过程中，接受了巨额贿赂。他从奥地利一家商行获得46万美元，从瑞典一个康采恩得到25万美元，而给自己企业带来的损失分别为47.3万马克和31.1万美元。他的妻子塔莱莎·蒂兰斯卡也参与了他在国外搞的大量肮脏勾当。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国会议员、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马·什切潘斯基拥有巨大的非法获来的财富，包括私人快艇、7辆小轿车、住宅和别墅，并在国外购置私人财产。他滥用职权，滥用外汇和耗费人力。任意到世界各地旅游，并且在波兰各地招待自己的外国客人。他在国外建立了业务分支机构，从中捞取无数好处。他还以签订共同生产、联播电影片的合同的方式，接受大量巨额贿赂，仅一次就从外国银行那里弄到150万美元。

……

尽管这些人中有一些受到了处理（例如，马什切潘斯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剥夺议员豁免权，由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但人们却不宽恕造成这种犯罪和吸血现象的体制。一位中央委员、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段长杨·拉贝茨基在中央全会上对一种现象表示惊讶，即马·什切潘斯基事件揭出后，人们一下子就能找出那么多证据来反对他，而在此之前，却任何蛛丝马迹也未曾察觉。他说，其实，“这样的什切潘斯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工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对那些握有很大权力的官员进行检查。看看他们是否“干净”，然后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这不是对个人的怀疑，而是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怀疑。人们怀疑这种机构已发展成为特权体系，使干部变质了。正如德·米利伏耶维奇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种犯罪行为只能在享有高级特权的官僚主义者的圈子里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享有巨大特权使用社会财富，而不受任何监督。”①

罢工者关心的并非只是工资、社会差别和物质问题，他们也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议论某些“铁腕”人物如何善于“收拾”那些不满的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人们广泛议论的著名科学家布诺佐夫

① 《波兰在十字路口》，第144页。

斯基教授是一个塑料方面的专家，10项专利和发明的领取者，其中一项曾获得1975年日内瓦奖章，一度成为世界驰名的人物。但是，当他所在的化学研究所换了新领导之后，据说是布诺佐夫斯基如何不服从新领导，于是“头儿”决定收拾他一下，把他调到一个建筑研究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进行那些有发展前途的研究工作了。尽管工会对此提出了异议，尽管报纸也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情况并没有改变。

另一件广泛议论的事情是，在1970年12月事件后，经职工选举担任工会干部职务的工人活动分子成了打击报复的对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试图撤销积极参与组织罢工的格斯克造船厂5号车间的爱德华·诺维茨基的车间工会主席的职务。根据一份匿名的小报告，他被指控为“领空头工票”，即冒领工资。撤销他的工会职务的动议是由造船厂厂长提出的。问题提到了工人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厂工会主席也支持这个动议。但它遭到了大多数工人的坚决抵制。有十几个工人先后发言，一致为诺维茨基辩护。他们提出了有关诺维茨基的道德品质、工作表现、勇敢精神和为保卫工人利益而从事社会工作的热情等等事例的最好证明。他们指出，关于“领取工票”一事，是在职工和行政领

导知情和赞可的情况下早就实行并且相当普遍的一种做法，是用来补贴被选派担任社会工作的工资的一种办法。人们一致谴责厂领导的居心不良和厂工会的错误倾向，还特别谴责了靠匿名信报告整人的作法。在这次会议上，诺维茨基向与会者出示了几张剪贴得非常蹩脚的色情照片。照片上是他以明确的某种姿态与几个裸体女人在一起。这些照片，连同一些粗俗不堪的注解，被人寄给了诺维茨基的妻子。“十二月事件”后民主选举出来的许多工会干部的家里都收到过类似的信件，而这些剪贴照片的匿名作者始终未被揭露。

类似的讨论和抨击处处可见。各工厂、机关和团体都举行了集会。社会上各阶层、各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发表了意见。

在电影工作者的集会上，著名电影大师安·瓦依达谈到了波兰社会生活中特有的“道德上的精神分裂症”。他说，现在“宣扬道德准则的基调同完全相反的实际作法共存……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个人的安全，我们互相原谅谎言、欺骗和公众中的不法行为，而把诚实、正直和真理埋留在家庭里或者亲朋挚友的圈子里。”

著名社会学家、国会议员杨·什切潘斯基教授在议会的发言中，以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和社会责任

感对波兰的现实作了又一次"诊断"（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他那篇文章的题目——《诊断的尝试》）。他指出：

"可以说，人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走向危机。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和推测中估计到正在到来的危机，只要听一听工人们在工厂，人民群众在商店门前的队列中谈论些什么就足够了。同时，应该认识到，人民很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和经济的状况。可是，政治家们、报刊、广播和电视却不愿谈到这一点。很难设想，那些政治家和记者们在发表谈话和进行公开报道时，会不知道国内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坦率地说，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认为在公开发表文章和谈话时，需要装出一副天真的、一无所知的样子。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必须马上停止。在今天的讨论中，应当针对实质性的东西。这次讨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评价恢复经济的措施，而不是在车轮断裂之后再来卖弄为时已晚的勇敢和聪明。"

他认为，仅仅谈论经济领域的问题是不行的，而政府到现在为止还在这么做。"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就其本身的意识形态来说，是政治对经济实行绝对的控制。我国的经济危机是在政治危机及由它引起的社会冲突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人们知道，

所有那些有关巨额投资的经济决定都是一种政治决定……”

什切潘斯基问道：“波兰是否存在着充满乐观主义的力量？我们是否有可能摆脱危机？”他认为是有的。“我首先是从罢工工人的能力上看到了这种可能。他们在很短时间内用非常成功的方法组织了生活。这种方法可以作为行政机关的样板。我看到，他们在那些没有停止工作的群众的支持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情绪，这样一个事实也增强了我们的乐观情绪。在党内和政府里有英明的人物，他们都能现实地考虑问题，没有允许使用武力，没有使罢工变为象1956年、1970年和1976年那样的流血冲突。人民有意志和信心，人民是会管理的。只要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找到方法发挥人民的意志和能力。”

什切潘斯基对罢工工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在第二阶段时社会各阶层对于罢工者的普遍看法及对政府无能的不满。

“团结工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了同政府谈判的要求。开始时政府拒不接受要求，认为这样的委员会不能成为它的谈判对手。但罢工者没有退让，继续坚持斗争。到8月19日时，加入厂际罢工委员

会的工厂已达235家。罢工浪潮遍及整个沿海地区：埃尔布隆格、什切青、普次克、乌斯特卡、科沃布热克、科希切伊纳、莱姆波尔科、斯伍普斯克、希塔尔加特、比得哥煦……

政府终于被迫答应谈判，先派副总理佩卡，后又派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米·雅盖尔斯基到格但斯克谈判。由于在什切青也建立了这样的广际罢工委员会，政府又派了另一名副总理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去了什切青。这样，就开始了不仅是战后波兰、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不寻常的谈判。

8月22日，格但斯克广际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和内容。这二十一项要求是：

（1）要求按照波兰人民共和国所批准的、关于工会自由的第87号国际劳动组织公约的精神，建立不依赖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者及辅助人员的罢工权利和安全。

（3）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保证的言论、印刷和出版的自由，同时不要镇压独立的出版并向具有各种信仰的代表们提供宣传工具。

（4）A 恢复下列人员的原先的权利：1970年和1976年罢工之后被解雇的人；因信仰而被从大学开

除的大学生。B 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有爱·札特罗日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马·科兹沃夫斯基)。C、取消对信仰的镇压手段。

(5)通过舆论工具发表关于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消息并公布联合罢工委员会的要求。

(6)通过下列办法采取一些目的在于使国家摆脱危机形势的实际步骤:A、公开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情况。B、使社会各界和各阶层都参与讨论修改规划。

(7)发给所有参加罢工的职工们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就象根据工会中央理事规定给休假的职工发工资一样。

(8)将每个职工每月的基本工资增加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的涨价的补偿。

(9)在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时,要保证工资的自动增长。

(10)满足对国内市场食品供应,而出口的食品只能是剩余部分。

(11)取消商品价格(即议价——引注)和所谓的国内收取外汇的销售(其中包括外汇商店——引注)。

(12)根据业务水平、而不是党派关系原则选拔领导干部,并且通过拉平家庭补贴和取消特殊销

售等等来取消民警、公安人员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13）实行肉和肉制品卡片——食品券（直到控制了市场形势时为止）。

（14）把妇女的退休年龄降低到50岁，男子降低到55岁，或者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妇女工作了30年、男子工作了35年以后，不管其年龄大小均可退休。

（15）把在调整工资之前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补到目前所支付的退休金和养老金水平。

（16）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对劳动者的充分的医疗护理。

（17）为劳动妇女的孩子保证托儿所和幼儿园里的相应数量床位。

（18）实行带薪三年产假来抚育孩子。

（19）缩短等待住房的时间。

（20）把出差补贴从40兹罗提增加到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的补贴。

（21）使所有的星期六都不工作，对那些不能离开工作的和四班制的职工所耽误的星期六休息日，应以增加休假时间或其他的带薪的休息日来予以补偿。

在所有这些要求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成立独立的、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工会。罢

工者认识到，不能再恢复到1956年和1970年的那种状况了。当时，在罢工之后便更换了政治领导人，然后，受到信任的新领导又滥用权力，造成新的危机和对工人的迫害。罢工者们很清楚，——正象德·米利伏耶维奇指出的那样——在波兰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撇开党和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党和政府就可能脱离工人阶级及其利益。一位工人对来访的外国人讲：你知道，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人，这是一条定律，波兰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必须防止不受控制的权力。这就是说，工人们想把某种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用它来直接捍卫他们在斗争中获得的利益和权利。显然，工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8月23日，谈判开始，雅盖尔斯基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但对成立自由工会的要求以及罢工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项要求却毫不让步。工人们没有退让和妥协。24日，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团来到格但斯克。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磋商后一致认为，成立自由工会是基本条件，只有当这一条件实现之后才有可能复工。

《人民论坛报》报道说，当局与罢工工人的主要分歧是，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建立独立的自由工会，而政府委员会保证对现有的工会进行改革，使它成为“自治组织”。与此同时，波兰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决定，解除什德拉克中央工会主席和理事职务，任命新治金工会主席扬科夫斯基为主席。

8月2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四中全会。盖莱克在会上承认，目前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和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国家摆脱困境，恢复正常的劳动节奏和社会生活”。为此，必须“使党和国家政策来一个根本转折，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盖莱克还表示，对工会中央理事会要进行“充分民主的、秘密的选举”，并准备就社会问题同罢工工人代表进行谈判，满足其正当要求，但不作“无法兑现的许诺”，不能同意“危害国家生存基础的要求”。全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有4名政治局委员（总理巴比乌赫、工会主席什德拉克、主管宣传工作的乌卡谢维奇、负责经济计划的符热什奇克）和2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组织工作的达罗夫斯基和负责价格与市场管理的佩卡）被解除职务。全会还解除了乌卡谢维奇和达罗夫斯基中央书记

的职务。会议同时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平科夫斯基和中央委员、驻民主德国大使奥尔绍夫斯基（八大以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因与盖莱克有分歧，八大时被搞下台）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奥尔绍夫斯基和沃依塔谢克为中央书记，选举瓦什楚克和热尔斯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一天，国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巴比乌赫被解除总理职务，佩卡和符热什奇克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推选平科夫斯基为总理，基谢尔、科佩奇和格拉布斯基为副总理。同时还解除了外交部长、国家物价委员会主席、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国家统计局局长等政府重要官员的职务，并任命一批新部长。

最高领导的变化并未象以往那样平息工人和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相反，罢工工人由此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只要团结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包括成立自由工会在内的各项条件是有可能满足的，到8月底时，波兰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进一步高涨。许多重要的工厂企业也举行了罢工，其中有“弗罗兹瓦夫”机车车厢制造厂、罗兹的“捷尔任斯基”纺织厂和“马尔赫莱夫斯基”纺织厂。罗兹、弗罗兹瓦夫、瓦乌布日赫、斯伍普斯克、科沙林等城市的交通陷于停顿。这时全国已有4个地区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它们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包

括600多个企业），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包括200多个企业），埃尔布隆格厂际罢工委员会（包括几十个企业）和弗罗兹瓦夫厂际罢工委员会（包括几十个企业）。

以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为中心的罢工斗争得到波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支持。除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形式表示支持外，许多工厂、单位和个人还纷纷派代表到格但斯克等中心地点，或者汇来现金，送上实物，以用作修建“十二月事件遇难者纪念碑”或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基金储备。《政治》周刊记者在当时看到了许多情景，并在文章中作了大量报道。比如，格丁尼亚建筑联合工厂的代表把募捐到的2300兹罗提交给造船工人买粮食。建筑维修工厂的全体工人募集了14087兹罗提。格丁尼亚一些不留姓名的园艺家送到“列宁”造船厂的礼品是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列宁”造船厂罢工工人从8月16日到20日在工厂3号大门前向当地居民募集到161000兹罗提的捐款。一个老战士代表团来到工厂向造船工人捐款，但一定要亲手交给安娜·瓦伦腾诺维奇女士。教师们派代表给罢工工人送去了鲜花。居民们甚至募捐了30公升汽油。波兰汽车和拖拉机销售公司的工人为“列宁厂”募集了1880兹罗提。一位养老金领取者赠给厂际罢工委员会一笔

数额为10万兹罗提的捐款，他说，“我欠我们祖先和牺牲了的战友们这些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古钱币学家从自己的收藏品中献出了一枚象征性的面值50兹罗提的硬币，这枚硬币常给他带来“好运”，他希望也给工人们带来好运。8月30日那天，华沙大学、华沙钢厂、克罗什诺和罗兹的罢工工厂、“台伟”工厂、乌尔苏拖拉机厂工人团结委员会等单位分别派代表团来到格但斯克，声援造船工人。“台伟”工厂的代表还带来了该厂职工捐献的76000兹罗提。克罗什诺7个工厂联合举行了声援性的警告罢工，表示如果政府不答应沿海地区工人的要求，他们将再次罢工。

大学生、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天主教会在这场以工人为主力和核心的罢工运动中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大罢工刚开始时，波兰的大学生们正值假期，不在校内，无法组织起来。但当假期一结束，大学生联合会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会后发表的宣言中，把1980年夏天评价为“还在继续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大学生的态度是：“我们向正在为社会主义理想——自由和正义——而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工人阶级致敬！”宣言认为，这是一场“向党和国家挑战、使任何人都

不敢轻视”的斗争。大学生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首先，他们要求使青年更多地参与制订党的纲领，要求享有评价党对青年问题的决议的权力，要求在一切代表机构中有更大的代表性，以及实行各级领导干部轮换的原则。他们特别批评了现行的教育制度，因为，这种教育制度“没有保证加深知识，相应的价值标准以及年青一代的德育和美育的真正内容”。大学生们还认为，应当建立新的大学生组织章程。

9月初，波兰记者协会决定退出工会中央理事会，并作出成立独立工会的临时决定。波兰科学院等112个教育、科技机构也在筹备成立独立大会。波兰作协发表声明，主张由整个创作界选举产生一个有特殊权力的文化委员会，来准备“共同参加民族革新事业”。9月12日。波兰127个科学、教育、研究机构召开联合会议，宣布成立波兰科学技术和职工教育自治工会。

波兰独立农民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在8月底也向政府提出9项要求，其中包括：国家政权尊重农民加入该委员会的权利，参与确定农产品价格；在个体农户生产资料供应和贷款提供上应该同国营农场和合作社权利平等；提高农场工人和个体农户的工资和福利等。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积极姿态，与工人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最明显的事例之一，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设立的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们是应罢工工人的邀请前来帮助起草各种文件、宣言、公告，呼吁书，以及设计各种方案，对有关法律、经济和外交问题提出建议，帮助工人们解决有关技术性难题和提供咨询，了解社会和国外各种动态和反映，及时正确地制定行动方针和具体措施。专家组组长是宗教月刊《联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专家组成员有：历史学家、副教授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政治学家博格丹·齐文斯基博士，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塔德乌什·科瓦利克副教授，社会学家雅德维加·斯塔妮什基斯博士，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尔·库琴斯基硕士，经济学家、《联谊》月刊编辑、华沙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安杰伊·维耶洛维耶斯基。这些来自华沙的知识界人士们，在工厂中受到极大尊重和信任。“工人们现在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

对波兰天主教会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人们一直有争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波兰天主教会一方面谨慎地告诫人们要冷静和理智，另一方面有节制地表达了它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和对现政权的批评。8

月28日，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在主教团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号召“波兰人应该互相谅解，自己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主教团发表公报，要求罢工工人和当局“避免破坏公共秩序”，希望“通过罢工委员会与政府代表团认真对话解决一切争议问题”。10月4日，维辛斯基发表致教友的公开信，并在各教堂里宣读。信中写道，波兰目前情况“与社会正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公开信强调“在波兰富人骄奢淫逸，穷人丢人现丑”，提醒政治家们“掌握治国意味着为大家服务”。10月6日，波兰主教团第76次会议发布的公报说，近几个月来，教会耳闻目睹了波兰发生的事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事件”。公报指出，今天在新的形势下，主教和全体公众都希望，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使社会经济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公报还强调，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国内的社会安定”。因此，活动“必须是慎重的并确保社会秩序。”10月31日，罗马天主教皇在梵蒂冈与来访的波兰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及一些波兰主教讨论了波兰政局。梵蒂冈人士这一天发布消息说，教皇和波兰的主教们密切注视着波兰事态的发展，并在暗中努力防止苏联干预。11月10日，在波兰最高法院准许团结工会登记之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专家组成员会晤了

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对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告诫他们不要屈服于政治诱惑，要集中注意力照顾工人的利益。

在罢工最激烈的时候，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亲自向信徒及教友们宣讲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的手谕。他说："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需要和平、镇静、谨慎和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对波兰的维护不能是消极等待，它要求积极努力，使我们祖国恢复和平与安定，特别是肩负国家发展责任的政府，需要认真履行职责，消除影响整个民族的困难……。我们民族刚刚在经济上开始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多工作，少借债，更多地对外国出口，更好地满足对人们的需要……。波兰的分裂会使欧洲国家的平衡遭到破坏。波兰人必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因为他们对它的开发负有责任，正象每个民族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波兰民族需要有民族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独立性。"

正象观察家们指出的那样，手谕绝大部分充满了宗教内容，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讲话实际上是政治性的。

以往，工人罢工和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通常总是以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和无产阶级的标语口号为标志。但是，这一次在波兰，在工厂的院子

里和广场上，最经常出现的却是民族的旗帜、宗教的标志和教皇的照片。它充分说明，由于社会对党和政府不信任，由于人们对旧的意识形态宣传抱有反感，由于各种各样来自权力机构的违反道德准则的丑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像在波兰人心目中失去了威信和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教会及其宗旨，教会作为道德的象征、民族团结的旗帜在发挥影响。教会弥补了党留下的人们心目中的“真空”。

在罢工期间，《政治》周刊记者对“列宁”造船厂一次由神父主持的弥撒的采访纪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报道写道：

“8月17日，星期日。

……

（“列宁厂”）2号门前的广场上和街上挤满了市里来的工人家属、青年和穿着丧服的妇女。

9点。用鲜花和国旗装饰起来的大门上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柞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花圈。十字架的右边是约翰--保罗二世的画像。圣布列基达地区教堂的神父主持了弥撒。参加弥撒的在大门祭坛的一边是造船厂工人，另一边是他们的家属、未婚妻、同事。神父在布道词中讲了劳动和人，讲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讲了劳动的尊

严，劳动的安全……弥撒变成了一次爱国主义的、团结的示威，最后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啊，人民在向你恳求’声中结束。

弥撒结束后，十几个穿着蓝灰色工作服的船厂工人抬起了柞木十字架，人群闪开了一条路。他们把它抬到了广场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在夜间准备好的一个架子上立了起来。1970年，最初殉难的三个造船工人就是在那儿倒下的。

‘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神父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向唱起‘波兰不会灭亡’的人群洒了圣水。几分钟之间，鲜花堆成了高高的一堆。燃起了蜡烛和火炬。肃静，流泪……

弥撒一完，劳保大厅里有12个工厂代表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始了。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莱赫·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①

宗教与政治在此时此刻最完满地结合在一起。

在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还在艰难地进行之时，波兰国内的生活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连日来，波罗的海港口滞留的船只增加到近百艘。波兰每天要付给外国船只大量的补

①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第49—51页。

偿费。与之同时，成千辆卡车等着装货运往国外。工厂停产造成的损失已达数百亿兹罗提。旷日持久的谈判陷入僵局，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着严重的灾难。

然而，最严峻的威胁还不仅此。波兰的政治地理和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一个极为敏感的指示器。尤其对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来说，波兰的危机具有严重的意味。

7月底，盖莱克与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会晤，双方“互相通报了本国情况和苏共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8月15日，苏联塔斯社宣布，华沙条约国军队在东欧波罗的海沿岸举行“军事演习”。8月21日，美国国务院要求波兰当局尽快释放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别就苏联干扰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表示抗议和遗憾。8月26日，波兰国家电视台首先播放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的布道讲话。他呼吁和平与安定，提醒波兰人民不要忘记过去亡国的苦难历史。接着，波党中央委员、政治评论员沃伊纳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提醒人们，波兰有可能陷于18世纪末被瓜分的灾难性局面，告诫说波兰处于苏联安全区域之内，因此这里对现行制度的任何挑战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8月27日，苏联塔斯社发表

题为《波兰事件》的评论，指责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国内颠覆活动不断加强”，谴责西方舆论工具正起着“赤裸裸的教唆作用。”同日，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内阁会议上说，“法国人民对波兰事件十分关切”，强调“法国一贯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希望波兰能够自己找到克服困难和满足人民要求的办法”。8月28日，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中，间接谈及波兰问题。他说：“我们不想侵占任何人的土地，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但是我们随时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同一天，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记者说，他希望用和平的政治办法来解决波兰工潮问题，并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向波兰提供援助是必要的。他还说，一个西德银行财团决定向波兰提供6.6亿美元的贷款。8月29日，美国政府官员说，卡特总统写信给一些西欧领导人，敦促他们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在罢工工人与政府签署了“格但斯克复工协议”之后，9月1日，卡特发表讲话，对波兰罢工工人获胜表示“钦佩”和“高兴”，说波兰工人“为所有珍惜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会见了移居在美国的瓦文萨的继父。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他“同情”波兰工人，反对干涉波

兰事态的发展。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署名彼得罗夫的《社会主义波兰的敌人的阴谋》的文章。文章说波兰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已渗透到沿海一系列企业之中……利用经济情况的困难来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他们“给波兰土地上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造成直接的损失。他们想破坏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几乎所有的波兰人都意识到，任何欠考虑的步骤在当时形势下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寻找尽快解决谈判僵局的办法。在协议达成的头几个晚上，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在地的“列宁”造船厂的所有的人几乎都彻夜未眠，人们反复地计议着下一步的发展，焦虑地等待着谈判室里传来的一切消息。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在昼夜紧张磋商，华沙的“中心”大楼里灯火彻夜不熄。

8月31日，是波兰危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天，双方的理智和共同的利益考虑占了上风，终于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协定书。协定书规定，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也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际联盟体系”的前提下，政府同意成立“新的、独立的自治工会”。协议还就罢工工人提出的罢工权利、出版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增加工资和提

高福利等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和解释。罢工工人代表瓦文萨在协议签定仪式上说，工人们“没有获得我们希望获得的一切”，但是“我们得到了当前形势下所能得到的一切。其余的我们也会获得，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独立工会”。政府谈判代表、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讲了话，他说：“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整个时间里，我们力求了解支配你们的意图。你们向我们列举了许多尖锐的论据。我们也作了辩解……我确认并完全坚持所说过的话：‘我们是象波兰人应该同自己人那样谈话，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在我们的整个会谈期间都充满了这种精神。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全国都在看着我们。让我们作出榜样来。让我们象声明过的那样，共同前进，忘我地工作……”。

工人们停止了罢工，从9月1日起开始上班。在波兰，9月1日这一天具有象征意义。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些日子里，波兰民族为生存的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至今它仍然留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的记忆之中。

对罢工工人要求的承认，也意味着盖莱克体制的终结。9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盖莱克“病

重”缺席的情况下①，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里克·雅布翁斯基主持。全会决定，“鉴于爱德华·盖莱克患重病”，解除他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政治局委员、分管军队、警察和宗教事务的中央书记卡尼亚当选为第一书记。

卡尼亚在全会上说：“经济政策上的严重错误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是产生这次大规模罢工浪潮的基本原因”。他强调，工人罢工“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不是反对我们联盟的抗议，也不是反对历史所形成的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抗议”。它反对的是党的“政策上的错误”。现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社会对人民政权的信任，恢复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他在谈到对外关系时表示，同苏联的联盟“过去占有、今后仍将有特殊的地位”。他还提到应该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研究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必要性。

值得回味的是，波兰每次大的危机之后，每一位第一书记下台的方式都是类似的。而新的领导上台照例是以对前任的尖锐批评开始的，甚至批评的辞句和口气都十分相似。

---

① 据次日《人民论坛报》发表的由5位医生签署的公报说：盖莱克“心脏病严重发作”，“必须住院治疗”。

在协定签署之后，工人群众与政府之间曾为“团结工会”登记的问题引起新的矛盾和冲突。但是，经过双方的努力和平衡，在11月10日波兰最高法院批准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登记，终于解决了这一矛盾。

《政治》周刊记者沃依切赫·盖乌但斯基和莱赫·斯泰凡斯基在他们1980年9月底写成的书中，评价了当时的形势。这种评价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波兰人的看法：

“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工人抗议的合理性，在7、8月危机时期选择了同工人阶级协商的路线和革新的路线。正如七中全会强调指出的，这是在制度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它意味着在执行党的指导路线的范围和方法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会，自治地和独立地关心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格但斯克协议和什切青协议的签订，出现了有数百万人参加的、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工会运动，这一运动立刻成为国内政治力量结构中的新因素。‘团结’工会章程宣布的非政治性丝毫不缩小这一说法的含义。新形势带来的后果，肯定将是各种各样的，它们的充分显露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理论上的总结，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来认真思考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新形势将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团结’工会、革新后的行业工会，以及许多正在活跃起来和重建的自治组织、合作社组织、创作组织、青年组织都可以成为社会监督的真正因素。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因为正如历史的普遍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每一个政权（不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如果不受被统治者的经常监督，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监督遵守纪律，那么写在宪法、法律和其他规章制度上的保证，是不能防止各种变形的。”①

这两位记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认为，直到第二阶段（即从格但斯克大罢工至团结工会成立）时，波兰事态的发展仍是向积极方向变化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功，政治朝着有利于民主、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新建立的自治、独立工会中，积极因素占有主导地位，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千千万万成员为了革新的共同目标而作出了一致的努力，社会主义的和人民的波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前景。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波兰这时有这

①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第189页。

些好的形势，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会出现军事管制和“战时状态”呢？为什么团结工会后来被取缔了呢？

这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研究波兰问题的各国学者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和结论，甚至波兰人自己对这种转变也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无论如何，它需要仔细的、多方面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客观和可靠的答案。下面的推论仅仅是众多可能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判断中的一种。

从团结工会正式登记，到实行军事管制和取缔团结工会，为1980年夏开始的波兰危机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客观的环境和条件，还是团结工会的构成及活动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看，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令人遗憾的后果。

让我们大致考察一下导致这种后果的诸方面因素：

第一个因素或者说原因，是“团结工会”构成的变化和消极成份的增加。

正如沃·盖乌任斯基等人所看到的那样，在团结工会正式登记之前，内部的很多矛盾或者是没暴露出来，或者即使暴露出来了也没引起人们的过多注意。而在协议签署之后，问题便很快出现了。

“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无疑会导致非法的政治反对派内的各集团的两极分化。那些过去和现在反对波兰政治制度的歪曲，而赞同社会制度基础的人，大概将会逐步回到合法地位。那些在纲领上敌视社会主义的组织和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改善的制度，……他们企图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队伍，想按自己的意图来改造工会运动。”①

的确，在罢工期间，人们已看到了极端分子破坏罢工、企图扭转斗争方向的尝试。在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代表团正在进行艰难谈判之时，“一位年轻的、穿着考究、身上散发着高级香水味的女士闯进了专家会议厅。她情绪异常激动地跑到近旁的第一桌前高喊：‘是你们把我们出卖了！谈判骗局该结束了！叛卖该结束了！’”使人们为之愕然。类似的图谋还有一些。一个年岁较大、个子不高、秃顶的人，在工人中散发“旅美波侨民族联合会”的传单，并鼓动工人反对协商。他甚至在厕所里组织了个小小的抗议集会，反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提法。他还中伤瓦文萨，说他“作风不民主”，因为他没有听取全体会议的意见，而全会“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能容许投降的”。后来，“秃顶”被人们撵走了。当时，由于不时出现

①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第190—191页。

类似情况，干扰正确的进程，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公报，号召大家忍耐、平静、遵守纪律，“警惕有人煽动”。在罢工斗争胜利后，这种破坏力量继续地、甚至更加猖獗地活动。就在复工协定签署一个月的那天，10月30日凌晨，苏联航空公司设在华沙市中心的办事处发生爆炸和火灾。有人在群众中散布极富挑衅性、不利于事态平稳发展的口号和消息。

除了上述专搞破坏活动的人之外，在团结工会内部还有一种极端分子。《政治》周刊编委、政论家丹·帕森特和安·克·符鲁勃莱夫斯基指出：这是一些“观点、态度、要求都是走极端的人。从这一运动的群众性质来看，从大量散发的经过检查或不经过检查的文章来看，在某种情况下是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虚无主义、自私自利；他们是一些吵吵嚷嚷、好出风头的人。他们的言论一再说明，他们嘴上说需要对话，却根本不想同政府和党的代表进行谈判。他们发动轻率的运动，其目的是搞臭和恐吓每一个敢于出来捍卫社会主义的人，每一个不想把我们的成就一笔抹煞的人，每一个有勇气抵制过高的政治、社会和工资要求的人，每一个不想随意进行罢工的人，每一个敢于反对发表反苏、反共文章的人，每一个不喜欢举

办挑衅性展览、文娱演出或其他集会的人，每一个敢于说出大概不应该继续缩短劳动时间或者再提高工资的人，每一个敢于引用乘法表说，如果我们增加教育、文化、医疗、采矿、农业、建筑、工资等的开支，要求多少就增加多少，那么增加开支的数目将大大超过100%的人，每一个敢于出来保护那些只是因为在去年（1980）8月以前曾经活动过而要被拉下马的人。极端分子要求的并不是民警指挥所的这一座或那一座建筑物可用来作幼儿园，正象幼儿园也可用作监狱一样。所有这一切无休止的要求，对极端分子来说都具有托辞性质，只是用来作为一连串对话和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借口，似乎他们渴望政府有威信，以便跟它进行虚假的对话。这里所说的要求是由那些没有这些要求就不能过活的极端分子提出来的，明显地不现实的。他们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有紧张的气氛，然而在妥协的气氛中他们看不到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这倒是对的。”①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认为：“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更多地是各种在意识形态上往往对立的反对派力量的特殊混合物，它无所不包，从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梦想直到莫楚尔斯基的独立波兰联合会的公

① 《政治》周刊，1981年7月18日。

开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第三阶段上，上述破坏因素和极端分子的影响在“团结”工会中逐渐增加，把自己作为社会的异己力量，其破坏性逐渐增强，使团结工会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降低了它一开始享有的声誉，增加了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担心和厌倦情绪，减少了它与行政当局有效合作的可能。

第二个因素或者说第二个原因是，党内存在的保守势力的挑战和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给极端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口实。

在大罢工和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受到沉重打击，虽然形式上在党内禁止派别存在，但各种倾向、观点的派别已成为现实。党的最高领导在党员中失去了威信，共产党在群众中形象不佳，一年之内就有数十万党员退党。据波兰国家通讯社1981年4月24日报道，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有294.2万人，过去的半年中减少26.6万人，其中7.1万人是被清除出党，其余的是自动退党。在这种形势下，保守的、教条主义的和极左的势力也乘机出来，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他们认为，革新过程对于党本身来说，只是从政治机构中清除贪污盗窃分子和“不坚定分子”；“他们想把政权的所有机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们

只盼望一旦政治危机解决之后，党再也不会处于窘境，他们就可以重新登上‘驾驶台’，独揽大权”。他们拒绝改革，阻碍革新，尤其反对对党本身加以变革和让社会参与决策。例如所谓“卡托维兹论坛”和《现实》、《火焰》等杂志就聚集了这样一些力量。他们不断地制造恐慌气氛，说波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要垮台了，他们也攻击那些赞成协商进程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政治》周刊评论说：

“这些人经受了首次震惊之后，已经开始集合起来了。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满嘴的社会主义，以我们制度的卫道士和热忱的爱国者的面孔出现。但是，如果研究一下他们的文件，例如，‘卡托维兹论坛’的宣言（这些宣言最近在电视台第三套节目中得到传播。电视台对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而其他许多更聪明的人多年来到那里去一次也不可能）竟然认为：革新是一场灾祸，劳动人民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我们的国家已面临修正主义的政变；资本主义的幽灵正在波兰游荡，我们正处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教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血盆大口之中；千百万工人阶级是如此的天真，如此没有经验，以致被一小撮撒谎的人、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变色龙、小资产阶级

分子等等一类的人所欺骗。

这些人想干什么呢？要重温几年前的冒险行为吗？他们想用那些至今还使我们感到羞耻的弄虚作假的方法使人民相信什么呢？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极端分子对斯·卡尼亚投不信任票的目的何在呢？《现实》杂志写过关于苏联和其他盟国‘宽宏大量了十个月’，干嘛写这些东西呢？它是在暗示这一合时宜的把戏已经玩够了？这一‘论坛’的活动家们力图恢复对经济的中央集权领导，其用意何在呢？那些借口没有工人参加而攻击九大的人想干什么呢？他们好象忘记了爱德华·盖莱克也曾是个工人，这儿说的不是职业问题，而是纲领得到工人们支持的问题。他们想自己执掌政权，但是，政权落到他们手里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将退回到1956年存在过的关系上去，一笔勾销从那时起我们在痛苦和灾难中为改善社会主义所作出的一切。

隐藏在党内的、甚至占据着相当重要位置的极端分子把自己装扮成关心祖国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有原则的共产党人，然而事实上，他们拿不出任何一个积极的建议，任何一个纲领，他们只会说一个词：不行！‘团结’工会——不行！自由的讨论——不行！权力下放——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不行！而这种可以向社会说出‘不行’的时代在

1956年就已经结束了。党不可能说‘不行’，而没有党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就象‘团结’工会内的极端分子说‘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一样，党内的极端分子说‘要么什么也没有，要么一切’。”①

正是这种党内的保守、极端势力阻碍了革新和协商进程，激化了矛盾，给团结工会中一些企图以不断的罢工制造混乱机会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处于两个极端的势力共同对团结工会的失败和军管状态的实行负有主要责任。

第三个因素或第三个原因是，工人群众及社会阶层在经过长久的动乱之后，还未很好地适应新的形势，找出合适的发展方式，而团结工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稳健派、温和派的人也未能控制由于极端分子影响而波动的局面，致使社会安定和谐状态迟迟难以实现。

这样一个分析很难让人在感情上欣然接受，但它却可能是符合现实的，即：工人群众在经过艰巨和长期的斗争之后，在遭受了无数的折磨和困扰之后，他们赢得了一定阶段目标的实现，并使原先非法的这种目标取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但他们在新的形势下却不能或者说不了解如何正确地、恰如其分地利用自己的新的地位，相反，仍

① 《政治》周刊，1981年7月18日。

自觉不自觉地沿用旧的思维习惯和斗争方式，从而给迫切需要安定、秩序、和谐、效率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不稳定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后果；于是，新的、不得已的强制出现了，工人群众不得不将参与和决策的权力重新交给“代表机构”和职能部门。对于团结工会中上千万怀有真诚愿望的工人群众和上百万同样真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悲剧。哲学大师黑格尔在论述悲剧情节和原因时说过：“悲剧的目的和人物性格各有辩护的理由和必然性。悲剧的第三个因素，即悲剧的冲突导致这种分裂的解决，也是如此。这就是说，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悲剧人物所定下的目标，单就它本身来看，尽管是有理可说的，但是他们要达到这种目标，却只能通过起损害作用的片面性引起矛盾的悲剧方式。因为真正实体性的因素的实现并不能靠一些片面的特殊目的之间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世界现实生活和人类行动中可以找到重要的理由），而是要靠和解，在这种和解中，不同的具体目的和人物在没有破坏和对立的情况中和谐地发挥作用。所以在悲剧

结局中遭到否定的只是片面的特殊因素。因为这些片面性的特殊因素不能配合上述和谐，在它们的活动的悲剧过程中不能抛开自己和自己的意图，结果只有两种，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假如它可以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① 团结工会后期的变化和结局应验了这位哲学家的原理。

在签订复工协议之后，团结工会与政府之间曾发生了三次大的冲突。

导致第一次对峙的缘由，是华沙电视台在9月23日的一次节目中，播放了两个“叛逆者”——马·普洛宁斯基和雅·库龙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的摘录。电视台希望波兰公众舆论确认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库龙说：“……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斗争，包括绞死共产党人，放火烧毁党的总部”。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立即指责电视台对库龙的话断章取义，企图以此诽谤持不同政见者，离间他们同工人的关系。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协商委员会也断定，这是用某些以前讲话声明剪辑而成的摘录，并宣布对自己罢工时期的“顾问”予以保护。在这次事件之后，团结工会的偏向——这里主

①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8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要指上层领导——明显右倾，而同政府及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僵硬。

第二次是全国范围的对抗。它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29日，团结工会协商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举行会议。会议发表声明，指责政府当局没有全面履行同工人签署的复工协议，甚至“从所承担的义务中退缩和后退”。声明要求按期提高工资，要求利用舆论工具，要求制止国家机关在履行政府所签定的协议时的缓慢行为。为此，协商委员会宣布在10月3日举行全国1小时警告性罢工。政府在接到罢工通知时，感到意外和不悦。副总理雅盖尔斯基马上赶到格但斯克，进行关于取消罢工的谈判。报刊也指出，协商委员会的通知中所作的指责是一般性的和缺乏具体根据的，并且说，在已经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新的罢工会使政府履行义务的努力更加困难。仅增加工资一项就必须在一年内保证1150亿兹罗提，这要从债务或者投资和预算中抽取。报刊还提醒道，仅仅在机器制造业中，一小时的停工就可能造成1亿兹罗提的损失。然而，政府的劝说和舆论的提醒都没有能够制止团结工会的行动，罢工还是举行了。这在各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反响。

频繁地、不适当地使用罢工手段，无论对于社会、对于革新力量、对于国民经济，或是对于团结

工会自己，都不是有利的。从这次全国警告性罢工之后，人们开始议论罢工者的意图，社会舆论原先对团结工会的好感逐渐减少，而在某些极端分子（团结工会内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鼓吹下，独立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在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这种对立变得更加明显。这次大会的纲领被人指责为“政治反对派的纲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由于政府方面始终未能使社会安定下来和使经济生活恢复正常，它在国内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81年2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平科夫斯基总理提出了辞职请求，会议建议任命国防部长、以稳健著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为新总理。同年10月，在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去了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接任第一书记。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卡尼亚和平科夫斯基属于党内的“温和派”，而且具有明显的革新意向，他们的去职，仅仅是由于他们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和非常力量。新任波兰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生于1923年，是卢布林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1943年他加入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1960年任波兰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1965年任总参谋长。1968年任国防部长。1973年晋升为大

将。他从1961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有名的稳健派和实力人物。毫无疑问，他的当选表明了人们对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的焦虑和对新秩序的渴望。雅鲁泽尔斯基一当选总理，便在施政演说中呼吁团结工会在3个月内不要举行罢工，以便政府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并开始实行稳定经济和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的计划。对此，瓦文萨发表讲话，对雅鲁泽尔斯基大将担任总理表示欢迎，并呼吁工人保持平静。他说："这是我们的最后生路，我们不能指望对抗"。实际上，从这时起，波兰军队已接管了国家权力并力求最后一次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条件下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遗憾的是，团结工会中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象瓦文萨说的那样做出反应，瓦文萨这样的被认为是"温和派"的人也未能掌握局势。1981年底，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决定，为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沿岸"十二月事件"，将于12月17日在全国举行街头示威游行；如果政府不答应团结工会的这一要求，就宣布举行无限期的总罢工。这是团结工会成立后与政府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

为使团结工会放弃这一计划和避免流血，会议

的记录被政府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广大公众公布了。政府想以此表明，他们了解反对派的意图，并且不会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也有人曾对此好言相劝，包括天主教会，但都遭到了拒绝。11月初，波兰议会通过决议，号召工人们不要罢工，并警告说，如果这项呼吁无效，议会将考虑授权政府采取应急措施。但是，一切呼吁对于那些头脑发热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来说都已无济于事。12月12日夜里团结工会主席团通过最后决议，肯定了拉多姆决定的有效性。冲突迫在眉睫，大罢工可能使波兰崩溃。这时，波兰军方采取了行动。

12月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由15名将军和5名上校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他说，在波兰，民主协商的希望已成泡影。当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对抗的形势下，不制止冒险分子将国家推向自相残杀的深渊，就是犯罪。并且指出，救国军事委员会不取代政权的宪制机构，它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国家的法制，建立行政上的保证，以便恢复秩序和纪律。这是使国家开始摆脱危机，挽救国家免于崩溃的最后一条道路。

同日，波兰国务委员会颁布《关于战时状态的

法令》，其中决定暂时禁止行使或限制波兰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暂时停止各工会组织以及各社会团体的活动，等等。法令决定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由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任该委员会主席。

这一天，救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说它的任务是稳定国家的局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证和支持行政机关和经济单位的工作顺利进行，它将存在到国家局势正常化为止。

当午夜时分宣布了战时状态之后，团结工会的活动和一系列其他组织遭到取缔，数千人被拘留。军警和全副武装的巡逻队在华沙及全国各地的街头执勤。阴谋和希望、企图和期待、反面的方案和正面的计划，少数人的不轨打算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顷刻之间一齐被彻底粉碎。

上面讨论的是造成团结工会的悲剧的主要原因。当然，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或多或少地起了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这众多的因素中比如有：外界的影响和压力，象美国及西方盟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所谓“援助”、“呼吁”、“自由力量”的种种做法，苏联及“东方”阵营对此的强烈反应并相应出现的对波兰的压力；罢工、

冲突和社会动乱引起的持续的波兰国内外联系的紧张和不协调，等等。

波兰哲学家沙夫说："我们也应该问一下，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制度上的错误，在经济上也引起了混乱，但为什么只在波兰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呢？在这里，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仅仅波兰才有的、令人遗憾的因素，那就是波兰人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在讲德语的一些国家里，人们把一些事情进展的不佳称之为"波兰经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根本不是说波兰没有杰出的经济理论专家和好的管理人才。但遗憾的是，作为整个民族它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波兰有一句俗话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句俗话说，"只要能保持老爷的气派，最后一件衣衫也要当掉。"沙夫指出，"波兰报刊上不断重复谈论说，波兰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民族。是有这么一点，它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波兰人性格的'综合症'有关，这种'综合症'受到历史的制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当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能力在民主生活和没有能力利用各种民主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历来就缺少讲民主的习惯。有人说，只要把民主机构交给人们，他们就会立即利用这些民主机构了。这样说并不准确，要学会运用民主还需时间

和实践。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对那些从专制制度向自由制度过渡的国家来说，运用民主是特别困难的。现在事情比以前好多了，但现在人们开始感受到过去留下的祸害，既然已经不再害怕了，他们就开始造反，不再象以前那样俯首贴耳保持沉默了，这就有可能使老病复发。”①不论正确与否，沙夫的这番话是值得思考的。

沙夫讲的“综合症”，或者我们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诸方面的因素，使得波兰1980年开始的工人罢工运动一波三折，由成功到失败，从积极的抗议走向消极的对抗，直至最终出现严重悲剧性的后果。波兰仍然在危机中循环，波兰人民和共产党人仍然在为摆脱危机而苦斗。一个本来充满希望的、以广大工人群众为主体的、向着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向演化的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① 见沙夫《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1981年德文版。

第十章

艰难的步履——
取消军管之后

“如何保证在将来不发生悲剧性的震动？如何保证使最正确的发展方案能顺乎自然地产生并取得胜利？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使党和人民能用自然和简单明了的方法，没有痛苦、不引起骚乱和震动地产生新的领袖人物和各级领导管理部门的新领导人？如何保证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保证波兰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这些问题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科兹德拉

“战时状态”在波兰持续了1年零7个月。这期间，严格的宵禁，严厉的镇压，严苛的纪律，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压抑感；但另一方面，不无苦涩意味的是，它也给社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防止了大规模内战和外国军队的入侵。

1983年7月21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里克·雅布翁斯基在议会宣布，从次日起结束军事管制，并宣布对一些政治犯实行赦免，对那些由于违反军管条例或犯有其他政治罪而被判处3年以下徒

刑的人实行赦免，对判处长期徒刑的人将减刑一半。

然而，军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严峻的现实依然摆在每一个波兰人面前，无论对老百姓、对知识分子、还是对政治家都是如此：波兰仍处在危机之中，要彻底摆脱这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并非短期之事。

就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宣布结束“战时状态”的同时，议会颁布了《克服危机时期的特别法规》，其中规定，在重要的工厂中厂长可以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至8小时，以保证完成重要的经济任务；当国营企业职工自治机构和文教单位违反纪律和社会利益时，上级机关可以暂停其工作或解散其组织。该法规的有效期直至1985年12月31日。

近几年来，尽管团结工会和其他各种各样在1980年至1981年成立的独立团体和组织在形式上已被解散或取缔，但其核心成员及追随者同政府间的冲突仍时有发生。

1984年7月21日，波兰议会通过大赦令，根据这一法令，全国35000名犯人，其中包括652名政治犯全部得到赦免。但是，到1985年，政府又破获了团结工会的一些地下组织，逮捕了一些主要的活动分子，如布雅克等人。

1986年1月下旬，格但斯克有几千人参加了为瓦文萨第8个孩子举行的宗教洗礼仪式。

1986年8－9月间，政府再次颁布大赦令，释放了包括布雅克在内的全部政治犯。然而，没隔几天，瓦文萨、布雅克以及地下团结工会领导机构“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又举行公开会晤，并要求与政府谈判，讨论团结工会的命运及其他问题。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在记者招待会上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向仍在活动的地下工会领导人发出了警告。

上述例子表明，在取消军管以后，团结工会及反对派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止息。尽管总的来讲作为一个运动的团结工会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但矛盾还在继续，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非一日之功。

这种磨擦不过是80年代初期波兰严峻的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

在波兰实行战时状态后的第11天，1981年12月24日，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次日，里根又接见了叛逃的波兰驻美大使，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斗争”表示“钦佩”和“支持”。随后，西方各国也都对波兰采取了粗暴干涉的态度。1982年1月，北大西洋公约国外长会议

通过声明，决定对波兰政府采取制裁手段，以迫使波兰当局取消战时状态，恢复同团结工会的对话，以及释放被拘留者。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波兰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有：

（1）中断有关波兰欠西方国家于1982年到期债务延期偿还的谈判；

（2）中断或停止西方政府对波兰的出口贷款的保证，取消早先谈妥的贷款；

（3）共同市场停止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15%的优惠价格向波兰出口食品；

（4）通过扩大禁运的商品货单，并为专利出口规定严格标准，加强对波兰商品出口和技术转让的监督。

（5）中止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美国的着陆权；

（6）暂时取消波兰船队在美国200浬水域的捕鱼权；

（7）自1982年11月1日起，美国停止波兰自1960年起一直享受的最惠国待遇。

在西方的经济制裁措施中，对波兰经济威胁最大的是取消贷款。1981年波兰为支付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必需的进口，向西方国家借了50亿美元贷

款。为了使1982年的西方进口能保持在1981年的水平上，以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务本息，波兰原准备从1982年再从西方借一大笔贷款；然而，西方制裁使这一打算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波兰能用来支付西方进口的唯一财政来源是向西方国家出口所得的自由外汇收入，而这笔收入远不能满足波兰的需要。这样，1982年波兰在兑换货物中实现的西方进口只有1981年的76.8%，而1981年的进口已经比1980年下降了一半左右。它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波兰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由于70年代盖莱克政府大力发展同西方的经济联系，目前波兰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与西方有关系。因此，首当其冲受到损失的是工业部门。波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扎伊纳承认，西方经济制裁“最严重地打击了按西方技术工艺和设备所建立的企业。其结果是，在最近几年内建成和扩建起来的波兰工业中最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企业无法利用自己的生产能力”。

据波兰报刊透露，因外汇短缺而不能保证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半成品、部件和更换零件的进口供应，给工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其价值接近1982年工业生产值的4%，即3000亿兹罗提，其中一半以上的损失来自食品工业、轻工业和畜牧业，而

正是这些生产部门决定着波兰的市场供应。因此，若以乘数原理计算，损失更要大得多。这里有几个例子：

1982年，美国停止向波兰供应饲料玉米，使波当年的家禽肉和鸡蛋减产，其市场供应量分别下降了约70%和16%。西方饲料供应的减少还造成了波兰农业公营成分中生猪生产的下降，也使利用进口饲料养猪的高度专业化的个体农户几乎全部放弃生产。

西方对波兰食品进口的限制，使波兰1982年的黄油进口比1981年减少了44万吨，脂油减少了25万吨，肉减少了6万吨，柑桔减少了2万吨。可可豆进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使1982年波兰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的生产分别减少了50%和30%以上。

美国对波兰渔船在其海域内捕鱼的禁止，使波兰捕鱼量下降了约4万吨。除此之外，美国还减少了21万吨的鱼粉饲料供应。美国和西方国家加强了对波兰商品输出和技术转让的限制，对波兰禁运的包括：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技术、诸如钛等某些战略性金属，某些电子工业技术、监视飞机和船舶的设备以及某些化学工业技术（例如聚合技术工艺）等。波报刊文章说，上述限制，“给许多生产者和技术人员在对经济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投产

方面带来巨大困难”。

美国取消波兰的最惠国待遇，仅1981年1年，就使波兰损失7000至8000万美元。美国对波兰的传统出口商品，如纺织品、钢板和钢板制品、机床、自行车、化学制品和皮鞋征以很高的关税。取消最惠国待遇，对波兰纺织业、大部分出口钢铁冶金产品、有色金属产品、化学制品、滚珠轴承、药物和菜籽油的生产打击最大。

美国码头工人工会抵制装卸波兰商品的行动，一直延续到1982年4月底。这一行动对波兰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3000万美元。

据统计，波兰1981年从西方国家的进口减少31.5%，1982年减少24.6%，因而使波兰国民经济在1980年至1982年的3年间共损失125亿美元。

由于各种原因，80年代前半期波兰的外债大量增加，债台高筑，入不敷出，使波兰政府苦不堪言。到1985年年底为止，波兰欠西方国家债务已达293亿美元。虽然无论就欠债总额来看，还是就人均欠债数（约800美元）来说，波兰还不算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如果从出口以及出口与债务的比例来看，就另当别论。80年代中期波兰债务已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4.5倍，而所谓国际上公认的债务安全线是不应当超过当年出口额的55%！

波兰的国民收入连续几年下降。1979年下降了2%，1980年下降了6%，1981年下降了12%，1982年下降了8%。1982年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25%以上。1982年工业纯产值下降了6%左右，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

在生产和国民收入下降的同时，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增加职工的工资。据报道，仅1981年国家就多印发了30%的钞票，而这一年市场供应量却下降了17%。1982年居民的货币收入比1981年增加62%，而供货额却又下降了17%，波兰价格事务部长在1983年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到1982年底，累计的通货膨胀额达5000亿兹罗提，相当于全国一个季度的供货额，而1983年通货膨胀额将再增加6000亿兹罗提，总共有11000亿兹罗提货币找不到商品兑现。为了抵销严重的通货膨胀，波兰政府不得不一再依靠货币贬值，增发债券、提高物价等手段。

短缺、匮乏现象极为严重。1981年12月16日，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为了刹住抢购面包之风，宣布实行面包的定量供应，每人每次仅能买1个面包。

1981年12月26日，波兰商业部宣布，从下一年1月起，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肉和黄油的定量供应，工人的定量不变。这是波兰自1981年4月实行肉和

肉制品定量供应之后又一次降低肉的供应量，从每人每月3公斤减少到2.5公斤，而病人、孕妇和青年从每人每月的5公斤降到4公斤。

1982年1月1日，波兰实行新的原材料和燃料供应价格，涨价幅度高达4—6倍。如。1吨石油由原先的2000兹罗提升到13400兹罗提；1吨硬煤由467兹罗提升到1870兹罗提。农机、化肥和饲料的价格也上涨了40—119%。

1月2日，波兰国家银行宣布兹罗提大幅度贬值。按官方的兑换率，原先1美元兑换34.5兹罗提，现在可兑换80兹罗提；1英磅兑换的兹罗提由65.62增加到153.49。

1月6日，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一项收购农产品的新措施，要求农民把粮食借给国家，国家发给证券。国家将在一定时候向农民归还现金，收回证券。

1月27日，波兰政府通过决议，决定从2月1日起提高39种基本食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民用电力和暖气的费用，提价幅度为2—5倍。这是战后波兰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

7月5日，波兰物价管理局宣布，对不实行限量供应的酒提价40%，并将提高茶叶和咖啡的零售价格，以缓和紧张供应。

1983年10月30日，波兰商业和服务部发表公报说，由于牛奶和生猪的收购出现季节性下降，从11月1日起暂时恢复黄油、动物油和人造黄油的定量供应。黄油每人每月定量为0.5公斤，井下矿工为2公斤；动物油和人造黄油各375克，即恢复到6年以前的定量。

1984年1月16日，波兰政府决定，从本月30日起，提高面包、黄油、肉等40种食品的零售价格。这次提价的平均幅度为10%左右，但熟火腿肉等将提价42%，居民的生活费用将增加3.5%。

4月1日，政府决定提高汽油的零售价格，提价幅度为25%。

9月1日，波兰国家银行宣布，兹罗提再次贬值。这是近3年中的第4次贬值。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兑换的兹罗提由110变为123。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供应限量，导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据《经济生活》周刊1983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1982年职工家庭的生活费用比1981年提高105%，而对养老金和抚恤金领取者来说则提高115%。食品价格平均提高1倍半，工业品价格普遍提高2—3倍。居民在1982年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8—30%，购买力降到1972年以前的水平，即倒退了10年。1983年牲畜存栏数、特别是猪的存栏数大幅

度下降，致使按人口平均的肉类消费量从70年代的70多公斤降到53—54公斤。肉、油、糖和一些面制品都凭票供应，波兰成了欧洲少有的实行票证供应的国家。由于供应短缺，连肥皂、洗衣粉都成为抢手的货物。

在波兰经济的宏观比例方面，创造的国民收入倒退到1973至1974年的水平上，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倒退到1972至1973年水平，人均消费和平均工资也倒退到1972至1973年水平。

波兰经济这种大幅度倒退，直到1982年底才被遏止。从1983年以后，开始了缓慢的回升。1983年，波兰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增加5%，这是自危机以来的第一次上升。工业生产增长了3.6%，谷物有所增长，畜产品仍在下降，出口增长9%，进口增长3.5%，基建投资增长7%，实际工资增长1%，市场商品供应增长4%。1985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但比危机前最好年份仍低10%，按人均计算还低14%。农业比创纪录的1984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个好年成。1985年肉的收购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0.8%，达到危机以后的最好水平。从这一年之后，先后废除了面粉、大米、动物油、黄油等的定量供应，现在在食品中实行定量供应的仅剩肉类和巧克力。

波兰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这种大幅度波动的局面，暴露波兰体制的严重缺陷。从1980年以后，政府和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并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但由于困难的局势和条件，改革的步伐比较缓慢，各项措施断断续续，始终难以收到显著成效。

早在1980年底，政府就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当时设想先从三个方面着手改革：(1)扩大企业自主权；(2)加强地方管理的权限，发展地方经济，给农民更多的权利；（3）改革中央计划和经济机构，使它们集中注意国家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当时，波兰经济协会的近百名专家还草拟了一个经济改革的方案《关于波兰经济改革基本设想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党政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由政府总理兼任，委员会下设经济计划、财政制度等11个专题小组委员会，由380人组成。1981年7月中旬，党政经济改革委员会在社会各界半年多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改革方针》的报告。其核心思想是，废弃现行的指令和统配体制，实行“中央计划与运用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企业实行所谓“三自”原则（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规定从1982年1月1日起实行经济改革。然而，军事管制的宣布阻止了改革

的实行。在“战时状态”下，企业自治停止实施。由于原材料和能源短缺，政府决定把有限的燃料、原材料实行统配，这也妨碍了改革原则的贯彻。

近几年来，议会颁布了经济方面一些新的法律法令，比如，先后制订和实施了《社会经济计划法》、《价格法》、《银行法》、《公营经济单位税收法》、《国营企业财务法》、《工会法》以及《关于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及其破产法》等等。这些法律法令反映出现决策人的良好改革愿望。比如，《社会经济计划法》规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取消指令性计划，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中央才可以下达指令性计划任务：一是国防需要，二是重要的国际协议任务，三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价格法》规定，实行新的价格制度，要采用三种价格，即官定价格、调节价格和合同价格。《破产法》规定，国营企业出现亏损，并面临停产危险时，首先由企业本身进行旨在改善企业经营的内部整顿；若此无效，企业无力进行自负盈亏和偿还债务的工作时，企业经理或创设机关或银行部门可以提出宣告破产的建议。

这些法律法令有的开始生效并收到好的结果，比如到1986年6月下旬为止，波兰有324家企业被认

为没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其中的198家在它们的改善经营的计划被银行接受之后得到了贷款；其他企业要么重新整顿，要么正在清理财产和变卖，要么必须与其他企业合并。《破产法》对于克服经营不善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都能转变为良好的结果。迄今为止，很难说波兰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除了前面提到客观方面的原因外（社会动荡不稳，对外贸易不佳，等等），波兰经济改革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观察家们指出，虽然从意向上看波兰现领导试图以"匈牙利模式"为参照系，但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所制订的具体改革措施往往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补救性的特点，故改革的总的原则难以真正贯彻。对此，波兰不少学者和社会舆论都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布·明兹教授专门撰写了《对改革加以改革》的著名文章。另外，波兰的农业发展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至今仍是私有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波兰农业，长期拖着国民经济的后腿；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似乎谁也不愿从根本上触及这个敏感而棘手的方面。正如许多人指出的，波兰并不缺乏经济学家和管理人才，实际上它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和专家，但波兰经济始终上不

去，寻找原因恐怕不能把目光囿于纯经济范围。

除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外，在80年代中期以前，波兰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很难说已彻底摆脱了危机气氛。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罢工和持续的危机中大大地伤了元气。自动退党、脱党，以及被劝退或被开除出党的不计其数。实行“战时状态”的头3周内，波党就开除了2400多党员。从1980年7月到1982年2月一年半中，有50万党员退党。仅1982年1年，被开除和退党的党员就有35万多人。截至1982年12月底，波兰统一工人党人数为234万，减少了近80万人，约占总数的1/4。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政治斗争和矛盾冲突的程度不同，党员人数减少的比例也不一样。例如，卡托维兹省减少党员10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3；罗兹省减少34240人，还有87500人；格但斯克省减少18000人，还有78000人，苏瓦乌基省减少2795人，还有24000人，切哈诺夫省减少5000人，还有265000人。

波兰统一工人党从1982年底至1983年初开展了“总结运动”。从这场运动中，可以看到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据报道，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对党的经济政策缺乏信心，对“党是否有力量使国家摆脱危机”信心不足。农村党组织主要对党的农业政

策有疑虑，不相信农业政策的稳定性。一些工厂企业的党组织则主要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作为政治危机的重要标志的信任危机依然严重存在。工厂企业党组织的地位比较软弱，工人群众对党“没有好感”，对党的基层机构“采取轻视态度”。基层党组织总结会议的出席率平均只有75—80%。有些会议因出席人数太少而不得不延期，有的不得不改为党支部扩大会议；有些会议出席人数不少，但会场沉默，无人发言，支部书记只好唱独脚戏；有的总结会议因人不重视、准备太差而延期重开。沃姆热市委为了保证总结运动的顺利进行，在一些基层组织开了预备会，并撤换了95个基层党组织中的34个“第一把手”。卢布林省普瓦法地区约有1/5的基层党组织消极被动，没有外力的推动不能活动。

类似的例子在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1986年2月初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改选领导时，党员作家全部落选。2月13日，华沙市委执行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华沙创作界的政治形势”，认为“有必要使党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有更大影响”，于是作协分会在2月20日又重新“选举”，选出了以党员作家为理事会主席的新理事会。

基层组织涣散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党员的积极性不高，党内思想混乱状况没有消除。在那次“总结

运动”中，几乎所有党组织的总结报告都提到了这一问题。党员对现领导仍然缺乏信心和信任，“担心1980年8月以前的形势卷土重来”。海乌姆省委组织部长公开承认“党员中不相信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的情绪还占优势”。不少党员明哲保身，不愿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政治局委员、华沙省委第一书记沃伊尼亚克认为当前党内“最大的危险是机会主义”；不少省委在总结报告中也都提到党内“危险的两面派现象”，即党内一套、党外一套、会内一套、会外一套，“甚至当政治反对派攻击党的时候也不公开表态”。卡托维兹省委书记认为党员“缺乏战斗力，缺乏有力的论据反击蛊惑人心的口号”。在一些工厂企业里，许多党员至今还说不清楚“究竟是党对，还是团结工会对”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党员们在会上“很少注意爱国复兴运动的发展”，“很少谈及职工自治”，“对新工会缺乏热情和乐观精神”。虽然“总结运动”暴露了这些思想状况，但没有解决问题，有的省委书记抱怨：“总结会议以后，基层组织和党员并没有积极起来”。

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存在的类似问题，使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的所谓“他们的”和“我们的”这一心理界限变得更加分明。波兰心理学家和

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在历史上就已形成的国家当局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其实质是“民”对“官”的不信任，权力机构缺少必要的合法性。

波兰科学院华沙心理研究所所长、波兰心理学学会主席扬·莱伊科夫斯基教授，在他的题为《理智与感情》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波兰目前面临的是一场“国家权威危机”。他分析说，从心理学角度观察，国家的权威是建立在五个条件之上的：一是国家有财富，能向人民提供福利；二是国家有力量（包括暴力），能使人民服从它；三是国家有职能，例如能向社会提供信息和情况，能指出会导致有利结果的集体行动的方向；四是国家有合法性，即法律赋予的实行统治之权；五是公民的国家观念。莱伊科夫斯基认为，“在八月事件（即1980年夏天的大罢工——引注）发生前，波兰的国家权威赖以建立的几乎所有上述条件都已遭到破坏”。他认为即使是第四条，即合法性也由于执政者自己大量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成了问题。结果是，社会对国家不仅丧失了信任，而且丧失了畏惧。

安·科尔邦斯基教授有着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合法性的危机的含义是：尽管作了巨大努力，想使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自愿接受（如果不是服

从）新的政治体制，但结果当权者根本未能达到这个特定的目的。由此来看，在波兰领导者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对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的疑问，从长远来看似乎是最严重的挑战。在1975年冬季时对修改宪法的普遍抗议，1976年6月工人闹事，教会日益卷入社会和政治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建立，大学生日益动荡不安以及人权运动，这一切都证明重要的社会集团同现政权日益疏远，现政权的威信和号召力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就丧失殆尽。

1984年6月中旬，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发表公报说，在省级以下人民议会的选举中，只有7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20%以上的选民抵制选举。据政府官员说，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是人民波兰40年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以往历次投票率从未低于85%。这也能说明公众的冷漠情绪。

危机甚至表现在报刊发行量上。据1983年4月9日出版的《政治》周刊的一篇题为《报刊发生读者危机》的文章说，1982年在大约2700万年满14岁以上的波兰人中，约有530万人同报刊丝毫不沾边，甚至不愿偶尔翻阅一下。约640万人从来不看报，而一向不看任何杂志的人甚至多达1200万左右。只有在1980年至1981动乱期间，人们才对报刊感兴趣，各种报刊总是一出来就被一抢而光。1982年以后，

除极个别报刊（天主教刊物）以外，绝大多数恢复出版的报刊都滞销。尽管人们读到报刊的机会增加了，但不读报的人数却大大超过以前。比较一下1980年、1981年和1982年这3年的情况，不读报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12%和19%。同期，根本不读任何杂志的公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5%、30%和47%。

克拉科夫报刊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表明，影响人们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报刊内容枯燥乏味、套话连篇。以《人民论坛报》为例，有半数以上被调查的人说它内容“不合适”。第二个原因是以前较有影响的部分报刊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如《文化》、《幕布》、《时间》、《文学》等周刊。还有一个原因是报刊价格上涨。比如，原先《妇女与生活》杂志每期售价13.8兹罗提，《政治》周刊每期为15.4兹罗提，而后来都涨到20兹罗提。

80年代以来，波兰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们对政治事务越来越抱有更加独立的看法，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和信仰纷纷出现。它既反映了多元化的趋势，也暴露出意识形态和宣传机构的问题及人们对之的失望情绪。根据波兰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一次对格但斯克工业大学一至三年级学生进行的抽样

调查，在回答“应实行何种社会制度”的问题时，赞成社会主义的占47.5%赞成资本主义的占3.5%；在回答如何看待波兰目前的社会制度时，仅有9.8%的大学生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48%的人认为不是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25%的人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社会制度，4.9%的人认为是极权制度，5.1%的人认为是公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回答“波兰社会政治现实中需做何改变”时，有72.8%的学生要求更换干部，有42.3%的人认为要改革政治制度，46.2%的人认为要实行多党制，57.3%的人主张扩大社会对政权的监督，39.8%的人主张扩大立法机关的权限和作用，21.4%的人要求国家独立，还有59.8%的学生认为，若将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制，波兰的经济将会好转；在回答被调查者的近期目标是什么的问题时，有0.3%的学生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近期目标。这份调查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许多大学生在危机、动荡和冲突之后的混乱、迷惘、失望的情绪。

它也证明了现行教育方法和内容的失败。长期以来，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靠马列主义理论课。解放之初，大学里开设了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党史、哲学这三门课。由于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公式化，特别是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使理论学习未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和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因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特别是当社会上出现动乱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必定是政治理论课。在1980年至1981年危机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政治理论课实际上从1981年2月起已被取消，到1983年又恢复了这门课（包括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但过去教学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不高，多数学生未读指定的必读书籍。大学生们依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新鲜知识和有限的社会认识，对现实问题作了各式各样不同于宣传说教的理解。很难说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和完整的，毕竟，生活给予他们的仅仅是受到歪曲的形象。

1983年4月的一天，华沙大学教授阿·博德纳尔在与军报《自由战士报》记者谈话时，触及到人们的矛盾、困惑和失望的问题。他指出，一方面，目前波兰社会的大部分人是赞成1981年12月31日国家所选择的道路的，因为它创造了秩序和安定生活的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如果说一、两年前许多人还深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带来变化，而且是向好的方向变化的话，那么今天，这种乐观主义已经熄灭了。在我们的社会生产中存在着怀疑主义、灰心丧气和不信任感”。但他又说：“不过也好，因

为这将对政治家们起作用，命令他们三思而后许诺。如想得到社会支持的话，那末每一个决议草案都要尽可能正反两面地进行斟酌。”

的确，直到今天为止，几乎每一个波兰人都已被循环的危机折磨得精疲力竭，几乎所有人心中都多少留下了过去时代的创伤，一旦揭开创口，就会疼痛难忍。人人都小心翼翼地捂着受伤的躯体，提防着新的打击，尽量用一种明哲保身、消极处事的人生观对待一切。

然而，一些事情却逼迫人们不得不重温旧事。在取消“战时状态”以后，波兰党和政府为了代替已被取缔的“团结工会”，重新组织了工会组织，并号召工人群众抛弃旧的工会，加入新工会。当局经过努力，新工会会员逐渐增加，1984年已有会员近500万。于是选出了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1984年11月24日至25日在卡托维兹的贝托姆镇的会议，成立了工会全国协议会，即新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冶金工人工会联合会主席阿·米奥多维奇当选为协议会主席。

根据协议会的行动纲领，新工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承认波兰的宪法原则。承认波苏同盟。全波工协宣称，它以坚持不被歪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维护劳动者权益和积极参加国家社

会经济生活为己任。主张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同意经济改革。全波工协下属133个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和26000个工矿级工会机构。到1986年底时会员近700万人，超过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此外，全国还有4000个厂级工会（总共有会员40多万）尚未参加全波工协。新工会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原团结工会会员，米奥多维奇主席就曾是团结工会会员。

对新工会的活动，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波兰领导人曾表示新工会既不能回到1980年8月之前，也不能回到1981年12月之前的状态。就是说，它既不能成为“御用”工会，也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进行公开对抗的工具”。当局就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食品涨价等重大问题同新工会进行过蹉商，曾对工会的要求作过一些让步，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己见。

必须看到，由于多种原因，新工会在工人中的威信仍然不高。据1986年底的一份调查材料说，公营企业职工中，35.4%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工厂的工会活动使人想起1980年8月之前的工会，只有25%的人认为新工会同以前的任何工会不能相比，新工会较好些。

让工人完全抛弃和忘却“团结工会”，无论如

何有理，这都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事情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

拉科夫斯基（在取消军管后的一段时间他曾担任副总理职务）1983年1月19日在工会事务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对工会的恢复过程作了述评，指出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说，新工会的组织者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才可能深入到职工中去。这些障碍不仅包括一般认为的政治上的障碍，比如，由于新工会是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新工会的敌人有意识地竭力阻止它的建立，常常对组织者施加各种压力，劝说他们缄默，集体抵制和对他们进行讹诈，甚至还发生了使用武力的情况；但真正严重的障碍是心理上的障碍，是人们心口上的创伤。有一些所谓被“烧伤”了的人，他们在参加过几个工会以后，现在声明将不再参加任何工会，还有一些人得出结论，“暂时需要采取等待的态度”。“这样的团结工会会员为数相当不少”。

拉科夫斯基在会上读了前团结工会斯乌普斯克省分会主席、现任国务委员会成立的社会协商委员会成员塔·莱万斯基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无法用乐观的调子写这封信。心里的痛苦和失望太多了。在我思想中有的是‘1980年8月’及其以后的时期。明天怎么样，毫无把握，担心家庭和

祖国的命运，后来签署了协议，于是松了一大口气。‘明天将是美好的和公正的’。8月的纪念性口号‘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我们工人的口号。因此，副总理先生，宣传工具出现的谴责团结工会的言论使我感到压抑。它们想说服我们，我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差不多是反波兰的怪物。”

信中还写道，“我们团结工会的会员和波兰政府都受骗了。那个‘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口号成了一小撮政治上蛮不讲理的人的烟幕弹。社会把签定的协议视作正在进行革新和向共同的利益采取建设性行动的预言。

然而，遗憾的是巧妙的耍手腕的人根本不是这样看待协议的。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一个阶段”。他说，“不能把团结工会同一小撮政客相提并论……我想，我确信千百万波兰人都是这样想的。”

拉科夫斯基接着评论了莱万斯基的信。他说：“对信中的观点不能保持沉默，也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进行答辩”。在谈到八月事件时，拉科夫斯基指出，在评价它的问题上，政府与信的作者并无分歧。1981年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工人阶级的七月和八月抗议是有深

刻原因的。这一评价迄今仍然有效”。“波兰国家领导人对在工人们巨大抗议浪潮中成立的团结工会也曾看作是工人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组织”。这因为当时团结工会的口号是：“要社会主义，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当时，在团结工会中还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

他说。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口号很快就在团结工会领导人视野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个口号：“要团结工会，不要社会主义！”显然，“他们把团结工会看作是为右派政客在近期和将来夺取政权服务的某种破坏性力量。团结工会领导层中的极端分子、顾问们和政客，甚至为数不少的团结工会地区负责人，在日常活动中开始落实这一口号。这是事实”。当时，“社会主义”一词竟忘记写入团结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之中！

拉科夫斯基重申了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方针。他说，在充满紧张、不断罢工的艰难日子里，“我们一分钟也未放弃把团结工会极端分子与广大工人群众严格区分开来的路线。这条路线至今仍然有效”。“区别对待不仅有利于工会运动，而且也有利于全国人民，它为顺利地实行社会主义革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拉科夫斯基的话代表了政府现在的善意的、理

解的和合作式的态度。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过去的创口是难以在短时期内愈合的，莱万斯基的真诚的信件足以说明问题。这一点，决定了前进的曲折艰难性。对于波兰人（首先是决策者）来说，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危机，而且要花更大的努力克服社会意识的危机（包括民族意识的危机）。正如一些观察家们注意到的，由于长期以来波兰人受变幻莫测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指令、要求、观点的冲击，使得人们不相信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取得进展，“态度冷淡、不信任、消极沉默、冷漠无情，还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情绪”。鉴于问题的严重程度，任何期待创造奇迹的念头都是幻想。

如果说治愈曾参加团结工会的广大工人群众的创伤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改变那些曾为八月事件的前景感到振奋的波兰知识分子阶层的消极、冷淡的态度，则可能更为艰巨。

波兰著名心理学家、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心理学》杂志主编丁·雷厄科夫斯基教授，在题为《论波兰的政治异化》的文章里，分析了知识分子与当局疏远，以及造成波兰社会政治变形的一些问题。

他指出，波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是，“社会上为数不小的一部分人感到在这个国家里很不自

在。就国家经济进步的可能性而言，他们把我国的状况看成是令人沮丧的，同时他们认为效率极低。他们对现行形式下的国家不抱好感，对它保持距离；而对积极反对这个国家的人却给予同情心。在这些人中存在一种束手无策的情绪，他们对未来往往没有信心，对官方的一切做法都持不信任态度，并感到与他们自己格格不入。”他把这种现象称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异化，并指出这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相当普遍。

雷厄科夫斯基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类原因，来自于知识分子的低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尽管波兰知识分子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于其他阶层，但是，当这一阶层将自己目前的状况同过去的状况相比较，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同社会所提倡和承认的规范体制相比较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地位不妙，或者是在下降，或者是低于别国的同行，或者受到贬损。此外，他们不仅不容易进入决策机构，还被指责为对波兰的发展起着不良作用。这不能不给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类原因是，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转原则同知识分子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所想象的“应该是怎

样的”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他们对‘民主’、‘政治自由’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方法同波兰的掌权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根据这种理解而产生的做法之间有着明显的距离”。他指出，关于在社会上自由地、也就是说不受任何约束地传递消息和自由地获得消息的观点，关于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信念和充分自由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观点，关于自由地结社的观点，尽管所有这些观点几乎都符合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原则，但实际上对实施这些原则却存在着大量的限制。结果政治体制的活动方式或多或少地离开了这些原则。

雷厄科夫斯基认为，第三类原因应当从民族心理和传统同现实结构之间的冲突中去寻找。一个民族的历史史册上，不仅充满着对事实的理解，即自身的集体经历，而且还有神话般的理论和令人神往的计划，记载着以往的人和事，既有英雄豪杰的行为，也有痛苦与悲伤的磨难，总之记载着对民族最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往往与现行国家政治活动的原则不合拍。波兰同外国的关系就是一例。据调查，青年人认为同波兰最友好的国家应该是法国。“这种观点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历史的经验并没有改变这种观点。可以冒昧地说。在‘官方宣传’中对此却往往不予注意，所以‘直接相撞’的事例

屡见不鲜。其后果是极为有害的：如果谁不同意当前的格局，谁就算作‘异己分子’；谁要是攻击这一格局，那他就是敌人。”

第四类原因是，知识分子对于生活状况恶化、各种机构水平低劣的状况感到束手无策。他指出：“不管人们的指责有多少道理，事实是个人对他周围的事束手无策，并且看不到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克服它。不只一个人的经验已经证明，他们为改善某种状况而作出的努力陷入了无穷尽的障碍的包围之中”。①

可以预见的是，在波兰未来的发展中，知识分子阶层能否与党和政府采取积极合作的姿态，是波兰摆脱危机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最近几年中，波兰的教会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其说它是传统的宗教组织，不如说它越来越成为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断在社会政治领域扩大着自己影响的组织。基层群众的支持是它力量的源泉，联系的广泛性使它成为民族性的化身。教会在波兰日益被视为民族生存的永久性因素。在实际生活中，教会又是自信的和谨慎从事的。如同美国评论家阿瑟·拉什沃尔德看到的：“近年来，团结工会与党进行了决斗，

① 《政治》周刊，1985年第14期。

在这场决斗中，团结工会毁坏了，党失去了战斗力，而教会则以唯一的胜利者姿态出现于世。教会把团结工会的许多纲领溶合于自身之中，同时又避免与团结工会的狂热分子有过多的牵连。”①正因如此，波兰天主教会不仅仅满足于充当在教堂里安抚人们心灵的角色，而且更多地介入世俗事务，发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见解。教会首领在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党政最高职务以来，已先后进行了十数次会晤。宗教的和世俗的（政治的）两大权力首脑的每一次会晤都成为影响波兰社会的重要事件。1982年11月下旬，继去世的维辛斯基担任波兰天主教红衣大主教的约瑟夫·格莱姆普在布道时表示：教会的生活也就是参与公共生活的天主教徒的生活。因此，在各个部和议会中，应该有天主教会的代表。1983年5月5日，波兰天主教主教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以及当前教会的任务问题。会议公报要求当局取消军管，释放政治犯，以迎接教皇下月的访问。1984年1月27日，天主教主教团发表公报，对政府宣布提高食品价格表示“遗憾”，并声明要为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获释而继续斗争。说“社会紧张局势并没有消失，许多人仍感到失望。又说只有社会及其统治者通力合作才能

① 见美国《现代史》杂志1984年第11期。

克服波兰的经济困难，人民同政府合作是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毫无疑问，在长远的发展中处理好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对于波兰政权机构来说，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为了摆脱危机，防止群众骚动，政府不得不经常借助于教会的影响，听取教会的建议和批评；但另一方面，教会威信的提高和作用的增大也意味着世俗权力的重新分配，意味着党和政府的统治地位的削弱，意味着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学说的影响力下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局面当然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

疑惑、担忧甚至敌视天主教会的态度，存在于相当一批人中。有人甚至不择手段打击、报复天主教人士，使全波兰震惊和愤慨的内务部几个高级警官合谋暗杀一位有不同政见的神甫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①

然而，以稳健著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其他

① 据报道，1984年10月间，波兰国家内务部几个高级警官合谋绑架并暗杀了天主教神甫耶·波比耶乌什科。事发后，波兰各界舆论和党政领导一致愤怒谴责了这次谋杀。根据托伦省法院1985年2月8日的宣判，主犯、前内务部某处处长格·皮奥特罗夫斯基大尉和前内务部某司副司长亚·皮耶特鲁什卡上校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皮奥特罗夫斯基还被剥夺公民权10年；另外两名被告，原内务部上尉莱·彭卡拉和瓦·赫米耶莱夫斯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4年。

一些波兰党政领导人，对于波兰教会一直采取的是明智的协商和合作的立场。他们也批评教会的错误倾向和个别人的不良用意，但对绝大多数教徒采取信任态度，对教会领导则保持对话和协作。

1984年3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说：

“近40年来，不同世界观的人和不同信仰的人都在和睦地一道工作。对我国公民来说，在对国家的合法和教会的属性之间不会存在选择。

最近困难的几年表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沿着世界观的分界线进行的。在维护宪法秩序的人中间既有教徒，也有非教徒，在主张搞对抗的人中也有这样的两种人。

有些人滥用教会的威信，企图把教堂变成集会场所，在教会里进行政治交易。

无论国家还是教会都不需要冲突，它只能有利于波兰的敌人，而给我国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高度评价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中断过。

人民国家的宗教政策原则是不变的。我们愿意同罗马天主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同其他教会和宗教组织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1986年2月初，雅鲁泽尔斯基在与意大利《时

代报》记者单独谈话时又说："波兰罗马天主教会有特别方便的条件完成自己的传教使命。对话、接触在各级都在保持，包括首都和地方在内。政府和主教团代表联席委员会在经常工作。我本人同波兰首席大主教会见了九次，进行过长时间的、认真的、积极的会谈"。他指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冲突的形势。例如，某些神职人员违背自己的传教使命，进入政治领域，甚至越来越多地使非教徒有可能利用教会作为政治讲坛"。他还说："我认为，同保罗二世——一位波兰人教皇会见，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我对迄今的会谈保持着良好的回忆。这些会谈是诚挚的，其特点是双方关心我们共同祖国的幸福，关心民族谅解过程的发展，关心欧洲和世界和平"。

从取消军事管制以来，波兰军人执政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改变。但是，可以明显看出，雅鲁泽尔斯基在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而明智地结束军人执政的过渡时期。他在保留最高领导的同时，已先后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由梅斯内尔接任）、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亦由梅斯内尔接任）和国防部长（由弗·西维茨基接任）的职务，改变了党政军最高职位集一身的局面。

为了实现民族和解和社会安定，从1983年起，

波兰开始推行“国家复兴爱国运动”并设立了相应的全国性机构。1983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成立了领导机构——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副主席扬·科斯特热夫斯基教授在会上作纲领性报告时说，国家复兴爱国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波兰人的谅解，使国家摆脱危机，实现国内安定，恢复波兰的国际地位。它的基本作用是：表达公众意见，调解冲突，组织磋商，对国家进行监督等。临时全国委员会主席扬·多布拉琴斯基在向外国记者介绍该运动的宗旨和活动方针时说，国家复兴爱国运动是波兰社会各阶层代表就人们意见一致和不一致的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也是社会与当局进行讨论的场所。临时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马·奥热霍夫斯基说，这个运动比人民统一阵线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而且包括三个世俗教会组织、各社会团体和各届代表。其次，这一运动是政府的建设性伙伴，它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第三，这一运动坚持自愿和个人参加的组织原则。最后，这一运动将提出更为民主和合理的地方人民会议和全国议会的选举办法。

80年代以来，波兰国民议会的作用得到增强，有着比较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新的努力的重要内

容。

过去，“重要的政治决定由上层领导集团作出”，议会的立法职能很弱，第7届议会通过的立法条例只有42项。1980年以后的第8届议会明显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共作出了204项涉及国内外方针政策的立法决议。在通过的204项法令中，有140项是政府提出的法令草案，由议会讨论通过的。值得指出的是，这140项除了有16项未作修改便得到了批准以外，其余124项都是作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修改以后才通过的。

为了加强监督权，波兰近年中建立了国家法庭和宪法法庭，最高监察院改由议会领导，不仅提高了议会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议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在第8届议会期间，政府共向议会提交了44份重要报告。议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529项质询，其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往7届议会（1952—1980年）的总和。议会从最高监察院那里一共收到484项有关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情况的检查报告。议会作出了408项有关部长会议工作情况的决定。

近年来波兰还制订和实行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与旧选举法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定额和差额选举并行。新选举法规定，议员候选人分两种：实行等额选举的全国性候选人和实行差额选举的地方性候选

人。全国性候选人由波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协商提名，主要目的在于保证重要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社会知名人士当选。按规定，全国性议员候选人人数不能超过议员总数460名的15%。实行差额选举的地方性候选人由地方党组织及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协商提名，目的在于保证候选人的质量。另外，选民也可联名提候选人。

从1980年6月至1985年9月，波兰全国议会共举行了67次全体会议，148次主席团会议，122次议会参议会议，2196次议会委员会会议，1879次议会委员会分组会议。议会活动十分繁忙、活跃，这改变了过去议会经常处于休会的状态，在波兰议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议员同选民的接触也明显增多，第8届议会一共举行2319次议员与选民的会见。议会共收到群众来信78681封。议会开会时，所有情况都向社会转达，许多职务都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

据波兰报纸报道，从1980年11月15日起到1987年1月15日，对“公民权利社会代言人”机构的组织——法律条例进行了全民讨论。这是近几年中所采取的加强直接民主的又一重要措施。

设立这一机构的设想是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经过几年酝酿之后，1986

年年中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讨论并批准了这一设想。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机构将作为“对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重要补充和维护波兰法制的新工具。”1986年11月14日，报纸上公布了国务委员会在与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执委会进行协商后制定的条例。一共制订了两个方案交全民讨论，讨论由民族复兴爱国运动负责组织。

第一个方案建议只在省一级设立代言人机构。

第二个方案提出既在省一级也在全波兰基层范围建立代言人机构的设想。

公民权利社会代言人的主要活动，是在各级机构处理的案件中维护个人权利。代言人的工作是根据公民的申诉和建议，根据自治机构、民族复兴爱国运动小组、社会与工会组织的提议，舆论工具的报道以及代言人本身的看法进行的。代言人除那些涉及国家机密、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材料以外，具有充分的条件查明问题，了解相应的案件材料。

另外，还建立了舆论调查中心，经常就各种重大问题进行舆论测验并如实公布测验结果，作为决策的依据和社会批评的材料。

路透社报道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真心想让波兰人有言论自由。这种自由

尽管是有限的，但也会使东欧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

雅鲁泽尔斯基9月份（1986年）突然出乎意外地释放了所有政治犯，从而消除了一个同西方和颇有势力的罗马天主教会改善关系的重大障碍。

总理梅斯内尔不同议员们进行充分磋商就试图否定议员对政府经济改革提出的修正案，结果他上个月不得不向议会公开道歉。官方报纸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政府遭受这种挫折在团结工会闹事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雅鲁泽尔斯基本月成立了一个磋商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就政治和社会问题直接向雅鲁泽尔斯基提建议。他的这项主动行动使非共产党人在一个苏联集团国家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讲坛。

政府还在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公众检举机构，以便让人民能去告官僚的状。”①

波兰社会政治的这种动向，按照正式的说法，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的“协商与斗争”的路线的体现。在1981年7月召开的波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对以往的错误和歪曲作了认真批判和反省，肯定了经济改革的方向，修改了党章，规定了党内

① 据路透社华沙1986年12月11日电讯。

民主选举和任期制的原则，并对党的工作方针制定了迄今为止一直在执行的内容。

在1986年6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继续肯定了九大的路线方针。雅鲁泽尔斯基在这次大会上说，波兰目前面临的任务是“特别艰巨和复杂的”。他指出，“今天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进程，弥补失去的时间，缩短我们同科技和经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后几年的任务是巩固发展的基础、恢复平衡、缓和最严重的比例失调。十大决定把经济改革推向更深刻的第二阶段。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各种破坏改革和复旧的企图，第二阶段改革要“从改革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开始”，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磋商。

值得重视的是，在十大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改变了以往所说的波兰“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更高阶段”的提法，而是认为，波兰目前正处在“长期过渡时期”之中，这个时期的实质，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物质技术、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基础”。这表明，波党对波兰面临的矛盾、困难乃至危机有了更多、更现实的考虑。它将影响到党的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制定上，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去。无疑，这种新认识更有助于波兰彻底摆脱危机、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

今天，使波兰彻底摆脱危机，已成为无数波兰人思索和努力的中心问题。哲学家沙夫在《波兰的教训》一文中，列举了在他看来是革新和挣脱危机的三项条件：

第一项条件是："军政府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限制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到经济和社会形势稳定下来为止"。他表示赞成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意见，即军人统治的时间绝不应比绝对必要的时间还长。但问题在于，对究竟多长时间才是必要的这一点，不能抱有幻想。波兰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由于种种原因——不只是由于1981年事件——发展得这么远，以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国内，首先是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目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他们对准备采取行动的态度上，恢复完全的秩序。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阶段，就急于处理事情，那么，这只会意味着重复全部闹剧，而这一次将给民族前途带来悲惨的结局。"如果有人对波兰人会对这种发展作出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提出疑问，那就必须向他指出，波兰人虽然有种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倾向，但是他们，出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还是欢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尤其

是当他身穿让整个社会都肃然起敬的军服的时候。从现代历史中可以举出的典型例子就是毕苏斯基[1]在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下发动的政变，人民是何等轻松愉快服从了他的强制命令。”

第二项条件，“是党的新生”。沙夫指出，这里讲的新生或革新，不是平日人们讲惯了的、实质上是改良的那种“革新”，而必须是名符其实的变革。在这种革新中，“目前在我国居统治地位并且——不管愿意不愿意——将来仍将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工人政党作为领导的力量是一个基本条件”。但是，作为领导力量的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使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方针方向上，而不是繁琐的日常行政中，“工人政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一种政治道义的统治”；（2）彻底摆脱“所有已成为累赘的，在1968年和1970年，以及以后在钻营成为风气的1970年—1980年这10年中混入党内的党员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第三项条件，“是天主教会对公众舆论的相应作用”。他认为，在目前波兰条件下，天主教会可能成为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伙伴。人们必须极其审慎和头脑清醒地对待这种伙伴关系。教会就其信条来说是保守的，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敌人，但教会并

① 毕苏斯基，30年代波兰的军人执政者。

不一定是反共的。尤其从民族的和教会本身的利益考虑，波兰教会在当前形势下可以尽一切力量支持世俗权力为民族的利益所作的努力。相反的抉择，对于教会和对于民族都必然是一场灾难。沙夫进一步分析说，在过去几年中，波兰教会致力于加强它的地位和精神影响，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与其说是凭着教会的活动，不如说是由于共产党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了错误。教会从这种情况中捞到好处，因为它有一双没有被政治玷污的“干净的手”。它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爱国主义的考虑，因为它知道民族自身的对抗是何等危险，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由此看来，“任何一种民族阵线形式的伙伴关系不仅是现在形势下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从教会的利益考虑也是必需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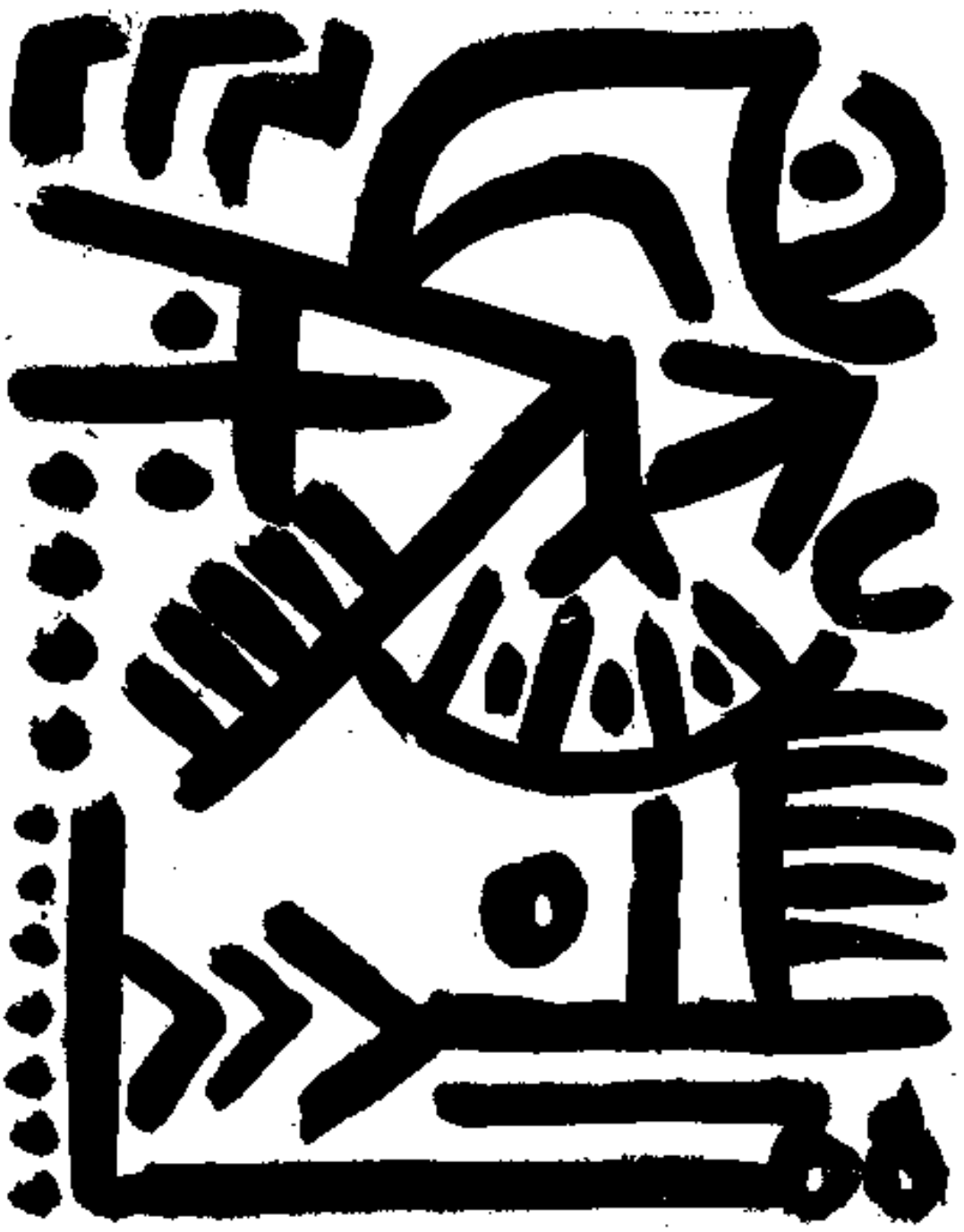
沙夫这里不是作全面的概括，但他把住了几个主要问题。或许还应当补充上去的另两个重要条件是：绝大多数工人群众对现政权的合法性的真心诚意的承认；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采取的全力以赴的合作态度。

波兰为摆脱危机所探寻的道路，有着独特的、深远的意义。

①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

结束语

没有结束的讨论



长期困扰波兰的危机是值得思索的。这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的危机，它具有严重而深刻的意味。

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场危机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经济危机。正象已经叙述过的那样，仅1980年以后的动乱，就使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倒退了10年。国民收入、生产总值、对外贸易、人民生活……，经济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大幅度下降。结构的危机或许更加严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加工工业与能源、交通运输以及食品和轻工业的比例失调，农业中畜牧业与种植业的比例失调，出口

贸易与进口贸易的比例失调……，许多比例关系的失调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尽管今天波兰的党和政府采取了新的政策，波兰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看上去要彻底摆脱经济面临的困境，走出危机的谷底，发展成象它的西方邻国那样的有效经济，并不是短期内的事情。

其次是政治危机。对于波兰来说，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一种信任和信心危机。政治领导、权威机构、党的组织、行政系统等等，被社会公众所不尊重、不合作。哥穆尔卡、盖莱克等最高领导人的厄运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例。按照“传统”规范建立起来的各种行政单位失去了应该具有的效率和力量。尤其是在1980年危机期间，上千万的工人加入了独立的“团结工会”以表示自己对官方的拒绝态度，上百万的共产党员站到了罢工者的一边，知识分子阶层对实行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多的社会公众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对待这一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这一切无不表明，在这个国家的这段时期中，政治权威、政治结构和政治统治产生了动摇，出现了一种西方学者通称为“合法性”的危机。

再次是社会危机。从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到

1970年的“十二月危机”，从1976年的拉多姆冲突到1980年的大罢工，每一次冲突都引起波兰整个社会的长时间动荡。无论是罢工工人与军队警察的流血搏斗，或是社会一些阶层的罢市罢课以及更多人的默默的消极抵抗，都加剧了这个社会的不稳定程度。发展到最后，这种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不是政治家们所能够控制和改变的了，而不得不依靠军队的干预才可以遏止——既是危机，也是悲剧。

心理、道德、意识形态的危机是与制度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观念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再清楚不过地论述过这一道理。“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这些概念完全适用于波兰公众在每次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后的心理状态。扬·什切潘斯基教授、雷厄科夫斯基教授、沙夫教授和布鲁斯教授等当代波兰社会最杰出的分析家们，都曾对笼罩动乱之后的社会的痛苦、灰心、失意、沮丧的心态作过深入的讨论。的确，在数十年的折腾以后——从麻醉状态中苏醒，继而欣喜、期待，尔后失望、愤怒；再得到许诺、安抚，并且再振奋、盼望，再次希望落空直至怨恨……，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已经不再兴奋、不再指望、甚至不再生气了。精疲力竭、消极冷漠，是多次危机造成的最可怕的社会心

理。在波兰，当意识形态的正统宣传灌输失灵之日，便为宗教神学的祷告教诲奏效之时；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与天主教会地位的上升呈两条平行线状。

波兰危机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循环性的或再生性的。循环的危机，危机的循环，已构成波兰事件区别于匈牙利事件（1956年“布达佩斯暴动”）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一个显著特征。整个人民波兰的历史，可以说是围绕几次大的震荡为主线展开的。研究波兰的人不会不承认它的危机的循环性或再生性这种恶性的征象。与单发性危机不同的是——本书一再强调这一点——循环性危机的最严重的后果在于，它不再使人恢复斗志、勇气、信心和期望，它更容易让人丧失进取精神，它所造成的危害主要还不是表现在物的外在层面上（比如生产的下降、经济的萎缩、生活水准的跌落和权力机制的失灵等等），而是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和意识中。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它是最难医治的。这种后果反过来又导致无数新障碍的形成，进一步阻止克服危机的努力，萌发新的一轮危机。所以，循环的危机本身必然是恶性的。

在波兰，危机曾相继在三种类型的体制中出现。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三种体制：

第一种类型，是早期的，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特点的体制。在波兰，其存在的年代大体上是1948年至1956年。它奉行军事共产主义准则，忽视物质利益原则，权力高度集中，增长的目标是简单的和一元的，——人们往往以“工业化”、“军事化”、“集体化”或“国有化”等概括这种目标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这种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狂热的斗争情绪、严格的纪律约束，以及对于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党和革命队伍内的“异己分子”的无情打击。读者可能会记起，在波兰，哥穆尔卡曾经是“大清洗”过程的主要牺牲者之一；6个政党中的3个曾经积极活动但后来被迫解散或合并；统一工人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全力以赴地展开“无产阶级化”的工作；新的六年计划和指令系统的建立带有明显外来的印记……。与东欧一些国家比较，波兰的上述征象并不是最突出的，譬如说，“大清洗”中的镇压手段往往是徒刑、监禁，而不是极刑、绞杀。

第二种类型，是哥穆尔卡执政年代那种缓慢发展的所谓“清贫的社会主义”体制。它在波兰存在的时间是1956年至1970年。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这一种体制具有比较温和、不那么激进和狂热的特点：它否定了所谓“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在苏联东欧各国，这一术语专指在“大清洗”年代对党政领导层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现象，如“布哈林案件”、“拉伊克案件”、“斯兰斯基案件”等等），消除了50年代初期的“红色恐怖”、人人自危的氛围；它放弃了一味追求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做法，开始注意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波兰，正是从这一时期以后，私有农户成为合法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从本质上讲，这种体制不具备现代特征，它仍然有着强烈的旧时代的烙印。比如，它提倡和实行平均主义的、清心寡欲的社会准则；它不重视发展国际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采纳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机制，它忽视甚至压制青年一代和知识阶层的现代意识和追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它依然顽固地坚持旧的教条和说教，拒绝任何革新的努力。

第三种类型，是盖莱克当政期间那种表面上具有很强的“现代”色彩的、改良型的体制。在波兰，这种体制存在的年代是1970年到1980年。看上去，这一体制否定了“清贫的”社会主义，以经济的现代化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上，极大地拓展了与外部世界（包括传统的“盟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的

领域。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各级组织，无论是工作方式还是思维活动，在这段时期内都把“再建一个波兰”作为中心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波兰跨入了世界各国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然而，这种体制在本质上与前两种体制并无根本区别，最终也未能摆脱前两种体制已经遭到的厄运，其下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工人群众以及广大人民起来抗议，大规模的罢工，人民与当局的激烈冲突，最后，领导层易人，政府被迫作出一定让步，换取动乱的结束。

危机的根源何在？

波兰鲁齐科夫斯基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和波兰的经验》一书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中，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体制的性质、结构、目标和职能。党同社会其他环节的关系，确定了体制内部结构中最重要的相互关系的内容和特点。”又说，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是：“党在行使自己的领导作用方面所犯的错误，不仅导致了政治体制平衡的破坏和社会紧张，而且没有及时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削弱了党的力量。结果是党同社会群众、同工人阶级的联系中断了。”①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它揭示

① 转引自《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二辑，东方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272页，第279页。

了波兰危机的主要原因。

执政党——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它与社会的联系和关系、它的内部生活准则以及其实现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正常和成熟与否的关键标志。一个共产党（我们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党），如果严格遵循马列主义的基本准则，履行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职能，毫不留情和毫不宽容地对待党自己政策中的失误与过错，正确恰当地依靠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去共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便有可能及时有效地防止社会经济中重大矛盾和冲突的滋生和蔓延，将任何重大危机迅速地消除在其萌芽状态；反之，如果党高高在上，自我孤立，隔断了同社会和舆论的有机联系，任凭党内官僚主义和自大情绪的扩张，不适当地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指手划脚，并且听不进任何真正尖锐而深刻的批评意见，就将破坏党与人民、与社会、与其他组织团结一致、协力合作的基础，加剧紧张局面和社会分歧，使权力机制丧失正确判断社会经济形势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使矛盾由小到大、由局部发展到全体、由暂时性问题变为旷日持久的危机。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否和快慢程度，取决于社会的体制（生产

关系）；而体制各组成部分中，政治体制是核心构成，执政党（共产党）又是政治体制中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因而全部的问题聚焦在党上面，尤其在于党对自身的认识、估价和由此而引导产生的一系列政策行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高度重视党的自我批判能力，并以此作为党郑重与否的基本标志。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

波兰之所以一再发生危机，正是因为（象波兰人今天已经看到和批评过的那样）作为执政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联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党自身滋长出许多弊端，而且每次危机过后，都空许诺言，而党的政策、目标、行使权力的方法和党同社会的关系却未得到实质性改进，使人们越来越不满，新的危机更加严重。

在上述情况下，便有了一种特殊的体制（今天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人们恰如其分地根据其最初制造者的名称将它称为“斯大林主义模式”），这个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特点便是党对一切的掌握和垄断，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从基本点上看，波兰曾经有过的三种体制类型是一致的——在经济生活中，它们都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下达带有强制性的指令性指标，忽视商品货币关系下的市场机制的合理的、现实的作用，排斥价值规律的存在，严重束缚企业和个人的进取精神和创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一律实行不容实质性批评的共产党的领导（即便是盖莱克这样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从1976年拉多姆事件之后，也采取了毫不宽容的、近乎于专制的压制抗议的态度）；在意识形态中，用唯一正统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一切的观念，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其他解释，排斥任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完全一致的思想和流派；在社会领域中，片面强调“社会一致性”原则，对利益和要求的多元化惊恐不安，竭力防止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的自主、自立和自治，打击对党和政府至高无上权威的任何怀疑。这种体制，也许在经济方面可以向“现代化”作某种逼近，但体制和观念是落后的，政治体制和

意识形态仍然是保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发挥出来，从而阻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现代化民主化合理化的进程，最终也妨碍了经济的进步，使“起飞”的意图化为泡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聚合起来的矛盾便爆炸成为危机。

值得提出的是，在波兰，原本是存在着许多与外来模式及党的集权倾向格格不入的因素的（这里包括了积极的和消极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因素）。比如有这样一些因素：宗教和天主教会对社会的强大影响；自治工会的悠久传统；民族主义的浓厚情绪；私有经济成分的大量存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在人民波兰的社会政治现实中，人们也可以找到不少偏离传统模式的现象。诸如联合执政和多党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同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社会舆论所特有的坦率与尖锐，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经常出现的富有特色的对话和批评，等等。正如读者在本书诸章已经了解的那样，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统一工人党的某些领导人（例如哥穆尔卡）曾十分重视上述种种因素，一再强调要走“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可惜的是：最早阐发这一思想的哥穆尔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和旧体制的作用，到后来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命运，陷入危机的泥潭。归根到底，原因还在于旧体制没有变化，政治权力组织（尤其是党）没有正确地解决自己的地位、作用和目标的问题，歪曲和变形终究导致了危机和悲剧。

承认危机才有希望，了解现实才知道从何起步。正是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之中，才包含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希望。从一定意义上讲，不仅波兰，而且社会主义各国，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正因为它们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这一认识正是在危机感驱使下获得的，它要求的不是改良而是真正的改革。

波兰危机给人的震动是深刻的，波兰人民今天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下所从事的摆脱危机的工作是值得赞赏的。我们期待着波兰的未来，期待着社会主义的未来。

这是一场没有结束的讨论。

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出版

人的发现　　李平晔著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李宝恒译

激动人心的年代　　李醒民著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道·霍夫斯塔特原著
乐秀成编译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　潘　鼐编译

现实与选择　　朱嘉明　吕　政著

经济控制论　　何维凌　邓英淘编著

探险与世界　　于有彬编著

看不见的手　　杨君昌编著

谐音学与现代科学　　陈明远编著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金观涛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刘青峰著

1985年出版

人的现代化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著
殷陆君编译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熔编著

没有极限的增长　　朱利安·林肯·西蒙原著
黄江南　朱嘉明编译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金观涛　唐君昕著

在国际舞台上　　陈汉文编著

昨天　今天　明天　　邓正来编著

摇篮与墓地　　陈越光　陈小雅著

走向未来丛书

择优分配原理 茆于飞著
第三次数学危机 胡作玄著
凯恩斯革命 杨君昌编著
艺术魅力的探寻 林兴宅著
西方文官系统
杨百揆 陈子明 陈兆钢 李盛平 缪琬非著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邓英淘 何维凌编著
新的综合
〔美〕爱德华·奥尔本·威尔逊著 李昆峰编译

1986年出版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著
定量社会学 郭治安 姜璐 沈小峰编译
儒家文化的困境 萧功秦著
系统思想 〔美〕小拉尔夫·弗·迈尔斯主编
杨志信 葛明浩译
日本为什么"成功"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悲壮的衰落 金观涛 王军衔著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
西方的丑学 刘 东著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美〕R·K·默顿著 范岱年 吴 忠 蒋效东译
画布上的创造 戴士和著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约瑟夫·阿·
勒文森著 刘 伟 刘 丽 姜铁军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黄晓京 彭 强译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宋德生著
增长、短缺与效率 〔匈〕亚诺什·科尔内原著
崔之元 钱铭今译

走向未来丛书

1987年出版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钱乘旦　陈意新著
竞争中的合作　陈汉文编著
计量历史学
〔苏〕科瓦尔琴科主编　闻　一　肖　岭译
哲学的还原　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著
田晓春译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著
人的创世纪　张　强　顾　昕　张继宗编著
社会研究方法　〔美〕艾尔·巴比著　李银河译
发展社会学　胡格韦尔特著　白　桦　丁一凡编译
上帝怎样掷骰子　陈克艰著
空寂的神殿　谢逸骏著
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　凡著
以权力制约权力　朱光磊著
整体的哲学　金观涛著
人体文化　谢　长　葛　岩著
人心中的历史　刘　昶著
探寻新的模式　罗首初　万解秋著
发展的主题　周其仁　杜　鹰　邱继成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K·J·阿罗著
陈志武　崔之元译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英〕查·帕·斯诺著
陈恒六　刘　岳译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著　刘　东　谢维和译

走向未来丛书

1988年出版

波兰危机　王逸舟　苏绍智著
人的哲学　金观涛著
四期政治风云　怀效锋著
现代化的动力〔美〕C·E·布莱克著　段小光译
信念的演史：文艺世界　徐一青　张鹤仙著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
约瑟夫·本-戴维著　赵佳苓译
平等与效率〔美〕阿瑟·奥肯著　王忠民　黄清译
伦理思想的突破　韦政通著
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荷〕C·A·范坡伊森著
刘　东　谢维和译
人口：中国的悬剑　何清涟著
理性主义　陈宣良著
卖格者言　张五常著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钱乘旦著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波兰危机
作者=
页数=392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封底